

傳播文化與政治

ISSN 2411-4006
第8期 2018年12月

一般論文

- 區塊鏈與新聞：新型態的數位新聞購買與推薦平台
- 商營社群媒體的自律與問責：政治經濟學取徑的批判
- 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知識勞工的困境研究：以出版產業的編輯人員為例
- 當代拉丁美洲的另類傳播：委內瑞拉英語另類媒介及其對主流新聞的回應

研究誌要

- 社會運動與新認同：社群媒介與創意社群之分析

現場報告

- 「亞洲」作為紀錄的方法：合製計畫暨工作坊之參與觀察

書評

- 拆解有實而無形的審查刀鋒：
評介區家麟著
《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

傳播文化與政治

2015年6月创刊

半年刊, 6、12月出刊

出版: 2018年12月 第八期

主办机构

媒体改造学社

编辑顾问

卜卫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井迎瑞	台南艺术大学
王春泉	西北大学
王嵩音	中正大学
王毓莉	文化大学
史安斌	清华大学(北京)
吴予敏	深圳大学
吕新雨	华东师范大学
李金铨	香港城市大学
林元辉	政治大学
林东泰	台湾师范大学
林静伶	辅仁大学
邱林川	香港中文大学
胡光夏	世新大学
胡泳	北京大学
倪炎元	铭传大学
展江	北京外国语大学
翁秀琪	世新大学
张志安	中山大学(广州)
张裕亮	南华大学
张锦华	台湾大学
张国良	交通大学(上海)
郭良文	交通大学(新竹)
陈卫星	中国传媒大学
单波	武汉大学
曹晋	复旦大学
刘海龙	人民大学
黄煜	香港浸会大学
赵月枝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萧苹	中山大学(高雄)

编辑委员会

主编	冯建三	政治大学
编辑委员	林富美	世新大学
	林丽云	台湾大学
	陈光兴	交通大学
	罗世宏	中正大学(执行编辑)
助理编辑	刘忠博	华南理工大学

出版

发行人 媒体改造学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02 号
3 楼之 3

电话 (02)25221499

传真 (0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本刊网址: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封面提字 黄匀祺

封面设计 冯议彻

订 阅

零售: 每期新台币 500 元

个人订阅: 国内一年两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机构订阅: 国内一年两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挂号邮资

邮政划拨户名 社团法人媒体改造学社

邮政划拨账号 50313103

本刊采用创意公有授权条款, 如下



目次

编辑室报告：另类传播的关怀与求索.....i

一般论文

区块链与新闻：新型态的数字新闻购买与推荐平台.....刘荣桦/1

商营社群媒体的自律与问责：

 政治经济学取径的批判.....胡元辉/37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知识劳工的困境研究：

 以出版产业的编辑人员为例.....姚建华/77

当代拉丁美洲的另类传播：

 委内瑞拉英语另类媒介及其对主流新闻的回应.....冯建三/103

研究志要

社会运动与新认同：社群媒介与创意社群之分析.....许传阳/141

历史与现场

「亚洲」作为纪录的方法：合制计划暨工作坊之参与观察.....蔡庆同/165

书评书介

拆解有实而无形的审查刀锋：评介区家麟着

 《二十道阴影下的自由：香港新闻审查常》.....杜耀明/191

稿约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八期
2018 年 12 月

稿约详情请见 <http://twmedia.org/archives/502>

编辑室报告： 另类传播的关怀与求索

本期除四篇研究论文外，另有研究志要、现场报告与深度书评各一篇。

这些研究论文与作品涉及的主题相当广泛，但彼此之间隐然又有某种微妙的有机联系：区块链与新闻业、商营社群媒体问责与另类社群媒体想象、中国大陆知识劳工面对的社会转型困境、拉美另类传播、台湾社会运动、亚洲纪录片合制计划，以及香港新闻业日常面对的「二十道阴影」。或探索技术前沿，或批判商营社群媒体，或梳理社会转型下的知识劳工困境，或引领读者看见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些篇篇具有个性的论文和作品，有着共同的关怀与求索：不因为传播现状的各种结构性限制而丧志，努力探索另类传播的可能性。

首篇论文是刘荣桦教授撰写的〈区块链与新闻：新型态的数字新闻购买与推荐平台〉，探讨 Civil、Bitpress 与 Matters 这三个新闻产销（付费）流通平台如何藉由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期能为高质量新闻信息内容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提供新的出路，希冀有助于解决因社群媒体普及应用而恶化的「假新闻」现象，并且打破因推荐系统算法造成的「同温层」等问题。面对传统新闻业因数字科技掠夺广告收入而呈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许多创新实验尚待展开，新闻生产与消费两端还需磨合，但刘荣桦教授这篇相当具有原创性的论文，应可为关心优质新闻业前景的传播学术与新闻实务社群带来诸多启发。

第二篇论文是胡元辉教授的〈商营社群媒体的自律与问责：政治经济学取径的批判〉。胡元辉教授长期关注优质新闻业前途，也关切社群媒体推波助澜下的「假新闻」议题。本篇论文对商营社群媒体应对「假新闻」问题的消极态度提出批判，并从政治经济学视野分析商营社群媒体的局限，包括其对用户隐私的监控与侵害，对用户数据和数字劳动的商品化与剥削...等。最

后，胡元辉教授对商营社群媒体的问责机制指出若干可能的着力方向，并且提出在商营社群媒体之外肇建公共及另类社群媒体的说论。

第三篇论文〈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知识劳工的困境研究：以出版产业的编辑人员为例〉，作者姚建华教授也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大陆出版产业知识劳工（以编辑职工为例）面临的四大困境，涉及技术、政治、经济与阶级关系和权力变化等层面。本文通过对上海两家出版社的案例研究与深度访谈，勾勒出中国大陆传播产业与知识劳工置身的制度化权力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展读姚建华教授这篇论文的同时，适逢中国大陆国务院近日（2018年12月18日）发布《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对于本文所分析的知识劳工在社会转型中面临的困境，当有更深刻的领会：社会转型的巨轮从未停止转动，知识劳工遭受的碾压情况似乎也在持续加重当中。

第四篇论文是冯建三教授撰写的〈当代拉丁美洲的另类传播：委内瑞拉英语另类媒介及其对主流新闻的回应〉。针对拉丁美洲部分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在本世纪以来展现迥异于华人社会及西方主流观点的现象，亦即国家力量与另类传播之间的正向或协作关系，提供了相当深入的脉络化知识与分析，也翻转了所谓国家力量与另类传播之间必然互为悖反的流俗之见。本文的另一特色，在于诘问大多数西方及华文主流媒体所再现的委内瑞拉政经社会状况，因为主流媒体再现的委国状况不仅与实情未尽相符，而且该国经济困境亦与其推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关连性不大。冯建三教授亦对当地两家颇具特色的另类媒体（VA 及 TeleSur）的报导和观点进行分析，这项在华文传播学术界难得一见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让更多人理解关于委内瑞拉的真实状况，亦有助同样怀抱社会公平正义追求想望的人从中获得另类知识与行动的培力资源。

除了这四篇相当具有原创性与重要性的研究论文之外，许传阳教授带领读者进入社会运动和创意社群的汇流空间，他的〈社会运动与新认同：社群媒介与创意社群之分析〉一文以台湾的反媒体垄断运动为例，分析了视觉符号与创意社群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运动结合社群媒体的实践可能。

蔡庆同教授的〈「亚洲」作为纪录的方法：合制计划暨工作坊之参与观察〉一文，书写他对「亚洲纪录片合制计划」暨工作坊的观察与行动纪录，希望从中提炼出一种能让亚洲不同国家纪录片制作、教育与策展者之间能够彼此看见对方的新方法与新视野，从而跳脱后殖民知识状况施加的普遍限制。

最后，对于愈来愈清晰浮现的香港新闻自由隐忧，杜耀明教授分享了他的观察与思考。通过对区家麟所著《二十道阴影下的自由：香港新闻审查日常》一书的阅读与评介，在这篇题为〈拆解有实而无形的审查刀锋〉的深度评论中，杜耀明一语道破这本书的核心旨趣：「以自我审查为线索，解破香港新闻界『有自由无自主』的谜团。」香港新闻媒体的自我审查，比直接来自政府的「操控式审查」，更加构成了让香港新闻记者无以发挥更大自主性的「无形的枷锁」。杜耀明同意区家麟的看法：相对于赤裸裸的「操控式审查」，另一种运作更为幽微也更具箝制作用的是「结构式审查」。通过对 69 名新闻工作者的访谈，该书胪列了 20 种结构式审查的样态，饶富启示意义。除了高度肯定并推荐这本书之外，杜耀明在这篇深度书评中也提示了后续值得共同努力的研究与实践方向。

《传播、文化与政治》编辑委员会

2018 年 12 月 26 日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八期
2018 年 12 月

区块链与新闻： 新型态的数字新闻购买与推荐平台

刘荣桦*

本文引用格式

刘荣桦 (2018)。〈区块链与新闻：新型态的数字新闻购买与推荐平台〉，
《传播、文化与政治》，8:1-36。

投稿日期：2018 年 8 月 11 日；通过日期：2018 年 11 月 15 日。

* 作者刘荣桦为世新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e-mail: emileliu@mail.shu.edu.tw。

《摘要》

区块链的概念是在 2008 年由 Nakamoto Satoshi 提出，并在 2009 年发布了第一个实作区块链的虚拟货币——比特币。在 2015 年发行的另外一个区块链虚拟货币系统——以太坊，引入智能合约的概念，扩大了区块链的应用于自动交易与数据保护上。区块链所具有的数据不可磨灭以及解决双重支付的虚拟货币机制，也吸引新闻媒体开始投入建置区块链新闻交易平台，用以解决营收过度依赖广告与遏止假新闻的泛滥。本文将介绍区块链如何应用于新闻交易平台，以目前进行中的三个区块链新闻交易平台为主要的分析对象，包含以英文读者为主的 Civil 与 Bitpress，以及以华文世界读者为对象的 Matters。从对以上三者的研究显示，当区块链上的货币与现实生活中的法币能有稳定兑换关系后，同时拥有足够多的货币与持有者在区块链上，就能成为从货币动力学来看具有稳定性的货币，如此将会使得区块链如同重要基础设施，可以被稳定地且广泛地运用；而其所具有的不可磨灭性，也使得此种新的数字型态的新闻内容会成为可信赖的讯息来源，增加大众对于新闻的信赖度，使得新闻产业摆脱假新闻与同温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再次赢回大众的信赖。

关键词：Bitress、Civil、Matters、比特币、以太坊、区块链、智慧合

约、超级账本

壹、背景

从网络兴起之后，早期因为网络付费尚不普及，所以新闻媒体无法从中获利。近几年因为各式非传统新闻媒体的出现，如 Facebook 成为信息的分享中心，媒体产出的内容被分享到 Facebook，内容的普及率可能随之提升，但媒体可以从中获得的导流率甚低。许多读者都停留在 Facebook，而不会到新闻媒体的平台上，这导致平台上的广告浏览率与点击率下降。当媒体产出越多的内容，反而是 Facebook 的使用者驻留率越高，帮助 Facebook 增加获利。而当媒体利用付费墙的方式，要求读者付费看文章内容的时候，反而因为文章扩散度降低，观看文章的人数减少 (New York Times, 2014, March 24)。

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已经改变，无法要求读者回到传统的阅读新闻方式，所以传统媒体，如《纽约时报》，提出「数字优先」(Digital First) 与「行动优先」(Mobile First) 的策略，希望能在网络以及行动装置上，找到新的数字获利方式以维持新闻媒体的营运 (Burrell, 2017, March 23)。《纽约时报》在 2014 年提出的创新报告，明确订定了以数字优先的策略，透过活用既有内容与社群网站的方式，藉以触及数字时代的用户，以增加更多订阅户 (New York Times, 2014, March 24, p. 81)。而在 2018 年的时候，他们的目标定为针对既有用户提出了例如健康规画等各种独家的数字内容服务，因为他们认为与其积极扩展新用户，不如藉由提供用户良好服务，透过口耳相传，增加新的用户 (Lee & Guinee, 2018, April 17)。

相较于《纽约时报》这类型的大媒体公司，能有较多的资源去规划数字服务的策略，现今流行的各种自媒体或者是地区型的新闻公司，就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所以有不同收费形式的数字内容平台出现，如“Medium”¹藉由读者对于作者文章的评价数目给予作者分润；「读创故事」²由作者自行做在线出版，选择其文章是否要收费。“Steemit”³则是一套以区块链为基础的社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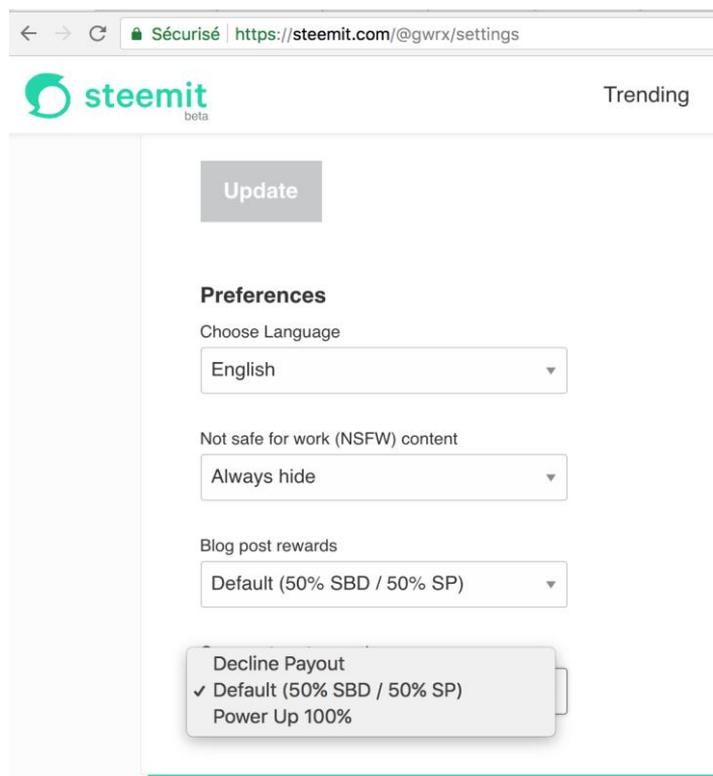
¹ <https://medium.com/>

² <https://story.udn.com/dcstore/Index.do>

³ <https://steemit.com/>

媒体平台，当有人在平台上发布文章或者响应，都有机会收到平台上的虚拟货币“Steem Dollar”（SBD）与影响力“Steem Power”（SP），发文者可以设定要收比例多少的“Steem Dollar”跟“Steem Power”（图一），同时他们可以将内部使用的 Steem Dollar 转为可以在平台以外兑换不同虚拟货币的“STEEM”⁴。越早响应的人，会收到额外的金额，藉以鼓励读者响应，而“STEEM”可以在如 Bittrex5 的网站上进行交易（图二）。在以上不同的数字内容平台中，新型态的在线收费方式正在逐渐成形。

图一：Steemit 发文者可以自定义要收多比例的“Steem Dollar”跟“Steem Power”



⁴https://steemit.com/faq.html#What_is_the_difference_between_STEEM__STEEM_Power__and_Steem_Dollars

⁵ <https://bittrex.com/>

图二：“STEEM”在虚拟货币交易所“Bittrex”的交易状况⁶

不过 Steemit 的定位是具有写作功能的社交媒体平台，所以他们并没有担负新闻媒体所需要的事实查核等责任，也使得他们与本文所要介绍的具有假新闻查核与可信度评等的新闻区块链平台，有截然不同的差异，这差异使得以区块链为基础的新闻平台成为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

Civil 是一个由新闻从业人员与程序工程师在 2017 年组成的一家公司，他们尝试建立以区块链为基础的新的新闻内容收费平台，而当到了 2018 年五月，除了 Civil，还有 Bitpress 与以华文读者为对象的 Matters 这二个开发中的计划，也希望能建立可以持续经营的新型态新闻商业模式。区块链作为一个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过去几年在金融科技业已经陆续被探讨与实作，也因为其交易不可修改与去中心化的特性，已经扩大其原本作为虚拟货币账本的特性，而被应用于需要去中心化与安全性高的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IoT）与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上；而其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则产生了新的商业模式，网络上个人之间的交易，不需要透过 Paypal 与银行等第三方组织，以及如苹果公司的 Apple News 或者是 Facebook 的新闻发布平台，读者

⁶ <https://bittrex.com/Market/Index?MarketName=BTC-STEEM>

可以如同在现实世界中的购买报纸的直接付款给新闻媒体，而这也使得过去长期仰赖广告收入与点击率的网络新闻从业人员，有了另外一种获利方式。

Civil、Bitpress 与 Matters 这三个项目本身并不限于只作为收费平台，他们同时希望藉由区块链的分散与不可变更特性，解决目前普遍存在于社群网站上的假新闻与推荐系统所造成的读者同温层的问题。在假新闻的解决方案上，Civil 是藉由「挑战」机制维持新闻的质量，因为文章的交易纪录无法删除，所以藉由纪录回溯发文者，能追踪到假新闻的来源。在推荐系统的问题上，Matters 会审核发文者的背景，由挑选出来的社群的人进行议题设定，先由部分意见领袖开始他们第一阶段的封测。

综上所述，区块链并非只是做为交易媒介，同时也可以是独立的生态体系，欧盟甚至将其纳入数字单一市场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⁷，运用于包含个人信息管理以期达到结合物联网、开放民主与共享经济的“DECODE”计划⁸，以及与医疗等信息的管理与传递相关的“MHMD”计划⁹。在“DECODE”的阿姆斯特丹先导计划中，预计建立短租信息的区块链平台，未来将扩展到新闻与各式活动的信息共享平台。本文接下来将会先介绍区块链的发展，以及网络新闻这几年所面临到的关于假新闻与新闻推荐造成的同温层问题。然后，藉由比较 Civil、Bitpress 与 Matters 三个区块链新闻交易平台，讨论区块链作为新闻交易生态体系与基础设施，对于现在网络新闻的商业模式与假新闻议题所可能带来的帮助，以及他们所可能面临的问题。

贰、区块链的技术特性

区块链的概念最早是由 Nakamoto Satoshi (2008) 所发表的一篇“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当中所提出。在文章中他提出利用「点

⁷<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european-countries-join-blockchain-partnership>

⁸<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blockchain-give-people-more-control-about-their-data>

⁹<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blockchain-enable-medical-data-be-stored-and-transmitted-safely-and-effectively>

对点网络」(Peer-to-Peer Network, P2P), 将每一次的虚拟货币的交易 (Transaction), 放入区块 (Block) 当中, 当完成产生区块所需要的计算过程之后, 将区块串接在唯一一条串连在一起的区块链 (Blockchain), 这个过程即称为挖矿 (Mining), 负责产生区块的计算机或人, 则称为矿工 (Miner)。副本会放置在网络上的不同的计算机当中, 而这也是所谓的去中心化设计 (Decentralized)。如果想要更改交易纪录, 就必须将所有区块产生的计算过程重新计算一次, 而因为这个过程费时过长, 当修改完之后, 其他网络上的计算机可能已经将新产生的区块连结到区块链上。而根据他的设计, 作为网络中的计算机, 只会保留最长的一条区块链, 其他计算机运算后所得的较短的区块链上的新区块则会被舍弃, 称为孤儿区块 (Orphan Block)。因为区块链网络上的所有计算机都会存有最长的区块链副本, 即使一个计算机上的区块链内容被修改, 其他计算机上只要有比其更长的区块链副本, 其费时修改的新的区块即会被舍弃。藉由以上的机制, 可避免交易纪录被修改。也因为区块链存放的是交易纪录, 所以也被视为账本 (Ledger)。Nakamoto Satoshi 并于 2009 年, 公开第一版的实作区块链概念的虚拟货币——比特币 (Bitcoin)¹⁰。

比特币的区块最多只能存放 1MB 的数据, 同时平均要花费十分钟才能新增一个区块¹¹, 而比特币规定需要在埋有该笔交易的区块之后, 需要有五个区块串接在其后, 才算是交易确认 (Confirmation)¹²。为了鼓励矿工将交易纪录埋入区块之中, 当产生一个新的区块, 矿工将会收到报酬 (Reward)¹³, 包含了产生区块而得到比特币, 以及交易当中的手续费 (Transaction Fee)。目前挖到一个区块可以获得 12.5 比特币, 每当产生 21 万个区块之后, 矿工可以获得的比特币会减半, 以维持货币价值¹⁴。

比特币利用具有难度的计算方式来建立新的区块, 这个方式称为工作证明 (Power-of-Work, PoW), 虽然计算过程需要的计算机运算量与时间会随着

¹⁰ <https://bitcoin.org/en/>

¹¹ <https://en.bitcoin.it/wiki/Block>

¹² <https://en.bitcoin.it/wiki/Confirmation>

¹³ <https://en.bitcoin.it/wiki/Mining#Reward>

¹⁴ <https://en.bitcoin.it/wiki/Mining#Reward>

区块链越长而成长，但是确认新产生的区块是否有效的速度则是很快，以便于在网络上的所有计算机都能在短时间内进行同步，确认彼此的区块链内容都一致，也就是达到比特币所定义的共识（Consensus）。产生共识的方法除了比特币所采用的工作证明外，还有其他类型，如股权证明（Proof-of-Stake, PoS），其是由算法随机选择手中所持有的货币量超过一定额度的网络节点，才可以产生新的区块。

区块链的应用并不只局限于作为虚拟货币，在 2015 年被进一步扩展到自动交易的行为上。以太坊（Ethereum）¹⁵在 2015 年出现，并且加入了智慧合约（Smart Contract）的概念，尔后由 Linux 基金会主导开发，IBM 与荷兰银行所共同参与的超级账本（Hyperledger Fabric）¹⁶也加入了智慧合约的实作，其甚至没有自己的虚拟货币，纯粹是作为商业应用层级的区块链。智慧合约最早是由 Szabo (1994) 所提出。智能合约有以下四个目标 (Szabo, 1996)：

- (一) 可观察性 (Observability)：交易双方可以看到彼此对合约的实行状况。
- (二) 可验证性 (Verifiability)：确认合约是否被执行或违反。
- (三) 利害关系 (Privity)：对于合约的相关信息，只有具有利害关系的人可以看到。
- (四) 强制执行 (Enforceability)：具有强制执行的能力，但是也要最小化这个需求。

智能合约在以太坊上也被视为交易的一环，当使用者将合约发布到区块链上，合约内容就不能被更动。以太坊也提供一个特殊规格的智能合约——ERC20，用于产生使用者虚拟货币¹⁷。同时也允许使用者产生有自己的私有区块链 (private blockchain)，并且设定可以产生的货币上限金额，独立于公

¹⁵ <https://www.ethereum.org/>

¹⁶ <https://www.hyperledger.org/projects/fabric>

¹⁷ https://theethereum.wiki/w/index.php/ERC20_Token_Standard

有区块链 (public blockchain) 之外, 可以用于组织内部。不过如果是在私有链产生的货币, 无法与公有链的货币一样在交易所 (exchange) 与其他货币进行交易。

参、区块链当前的主要应用

根据剑桥大学的 Garrick Hileman 与 Michel Rauchs 在 2017 年的调查, 目前主要应用区块链的行业, 以银行业为最主要的领域。30%的区块链应用是在银行业发生, 接着是政府与公领域, 占了 13%。接着依序是保险业、健康照护、媒体与娱乐、通用型应用、科技业、专业服务、能源业与制造业 (Hileman & Rauchs, 2017, p.37)。

智能合约扩展了区块链原本只作为货币的应用, 以 IBM 与三星在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IoT) 上的应用为例, 当三星的洗衣机侦测到洗衣粉已经用罄, 就会发讯号到 IBM 的物联网管理计算机上, 接着 IBM 就会将洗衣机拥有者的账号送到区块链已存在的合约上, 合约就会自动进行交易, 将款项转给洗衣粉的贩卖商; 当交易确认后, 就会通知商店递送洗衣粉到洗衣机的拥有者家中 (Gantait et al., 2017, January 9)。IBM 认为结合了物联网、区块链与智慧合约, 可以将区块链的应用扩展至追踪食物运送的物流, 避免食物的浪费; 以及纪录来自不同供货商的汽车零组件, 能符合最后组装所要的需求数量。同时能应用于共享经济, 将自家产生的如太阳能的能源, 藉由智能合约进行交易 (Gantait et al., 2017, January 9)。因为区块链具有不可抹灭性, 使得合约具有强制执行力与可以被验证, 同时其去中心化的特色, 使得自动化交易无须第三者验证。

如上所述, 智慧合约出现在区块链之后, 各种自动化的交易行为就可以发生, 如同从实体商店的面对面交易, 进展到网络与行动支付, 上述的物联网将日常的买卖行为全盘自动化。而自定义的虚拟货币提供了弹性的交易媒介, 各种交易可以先以自定义虚拟货币交易, 接着转为如以太币等区块链上原本的主要货币, 再转为一般实体世界的法币, 如此一来在区块链开启一个新的应用, 不需要有原本该区块链上的可能已经飙涨的预设虚拟货币, 而可

以用自定义货币进行交易。这变化也扩展了区块链的应用，不可修改的数据库结合自动转账，提供订阅机制，所以开始有项目开发给予新闻产业应用的区块链与自定义虚拟货币，透过区块链上的直接交易，降低过度依赖广告收入，同时他们也试图透过区块链解决目前网络新闻上最常出现的二个议题——假新闻与造成同温层的推荐算法。以下会透过介绍区块链在新闻传播上的可能应用，说明如区块链如何处理假新闻；而其所产生的线性新闻并陈方式，则会在区块链在传播应用上的可能影响与意义中，讨论其对目前新闻同温层所可能产生的作用。

肆、区块链在新闻传播上的可能应用

区块链所具有的不可抹灭性，被视为或许可以利用于处理近年日益严重的假新闻议题。伴随着各式网络社交媒体出现，假新闻的问题越来越为严重。如 Jacob L. Nelson 与 Harsh Taneja (2018) 以美国 2016 年的总统大选为例，指出假新闻的流量大部分从社交网络而来。随着越来越多人透过社交媒体阅读新闻，尤其是 Facebook (Newman et al., 2018, pp.10-11)，而非透过直接透过新闻网站或者是行动装置 app，假新闻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Balmas (2012) 已经指出当读者接触越来越多的假新闻，越有可能将假新闻将当作真实。为了确认新闻的真实性，对于新闻的事实查核 (fact-checking) 也越来越为被重视 (Graves, 2016)。

但是假新闻的形式相当多样化，例如以娱乐或小道消息的形式出现 (Otto et al., 2016)。对于主流媒体的不信任感，间接也促成了大家愿意相信在社交网络上，朋友所提供的消息 (Marchi, 2012)，或者是符合自己意见倾向的新闻 (Allcott & Gentzkow, 2017)。

因为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的泛滥，影响了美国 2016 年的总统选举 (Allcott & Gentzkow, 2017)，在饱受批评之后，Twitter 吊销了疑似由俄罗斯赞助的散布假新闻的账号 (Twitter Public Policy, 2017)，而 Facebook 在 2018

年 5 月对于如何处理其上的假新闻发表了三项声明 (Hegeman, 2018, May 23) :

- (一) 「面对假新闻」(Facing Facts) 短片：在这部十二分钟的短片当中，他们描述 Facebook 的动态消息团队 (News Feed) 如何利用技术与人工移除假新闻。
- (二) 新闻识读宣传活动：提供读者如何判别假新闻与错误信息的方法，这个活动会持续一整年，并且出现在每一个国家使用者的动态消息上方。
- (三) 委托学界测量错误信息：邀请学界提出计划书，进行错误信息在 Facebook 上的数量与影响进行研究。Facebook 会提供资金与经过隐私保护处理的数据，协助学者进行研究。

Facebook 对于假新闻的处理方式是进行人工与技术的事实查核，Google 则是会在 Google 新闻页面的“Fact Check”字段放上已经经过事实查核的文章¹⁸。不过也隐含着他们可以移除他们觉得是假新闻的文章，反而可能是另外一种箝制言论自由的审查机制。相较于言论审查，或许可以藉由验证发文者的发文内容与纪录，提供读者自己进行判断文章的可信度。当读者从社交网络上获取的新闻信息的时候，他们并不会知道在层层分享与转贴的文章背后，其真正的源头为何。对于假新闻的处理，可以透过区块链的每一笔数据都是串接在一起的一条链，而非是如同网络是四散的各个独立节点，所以可以藉由追踪假新闻源头，揭露产出者的身份。或者是利用网络上的网友的验证，建立如同比特币的工作证明的共识机制，当有足够多的读者认证新闻的正确性后，才会将其加到区块链上，阻止虚假新闻的扩散。后文将会介绍的 Civil，其甚至是藉由没收区块链上的货币，藉以惩罚新闻造假者，用以增进新闻质量。在案例分析时，会介绍现在发展中的新闻区块链计划如何利用区块链与其他技术来达到遏止假新闻的扩散。

¹⁸ https://support.google.com/news/answer/1217612?hl=en&ref_topic=2428791

伍、区块链在传播应用上的可能影响与意义

如果说区块链作为一条唯一的链可以做为追踪假新闻的源头，单一的链也同时将新闻内容平等地放置在同一平面上，可能会改变了当代社会的网络新闻，是由社群网站的算法决定用户会看到何则新闻的现象。

随着阅读新闻的来源主要来自于网络，许多网络新闻平台公司纷纷提出各自的推荐系统算法，其因为根据读者过去的偏好，而提供给读者特定类型的新闻，或者是过度呈现或降低某些新闻来源 (Haim et al., 2017)。

如同路透社的调查显示随着越来越多人透过 Facebook 观看新闻 (Newman et al., 2018, pp.10-11)，许多新闻的点阅率是掌握在 Facebook 身上，如 Facebook 会刻意操作使用者的阅读经验，或者是根据算法推荐用户根据他们偏好所产生的推荐文章，这样会导致使用者看到自己感兴趣的文章，而当他们一更改算法，就有可能造成新闻点阅率的暴升或暴跌 (Owen, 2018, April 19)，所以有必要对于一般推荐系统的算法原理有所认识。推荐系统的算法的种类，通常是分成三类，内容为主 (Content-Based Filtering)、协作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与混合型 (Desrosiers & Karypis, 2010)。内容为主是根据文章内容分类，根据读者目前看的文章类型，推荐读者看相同类型的文章，比如《联合新闻网》的产经分类页面的新闻，下方的推荐文章皆为产经相关¹⁹。协作类型则是推荐使用者其他与该使用者有类似的偏好的人所看过的文章，比如 Google 第一代的个人化新闻推荐 (Das et al., 2007; Jiahui Liu et al., 2010)。混合型则是指结合内容为主与协作二种类型，这也是现今 Google 新闻所使用方式²⁰。

Facebook 推荐给读者的文章，是从他们阅读的文章内获取感兴趣的内容倾向，依据读者的兴趣给予推荐的文章。他们的文本理解引擎称为 DeepText，其会根据文章的文本内容对应到相关的主题 (Abdulkader et al., 2016, June, 2)。他们会从粉丝页的文章，分析其内容文本，训练出内容与主题对应的模型。如在足球队的粉丝页，他们检设在其上的文章都是与该足球队有关，就依据这个假设，建立兴趣分类器。只要使用者阅读或者是发表跟足球粉丝页

¹⁹ <https://udn.com/news/cate/2/6644>

²⁰ <https://support.google.com/news/answer/40213?hl=en>

文章内容相类似的文章，就判断使用者对该足球队有兴趣，这个分类器称为 PageSpace。他们采取的是内容为主的推荐系统，这也造成了当读者观看或发表越多同性质的文章，就只会看到相类似的推荐文章。

Facebook 的推荐系统与其他推荐系统而言，存在着「回馈循环」(Feedback Loop)。当 Facebook 根据内容推荐的文章，会按照优先性排序，同时也会根据使用者的点阅状况进行调整，这也造成了优先性排序低的文章，用户不容易看到，系统会因为用户没有点阅该类型的文章，而将这类型的文章更往后排序，使用者有可能永远都看不到该则文章 (Rader & Gray, 2015)。

新闻的推荐系统既是根据读者的偏好而去产出，但这也带出一个问题，推荐系统对于文章的分类的问题，同一个议题有可能是正反面的论辩，当读者偏好看正面的文章的时候，系统会持续给他看正面的文章，而 Facebook 的回馈循环则更是会强化这样的现象。这其实必须回到是否能给读者看到更多文章选择的可能性。《纽约时报》的创新报告曾经提到针对读者客制化的问题，这或许是一个好的改变方向。他们提到读者到《纽约时报》看文章内容，是想看《纽约时报》可以提供甚么样的新闻信息，而非单是《纽约时报》要提供读者想看的新闻，但是在客制化的层面上，他们主要是以内容为主，如果读者对于某则新闻感兴趣，他们会列出与这新闻相关的其他信息，提供够多的信息，而非仅是根据读者的偏好，是可能可以改善同温层的问题 (New York Times, 2014, March 24, pp. 37-42)。如果从点线面的设计来看，社群网站是将个别新闻作为个别独立的点而呈现，读者藉由观看个别节点从而形同质度高的面（同温层），读者们所观看的内容会都是节点彼此连接的性质类似的新闻。区块链的单一链的设计则是将相异的新闻都同时放在一个直线上，读者阅读的新闻内容会同时伴随着时间上相近的新闻，而不是观点相近的内容，这有助于读者阅读到更多不同观点的文章。

在案例分析中所介绍的 Matters，也会提及他们透过区块链建立作者的声量与权重，推荐在区块链上声量与权重相对高的作者所写的文章，将读者拉出只看自己感兴趣的新闻的推荐系统的同温层。

陆、研究方法

本文将讨论现有将新闻产制销售与区块链结合的三个计划 Civil、Bitpress 与 Matters，藉由分析这三个相关计划对于上述假新闻与推荐系统的解决方式，以及他们在新闻产制、传播与读者群设定的相似与差异之处。各个区块链在正式对大众开放前，会发布白皮书（Whitepaper / White Paper）说明自己系统的特色与规格，目前 Civil 与 Bitpress 都已经发行白皮书，而 Matters 则将类似的内容称为「项目草案」²¹。截至本文写作期间，Bitpress 还没有正式开始运作，只有 Civil 与 Matters 开始开放部分已完成的网站内容，所以在案例分析的时候，主要是参考已开放的新闻网站、白皮书与相关文件。在介绍完三个计划之后，将会综合分析其特色，并且讨论利用区块链建置新闻推荐与购买系统是否可行。

柒、案例分析

一、Civil²²

Civil 是由一家位于美国纽约的 Civil Media 公司负责开发以区块链为基础的新闻交易平台，Civil Media 将 Civil 定位为一个协议（protocol）、软件（software）以及生态系统（ecosystem; Iles, 2018, May 5）。Civil Media 对于 Civil 的成立目的与构成系统说明，主要是写在《Civil 宪法》（Civil Constitution）（Iles, 2018, May 5）当中。Civil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可以让新闻业可以获得维持下去的资金，不过他们更是着重在新闻自由与社群自我管理，如在《Civil 宪法》中所述的 Civil 致力于服务需要自由、公平与正义的条件，用以完成新闻使命的 Civil 公民。同时 Civil 寻求建立可以达成新闻使命的条件，同时也可以维持生计，使得新闻不会因为被政府、商业与特殊利益的团体不正义的法律、经济压力、威胁与暴力，而影响、控制与停止收集与传布公众层面的事实、意见与想法。而 Civil 为了达成上述的目标，透

²¹<https://goo.gl/7oLtkX>

²²<https://civil.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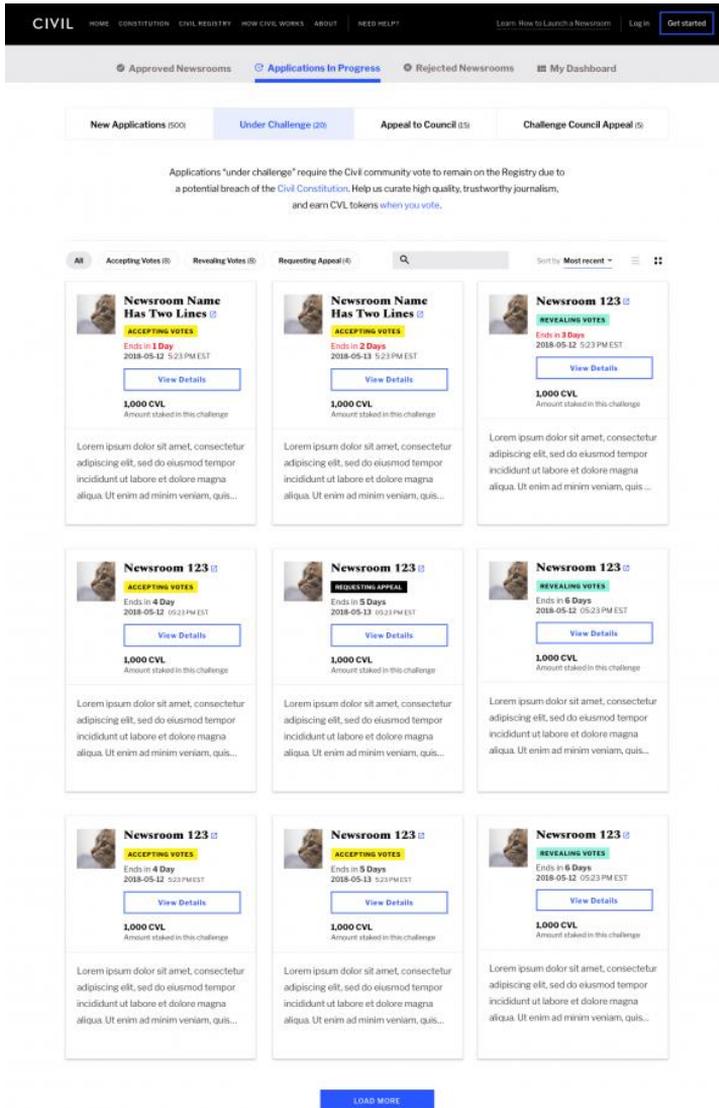
过以区块链与虚拟货币经济建筑的自我管理协议，创造永久且不可被更改的新闻纪录，而以上的方式是由公众所拥有与营运，使得公众可以要求记者对于新闻内容负责，并且给予记者直接的赞助。

《Civil 宪法》当中说明他们将会用以太坊区块链作为他们的开发平台，并且会开放其原始码。Civil 希望所开发出来的软件可以确保新闻可以发布与传输，且藉由存放新闻数据在区块链上，可以使其永久存在且无法删除。同时该软件可以协助新闻记者可以在 Civil 平台上，找到对于他们新闻报导感兴趣的读者大众，如此一来记者可以从大众取得经济收入。对于读者而言，Civil 软件可以帮助他们找到、赞助、委托、消费，甚至是贡献新闻。不只是做为一个单一面向的软件，Civil 也计划可以藉由之后对软件的扩充，以及与其他软件之间的结合，使得大众可以找到他们想要赞助与联系的的记者。虽然软件是由 Civil 开发，但是软件的营运与管理是由参与者负责。在章程也说到，他们希望将所开发出来的软件尽可能让 Civil Media 本身无法去干涉当中的管理 (Iles, 2018 , May 5)。

Civil 的生态环境包含了 CVL 货币 (CVL)，其是运用以太坊的产生货币用的智慧合约²³，产生 Civil 上的虚拟货币 CVL，以及货币持有者。Civil 的社群则是包含了所有参与 Civil 生态环境的人，无论是否持有 CVL 货币。而新闻编辑室 (Newsroom) 是 Civil 最基本的运作单位，可以是由个人或者是群体组成，同样也可以是货币持有者，Civil 目前有十家以上的新闻编辑室，同一个新闻产制者可以出现在多个新闻编辑室 (图三)。新闻编辑室代表 (Newsrom Officer) 则是代表新闻编辑室的人。如上段所述，Civil 拥有自己的宪章 (Charter)，想要加入 Civil 的新闻编辑室必须同意该宪章。另外，Civil 有一个登记名册 (Civil Registry)，由 Civil 内的货币持有人，决议通过得以加入 Civil 的新闻编辑室的列表 (图四)。Civil 也组织了一个基金会 (Civil Foundation)，其是一个独立的组织，负责协助 Civil 营运，并且选出 Civil 委员会的创始成员。Civil 委员会可受理货币持有者诉愿的单位，其可以推翻社群的决议，但是社群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否决委员会的决定。

²³ https://theethereum.wiki/w/index.php/ERC20_Token_Standard

图三：Civil 新闻编辑室的示意图



图四：Civil 登记名册

The screenshot displays the Civil Registry website interface. At the top, there is a navigation bar with links for HOME, CONSTITUTION, CIVIL REGISTRY, HOW CIVIL WORKS, ABOUT, and NEED HELP?. A user is logged in, and there is a 'Get started' button. The main heading reads 'Civil Registry' and states: 'The Civil Registry is a whitelist of community-approved newsrooms that have publishing rights on Civil. Learn how to participate in our governance.' A prominent blue button says 'APPLY TO JOIN REGISTRY' with the note '1,000 CVL required to apply'. Below this are navigation tabs for 'Approved Newsrooms', 'Applications In Progress', 'Rejected Newsrooms', and 'My Dashboard'. A paragraph explains that approved newsrooms align with the Civil Constitution and are subject to community review. The main content area is titled 'All Approved Newsrooms (15)' and features a grid of newsroom profiles. Each profile includes a logo, name, approval date, CVL amount, a 'View Details' button, and a short description. The newsrooms listed are: Block Club Chicago, Cannabis Wire, Documented, Hmm Daily, Popula, Sludge, Stable Genius Productions, The River, and The Small Bow. A 'LOAD MORE' button is located at the bottom of the grid.

Civil Registry
The Civil Registry is a whitelist of community-approved newsrooms that have publishing rights on Civil.
Learn how to participate in our governance

[APPLY TO JOIN REGISTRY](#)
1,000 CVL required to apply

[Approved Newsrooms](#) | [Applications In Progress](#) | [Rejected Newsrooms](#) | [My Dashboard](#)

All approved Newsrooms should align with the [Civil Constitution](#), and are subject to Civil community review. By participating in our governance, you can help curate high-quality, trustworthy journalism.

All Approved Newsrooms (15)

Newsroom Name	Approved Date	CVL Amount	Description
Block Club Chicago	2018-05-12 05:23 PM EST	1,000 CVL	Block Club Chicago is a nonprofit, neighborhood news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delivering reliable, nonpartisan and essential coverage of Chicago's diverse neighborhoods.
Cannabis Wire	2018-05-12 05:23 PM EST	1,000 CVL	Cannabis Wire is an independent publication covering the multi-billion dollar cannabis industry, focusing o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mplexities that come with legalization.
Documented	2018-05-12 05:23 PM EST	1,000 CVL	Documented covers New York City's immigrants and the policies that affect their lives. We are an independent and nonpartisan publication.
Hmm Daily	2018-05-12 05:23 PM EST	1,000 CVL	A place to say the things nobody else might say and to listen for the things we haven't heard yet. Led by farm Gawker / The Awl editor Tom Scocca.
Popula	2018-05-12 05:23 PM EST	1,000 CVL	Popula is an alt-weekly. But alt-daily. And local to the world publication. Brought to you by leading voices from the New Yorker, LA Times, The Village Voice and others.
Sludge	2018-05-12 05:23 PM EST	1,000 CVL	Sludge investigates the shadowy ways that special interests captured America's political system, revealing hidden networks and conflicts of interest.
Stable Genius Productions	2018-05-12 05:23 PM EST	1,000 CVL	Stable Genius Productions is on a mission to help people navigate personal and global change.
The River	2018-05-12 05:23 PM EST	1,000 CVL	The River is the Hudson Valley news outlet offering in-depth coverage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on issues of national importance, investigating underreported topics and connecting the region to...
The Small Bow	2018-05-12 05:23 PM EST	1,000 CVL	The small bow is an independent, editorially-minded voice, revealing the ignoble truths about addiction and recovery.

[LOAD MORE](#)

Civil 使用智能合约将新闻内容写出区块链之中，合约中包含了作者、内容与更新版本等信息（图五）。

图五：Civil 发布内容的智慧合约²⁴

```
@dev Emits `ContentPublished`, `RevisionUpdated` and optionally `ContentSigned` events
*/
function publishContent(
    string contentUri,
    bytes32 contentHash,
    address author,
    bytes signature
) public requireRole(ROLE_EDITOR) returns (uint)
{
    uint contentId = contentCount;
    contentCou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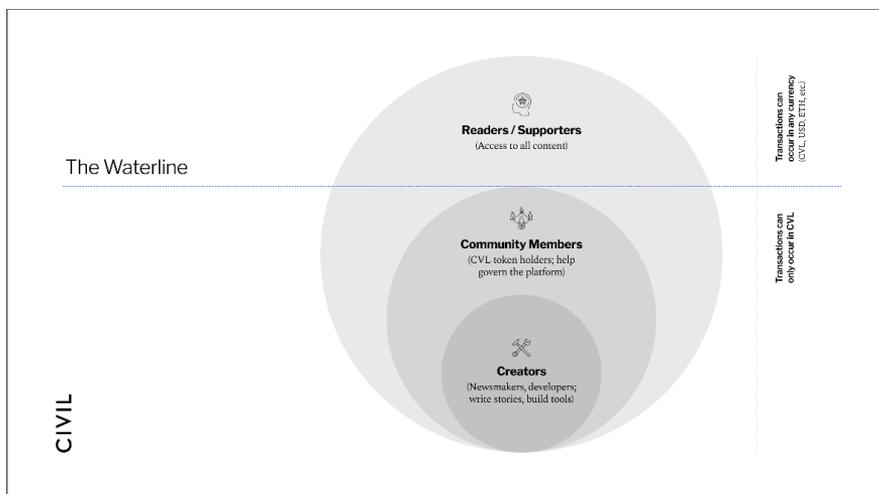
    require((author == 0x0 && signature.length == 0) || (author != 0x0 && signature.length != 0));
    contents[contentId].author = author;
    pushRevision(contentId, contentUri, contentHash, signature);

    emit ContentPublished(msg.sender, contentId, contentUri);
    return contentId;
}
```

理想上，Civil 的读者可以在不知道任何虚拟货币的知识下，利用他们原本的货币购买新闻内容。Civil 设定了一条水线（Waterline）区分法币与 CVL 的应用范围（图六）。在水线之上，读者与其他新闻赞助者，跟新闻编辑室之间的交易，是使用任何法币；水线之下，在 Civil 中要参与投票与检举等机制，则必须持有 CVL 货币。在稍后介绍的 CVL 币发行方式，可以看到想要购买 CVL 货币，需要有相同程度的虚拟货币知识，这也有可能对于一般想要购买 CVL 货币的读者造成阻碍。

²⁴<https://github.com/joincivil/Civil/blob/master/packages/contracts/contracts/newsroom/Newsroom.s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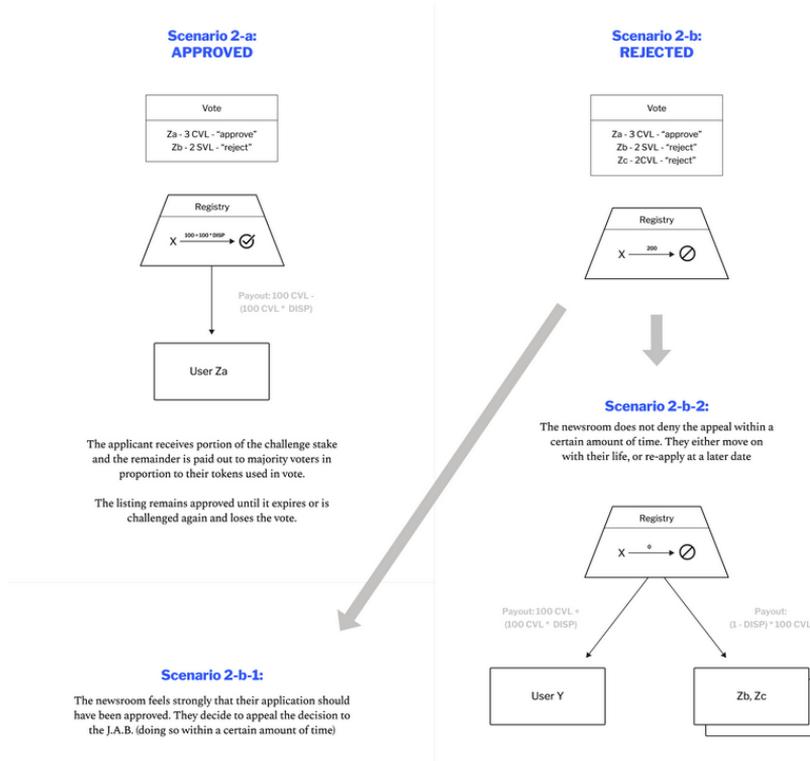
图六：Civil 平台上的读者、社群成员与新闻产制者之间的关系示意图²⁵



Civil 的创立目标与系统构成，都相当着重于系统内部成员的自我管理，Civil 采取的是社群内的投票机制。在 Civil 的白皮书当中 (Iles, 2018, May 11) 说明，当有一个新的新闻编辑室想要加入 Civil，必须说明其目标、读者社群，以及如何在社群中获取经费，与运用经费。接着是送出名册、签署《Civil 宪法》，最后则是需要购买货币。当以上的程序完成，申请者必须支付 CVL 货币作为押金，将申请书送到社群内进行审核，社群的参与者如果对该编辑室有意见，可以对新闻编辑室进行挑战 (challenge, 图七)，由社群内的人进行投票，如果投票结果对于新闻编辑室有利，则挑战者所拥有押金就会被分给新闻编辑室与投多数票的参与者；反之则新闻编辑室就会被移除于登记名册外，同时押金要分给挑战者与投多数票的参与者。如果使用者对于 Civil 委员会的决议不满，也可以利用 CVL 货币的押金进行诉愿与挑战，也可以要求委员会修改系统参数。需要更动到《Civil 宪法》层级的修改，会需要修改智能合约。

²⁵ <https://joincivil.com/how-it-works/>

图七：Civil 的挑战机制²⁶



Civil 的新闻编辑室在 2018 年 6 月 11 日陆续上线，一开始仍然是一般由 WordPress 所建置的网站 (Owen, 2018, June 13)。Civil 虚拟货币 CVL 的公开贩卖，要到 2018 年 9 月才开始进行。CVL 的贩卖是委由 Token Foundry 网站²⁷，根据网站内容，CVL 币的总数量是一亿枚，开放给使用者购买的数量是 3400 万枚，最低购买数量是 70 枚，一个 CVL 币兑换 0.71 美元²⁸。其规定如果要加入该网站购买虚拟货币，必须通过需要一定程度的区块链知识测验。不过其内容颇为困难，即使是 Civil 当中的新闻编辑室 ZigZag 的共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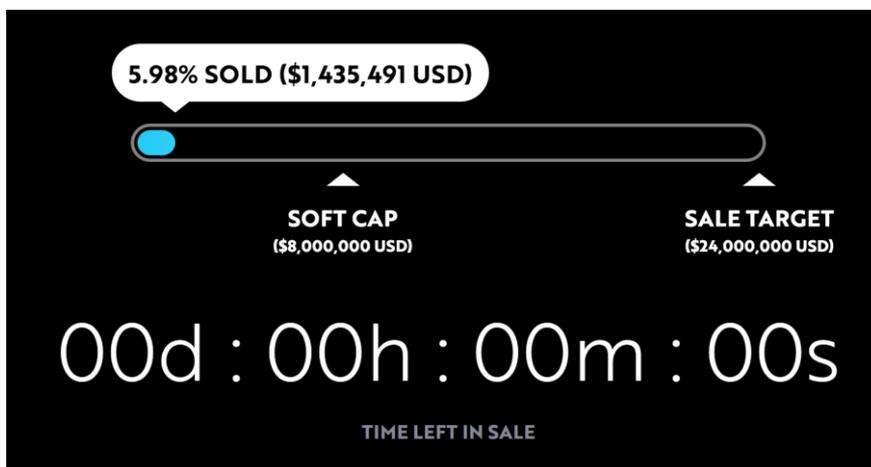
²⁶ <https://joincivil.com/how-it-works/>

²⁷ <https://tokenfoundry.com/>

²⁸ <https://tokenfoundry.com/projects/civil>

创立者也无法通过测验 (Wang, July 25, 2018)。这也反映即使当初希望能让一般读者不需要懂得区块链的知识, 也能在 Civil 上进行消费的目标, 必须面临到与第三方货币代售商既有规范的冲突。此外, 因为 CVL 是建构在以太坊区块链的智能合约之上, 使用者也无法透过一般的货币购买 CVL, 而必须透过以太坊的以太币 (ETH) 购买 CVL (Coolidge, 2018, August 3), 这也增加了购买流程的复杂度。Civil 此次的货币发行因为没有达到预设的购买数目, 仅销售出预期的 5.98%, 所以在 2018 年 10 月 15 日宣告失败, 也必须将所有募得的款项还给购买者。他们计划在未来简化购买货币的流程, 再进行一次货币发行募资 (Owen, 2018, October 16)。

图八 : Civil 仅销售出预期的 5.98%²⁹



二、Bitpress³⁰

²⁹http://www.niemanlab.org/2018/10/civils-token-sale-has-failed-now-what-refunds-for-on-e-thing/?utm_source=Daily+Lab+email+list&utm_campaign=1d802c524b-dailylabemail3&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d68264fd5e-1d802c524b-396233593

³⁰ <https://bitpress.network/>

Bitpress 是由美国一家专门将传统的媒体广告转为在线内容的公司 OwnLocal 所开发，在他们的白皮书当中，一开始就定位 Bitpress 的作用如同比特币对于金钱，他们描述自己是「Bitpress 以区块链为基础的信任账本，这个账本可藉由记者的去中心化网络，可以用来决定新闻的可信度 (Bitpress is a blockchain--based ledger of trust that leverages a decentralized network of journalists to determine the credibility of news.)」(Armbrust et al., 2018, March 10, p.1)，他们提到以下几点他们系统可以让个人记者或者是新闻组织依照他们原本的报导样式出版，同时可以对发表的文章内容进行可信度投票。而认证产生的结果也同时作为辨识共识与偏见之用。他们藉由将数据纪录在公开与透明的分布式区块链系统上，预防审查与允许信息的自由交换。这个系统将会对于包含新闻组织、记者与读者的参与者有所报酬回馈，建立一套新闻业可以维持生计的新模型。

Bitpress 认为网络重新定义了人与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传统媒体所扮演的信息守门员的机制已经不存在于读者与信息中间，人们从 Google 搜寻、Youtube 影片与社交媒体中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信息。而他们也指出了目前媒体业面临到广告与订阅率的下降，而主要的广告收入反而是被 Google 与 Facebook 这类聚集媒体新闻内的公司所赚走。财务上的紧缩，使得不少媒体公司都必须缩减人力，而这也导致了能花在事实检查上的人手不足，造成新闻质量的低落。

他们所提出的 Bitpress 的概念，是将原本存在于新闻产业中的新闻记者、新闻组织、出版商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利用区块链当中的「交易」的概念链接在一起。XBP 是 Bitpress 当中的交易货币，其可以用于小额支付、付费墙与订阅制度中，这三种制度都是透过智慧合约完成。出版商可以设定针对一篇文章付款，也可以设定针对区块内的所有文章预付款项。出版商也可以设定阅读期间的订阅制，所有使用者也可以设定当他们在阅读区块链上的文章时，自动付款给出版商。

告示板是被送到 Bitpress 网络内的书写内容，其同时也是作为建构区块链的基本区块，当出版商要将告示板发送到 Bitpress 的网络上时，需要依照网络拥挤状况与内容大小支付 XBP。这个机制是用以防止广告内容，告示板

可以以文章的形式发表，其内容为新闻故事，以及对于其他文章的引用与评价。每一个文章必须包含一个作者与出版商，当文章被发布到网络上时候，就由某个网络上的威力节点（Power Node）将这个类型的告示板写入到区块链之中。如何将文章呈现给读者，则是由与区块链串接的应用程序决定。另外一种发表形式是赏金，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告示板，其上面可以标注想要看到来自哪个作者或者主题的文章，然后给予赏金。其他出版商与作者也可以竞标赏金。其他使用者也可以藉由小费增加整个赏金告示板的赏金额度，但是赏金越高并不代表由赏金而产生的文章有更高的可信任度。当文章有误的时候，可以藉由勘误形式的告示板更新有错误的文章。因为区块链的内容无法修改，所以是将勘误附在文章之后，产生新的告示板加入到区块链之中。而用户端的应用程序，在发现有勘误的文章出现，就显示更新过后的文章，而不是原始文章。勘误可以增加新闻的透明度，藉以检视某个出版商是否一直出错。作者也可以自己发表勘误，不一定要依靠出版商。

新闻文章可以彼此引用，引用同时也是 Bitpress 中的可信度评价 BPR（Bitpress Rank）基础的一部分，但是也是其用来打击假新闻的方法之一。引用是镶嵌在告示板之中，当中会标示网址或者 Bitpress 网络内的文章标号，可以给予正面或负面的评价。系统层级的告示板，如勘误与赏金的引用中的评价皆为中性，因为其并非是用于评估文章内容。

在 Bitpress 网络中的参与者，有作者与出版商这两种账号类型，示意图如图九。作者账号可以发布文章与赏金告示板，但是如果发布其他类型的告示板就必须有出版商账号，作者的网络地址就是他们收款项的虚拟货币的钱包地址。出版商账号是作为 Bitpress 上的一个网络节点，其作用就类似现实世界中的新闻组织。出版商可以发任何形式的告示板，且负责让 Bitpress 网络内的人都能收到。出版商要发布文章与赏金告示板，必须至少包含一个作者在内。除了购买告示板的文章增加出版商的收入外，还可以透过智慧合约，进行捐款给出版商。

Bitpress 采用的共识协议是信任证明，如同共识协定在比特币中是用于验证产生的区块是否是有效，Bitpress 的共识协议也是用于产生有效的区块。其产生的区块链的方式混合了工作证明（Proof of Work, PoW）以及股权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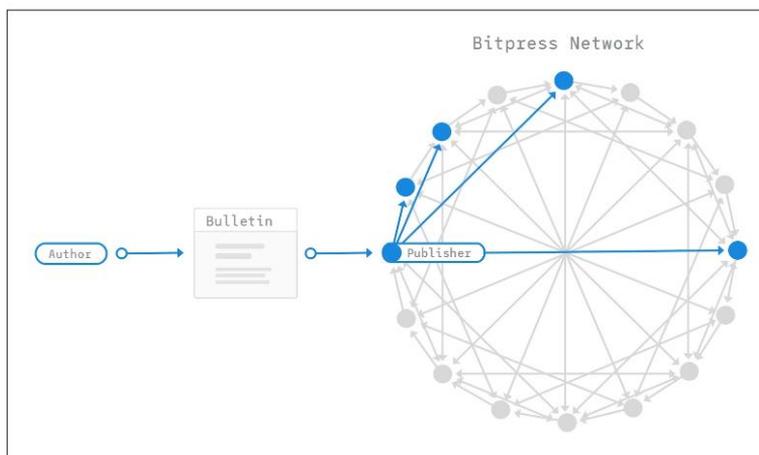
(Proof of Stake, PoS)。产生新的区块需要计算累积到前一个区块的 BitpressRank，这部分仍然是采用工作证明的方式，但是越有诚信的新闻组织，越有机会被选为创造出新的区块的人选，则是采取股权证明的方式。BitpressRank 是 Bitpress 网络内用来评量新闻可信度的方式。计算的方式的步骤如下：

- (一) 第一步先计算出版商的信任值。这是根据出版商各自所有告示板内的正面引用跟负面引用的数目，也就是其对于其他出版商的评价。单个出版商各告示板的评价，最后会汇总为 Bitpress 网络内该出版商的总评价³¹。
- (二) 第二步是计算告示板的信任值。这是根据其他告示板的引用连结到该告示板所给予的信任数值，这个是参考了 Google 在网页重要度排名所使用的 PageRank 算法³²，信任度比较高的出版商的告示板内引用的连结所产生的重要性，会高于信任度比较低的出版商所产生的重要性。为了确保这个计算只考虑到可信任的来源，所以出版商可以给予其他告示板的信任数值，会根据给予的出版商本身在系统内的信任数值给予权重计算。
- (三) 出版商本身必须拥有一定数目的被引用，才会被视为是可信任的来源。同时如果出版商持续活跃于网络中，就会给予较高的信任数值，反之则会调降其信任数值。

³¹ 這邊 Bitpress 的白皮書的演算法並沒有很明確寫明總評價是給予給評價的出版商，或者是被給予評價的出版商，有待之後更詳細的資料。

³²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geRank>

图九：Bitpress 网络内的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关系示意图³³



三、Matters³⁴

相较于 Bitpress 与 Civil 皆是以新闻为主要的內容产生与传播, 以华文世界读者为对象的 Matters 则是将自身定位为「基于社群的 UGC 优质内容生产平台」(Matters, 2018), Matters 要解决的问题是「好内容到底要怎么活下去」。创办人之一的张洁平认为现在的网络技术只为广告服务, 而严肃的深度内容无法吸引到很多流量, 造成收入无法养活内容生产者 (李柏锋, 2018 年 4 月 9 日)。Matters 参考 Steemit 的商业模式, 希望能让内容生产者获得收入, 持续产生优质内容, 其接口也类似 Steemit (图十)。

³³ <https://bitpress.network/assets/bitpress-whitepaper.pdf>

³⁴ <https://matters.news/>

图十：Matters 发言列表³⁵

Matters 的虚拟货币称为 MAT，在 Matters 发文的人必须支付 MAT 作为发表费用。社群互动参与者藉由参与文章的讨论与点赞，可以获得 MAT 作为回馈。除了个人外，还有机构参与者，透过 Matters 所提供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建置专属分布平台与购买文章版权，以及散布内容。持续产生优质内容的人，会拥有比较高的信用度。这个评价机制是希望能将人拉出同温层，看到优质文章，而不是大家都在看的文章。他们也允许实体商家，利用 MAT 来进行交易的店家，如购买咖啡（李柏锋，2018 年 4 月 9 日；Matters Lab，2018 年 5 月 31 日）。

一般的使用者，无须付费即可以看到内容，但是在 Matters 按赞的人必须付费。资深用户与资浅用户同样花一个 MAT 币按赞，会根据权重计算作者收到的 MAT 币的数目，从资深用户收到的 MAT 币数目会比较多。Matters 有公共基金的机制，总共有—亿枚 MAT 币，上述赞赏从资深用户取得较多的 MAT 币，多出的 MAT 币是由公共基金给予。另外有货币储备，总共有九亿枚 MAT 币，用于维持货币汇率稳定。之后会区分投资货币，用于投资，

³⁵ <https://matters.news/>

有可能升值；消费货币，用以给予赞赏（李柏锋，2018 年 4 月 9 日；Matters Lab, 2018 年 5 月 31 日）。

相较于前二个区块链计划，Matters 拥有最复杂的架构，根据其架构图（图十一），他们拥有三个区块链，分别为智能合约（智能合约）、交易纪录与内容区块链。前二者目前所知只有一条区块链，这也使得 Matters 必须处理链与链之间的同步，增加了操作上的复杂度。

图十一：Matters 架构图³⁶



Matters 产生区块的规则也相当复杂，用户如果想产生区块，其计算机不只要具有完成解题的能力（Proof of Work, PoW），同时期计算机还必须要具有储存够多的内容，用以分享给其他人的能力（Proof of Sharing, PoSh），但是要具有一定的权重（Proof of Value, PoV），这也使得区块的产生可能会偏向由具有储存空间够大，以及较早参与 Matters 而权重较高的人所取得，不利于一般使用者参与产生区块。而其类似计划经济的货币储备规划，也使得 Matters 需要有一个中央单位持续监控货币汇率，与区块链所讲求的去中心化特性背道而驰。

³⁶ <https://goo.gl/qdcRfg>

四、综合比较与分析

上述三者皆提出要藉由区块链建立产出优质内容的平台，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如表一。

表一：三个区块链平台的比较

	Matters	Bitpress	Civil
区块链选择	超级账本	以太坊	以太坊
公有链或者是私有链	私有链	私有链	暂时无信息
共识机制	PoW、PoSh、PoV	结合 PoS 与 PoW	PoW
发文是否需要付费	是	是	无
评价机制	读者针对文章进行评价	对出版商以及出版商的引用来源进行评价	针对新闻编辑室进行评价
是否去中心化	早期由少数成员确认整体议题风格，之后也是会员申请也是要经过社群同意	由 Bitpress 决定拥有多少信任值以上的出版商，才能进行公告板的信任值计算	委员会有权推翻社群决议，社群成员也能透过支付押金进行申诉
虚拟货币转法币机制	交易所	未来可以与其他虚拟货币转换	交易所
货币类型	自创货币	以太坊 ERC20 规格的自创货币	以太坊 ERC20 规格的自创货币
发文者如何获取收益	获得 MAT 币	获得 XBP 币	获得 CVL 币
呈现型态	独立平台	镶嵌于其他网络应用，如网页	独立平台
推荐系统	编辑与社群推荐	引用与出版商	暂时无信息
假新闻处理方法	暂时无	BPR 信任度	挑战机制

区块链与推荐系统以及假新闻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直接，但是 Bitpress、Matters 与 Civil 都提到了维持新闻质量这个功能，可以看出他们的新闻系统并非单只是购买系统，而且也是一套新的新闻管理系统。他们希望在这个系统中建立新的审查机制，或者说信任评价机制 Bitpress 采取较为去中心化的新闻内容管理方式，依靠计算信任值，Civil 提到了 Wikipedia 的自我管理方式，藉由不同使用者的彼此审查，确认新闻的可信性。Matters 则是会有中央或者是他们所谓的社群的审查内容可信的问题。虽然张洁平强调不应该像新闻编辑部由少数人设定议题与避免同温层，但是她选择由少数意见领袖设定 Matters 用户的格调（李柏锋，2018 年 4 月 9 日），这个方式同时建立具有同样格调与限定议题于意见领袖所感兴趣的领域的用户同温层。这与区块链本身的去中心化的特性不同，所以他们需要在区块链之上再加上额外的软件架构，用以实作他们对于内容管理的要求。

而对于新闻内容的评价部分，Bitpress 的信任值计算对于原本比较有名与资金比较充裕的新闻媒体公司比较有利，Civil 提供的是相较之下较为地方化的新闻收费解决方式，他们协助地方的新闻媒体可以从区块链中获取营运的资金，如“Chicago Block Club”是由原本芝加哥的地方新闻媒体被解散的“DNAInfo Chicago”的成员，在 Civil Media 的协助下，获得资金，在 Civil 的区块链上建立他们的新闻编辑台（Stevens, 2018, February 6）。

区块链本身的货币机制，使得新闻产业的产出可以相对独立，有新的系统方式，而不必依赖既有的生态系统。而且虚拟货币在这三个平台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仅仅是单纯的交易功能，Civil 利用是否持有 CVL 货币来决定是否有权进行投票与挑战，这类似唯有持有公司的股票的股东才能在股东会上投票，不过他们也面临必须能成功吸引够多的投资人，愿意购买他们所发行货币，才能使该机制运行，所以当他们的第一次的货币发行失败之后，也使得该制度无法成功建立。Bitpress 则是发文者也必须付费，其用意是避免滥发广告信，但也同时建立起唯有持有货币且具有出版商账号的人，才能在 Bitpress 平台上发布新闻以及评价其他出版商。而 Matters 的货币机制是目前三者当中最复杂的，因为其具有权重机制，导致每一个货币的价值不相等，同时又有外部能进行汇兑的货币，以及内部的私有货币，而这当中的交换机

制的控制权完全掌握于 Matters 本身，相较于其他二者藉由持有货币成为藉由挑战与引用，具有影响平台上新闻评价的成员，Matters 的货币持有者对于新闻只有购买的功能，而同样的货币在权重机制下，会因为给予货币者的身份的差异，发文者所实际收取到的金额会有所不同，这有可能导致发布新闻者都只发布能给予较多货币者所喜欢的文章，造成了 Matters 所一直强调要避免的同温层。

同时，区块链新闻生态体系对于新闻媒体而言，跟过去以往的现金收入不同，所有的交易的收入都是来自于虚拟货币，尤其是根据以太坊的 ERC20 规格的自创货币，其货币价值是发行者决定，当需要将虚拟货币转为现实世界的货币的时候，交易过程又是再中心化，而交易所不如实体银行的保安措施完善，往往也伴随着较高被黑客攻击的风险（Al-Saqafa & Seidler, 2017, 343）。记者或者是新闻媒体公司必须到交易所才能兑现为法币，同时也伴随着不稳定的币值汇率变化，记者的收入如同股票一般时时刻刻都有高低起伏。

这三个项目目前都还没有真正将内容与区块链结合，如果根据区块链原本的设计，当区块链上的区块越多，每次要将交易纪录埋入区块中的时间就越长，虽然读取文章内容的速度快，但发文与购买文章所花费的时间越来越长，而这或许是必须要克服的严重技术问题。同时原本区块链是会将区块链存放在包含 Bitpress 等交易平台的拥有者，以及一般用户的计算机当中，但是随着区块链越长、纪录内容越多，档案会越来越大，会越来越占据用户的计算机空间，降低用户使用新闻区块链的意愿。

另外，如果将新闻内容都放在区块链上，因为区块链上的内容，每一个使用者都可以看得到，就必须在先将新闻做加密后存放在区块链上，而当使用者要读取新闻内容，再由用户端的阅读装置进行解密。这将会造成如果要根据读者的阅读习惯推荐内容的时候，都必须把区块链上的文章都要解密之后，才能辨识内容然后做推荐判断。当区块链越长，解密的时间也会越长，这时就必须利用其他的机制，如将区块链视为大的数据库藉由大数据的平行处理，去取得新闻内容，或者是在另外一个资料库存放未加密的新闻内容资料。不过新增一个储存所有内容数据库，这就会打破区块链去中心化档案控

管，如果该数据库不再运作，新闻区块链系统或许就无法继续运行；且因为独立的数据库有可能纪录被篡改，反而没有原先区块链纪录不可抹灭的特性。

如果希望能藉由区块链的分布式结构，以达到无法修改出版纪录的目的，根据原本的工作证明（PoW）的方法，则在网络架构上，需要有一定数目以上的计算机同时加入区块链当中，不然仍然有可能被其他运算能力较强的计算机修改纪录。存放新闻内容与交易纪录的区块链本身就如同一个数据库，虽然 Bitpress 有提出计算信任值的公式，但是并没有分析当新闻内容不断累积，其所需要计算的时间是否会过长；而 Matters 与 Civil 的人工检查与挑战机制，更无法处理当数据越来越多的状况。为了解决以上的问题，结合大数据对于数据的处理是必须要采取的方式之一，藉由建立自动判别文章发文者的过往发文纪录与购买者的纪录，提供用户在购买文章时候的参考与推荐。避免过长等待交易确认的时间，加快读者购买文章的速度，则可以藉由修改区块挖掘的算法，如将耗费资源的工作证明算法，改为速度较快的股权证明算法，或者股份授权证明机制（Delegated Proof-of-Stake Consensus, DPoS），藉由少数被大众所选出的节点进行区块产生与验证，不过以上的方式都需要在私有链才能进行。另外一个路径则是如同韩国的现代公司将公有链与私有链混合的方式，藉由私有链的快速产生区块，将私有链所在的生态系统串接到公有链上（Price, 2018, January 22）。

综上所述，三个计划分别采用以太坊与超级账本作为区块链平台，而这二个区块链本身具备的智慧合约与虚拟货币，有了商业营运的基本环境，但是新闻内容的推荐与购买方式，则仍然存在着货币汇率的不稳定，以及存取内容的时间可能过长问题，这都有待进一步结合其他机制，但仍然保留区块链去中心化且记录不可抹灭的特性，以完善整体新闻交易的生态体系。

捌、结论

新闻业用区块链来产生新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模式，其主要解决的问题是过于依赖社交媒体，如 Facebook 的算法对于读者群与新闻产业的任意中

心化操纵，透过智慧合约与不可修改的特性，使得新闻产业能维持一定时间的订阅户数，使得虚拟资金稳定，能持续发展新的新闻内容与形式。

不过在形式上，其与一般内容发文的网站如 Steemit 的区别是在于可信度的计算。而其仍然有隐忧存在于依靠其他人的评价给予可信度的评判，例如当有一个资金充沛的政治组织加入如 Bitpress 的网络当中，其可以产生大量假的读者账号，大量发文给予其他文章与新闻社负评，而给予自己新闻社所发行的文章有大量的好评，形成虚假的可信度，这也是目前需要面对的问题。而 Matters 与 Civil 一开始就会先筛选成员，后者是由社群成员进行挑战，如果有争议会再由委员会处理；而 Matters 侧重由少数人先确认用户格调，同时会有人工检视是否有文章特别推荐，而当文章越多，审核会越来越花时间。在 Matters 与 Civil 当中的人所扮演的角色重于算法，但这同时也可能带来效率上的低落与其他偏见。

区块链与新闻媒体的结合，目前在技术与汇率兑换上需要克服障碍，但同时也开启了新闻生态系不同的商业模式。在将虚拟货币作为资源上，因为发文需要支付费用，当有账户滥发广告文，其所拥有的货币就会快速消失，最后当没有货币，也就丧失了可以发文的资源，如此一来可以避免广告文的扩散。在技术上，新闻媒体中心化的产制方式，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仍然有待寻求比人工检视内容更好的解决方案，使得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平等地发文与评论，例如其在区块链上无法被修改的发言纪录，则可追踪谣言与假新闻，以维持新闻媒体所需要的一定程度对新闻内容质量的把关。当区块链上的货币与现实生活中的法币能有稳定兑换关系后，同时拥有足够多的货币与持有者在区块链上，并且能根据货币动力学建立货币使用的稳定性，将会使得区块链如同重要基础设施，可以被稳定地且广泛地运用；其所具有的不可磨灭性，也使得此种新的数字型态的新闻内容会成为可信赖的讯息来源，增加大众对于新闻的信赖度，使得新闻产业摆脱假新闻与同温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再次赢回大众的信赖。

参考书目

- 〈Matters | 创作有价〉（无日期）。取自 <https://info.matters.news/>
- 李柏锋（2018年4月9日）。〈张洁平离开端传媒，创办 Matters：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内容平台〉，《INSIDE》。取自 <https://www.inside.com.tw/2018/04/09/matters>
- Abdulkader, A., Lakshmiratan, A., & Zhang, J. (2016, June, 2). Introducing DeepText: Facebook's text understanding engine. *Facebook*. Retrieved from <https://code.facebook.com/posts/181565595577955/introducing-deeptext-facebook-s-text-understanding-engine/>
- Al-Saqafa, W., & Seidler, N. (2017). Blockchain technology for social impac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head. *Journal of Cyber Policy*, 2(3), 338–354.
- Allcott, H., & Gentzkow, M. (2017). Social media and fake news in the 2016 el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1(2), 211–236.
- Armbrust, L., Oetker, E., Dawe, J., Halasz, A., & Beasley, Z. (2018, March 10). Bitpress: News on the blockchain. *Bitpress*. Retrieved from <https://bitpress.network/assets/bitpress-whitepaper.pdf>
- Balmas, M. (2012). When fake news becomes real: Combined exposure to multiple news sources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of inefficacy, alienation, and cynicism.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1(3), 430–454.
- Burrell, I. (2017, March 23). How the New York Times' mobile-first strategy has turned millennials into its biggest audience. *The Drum*.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drum.com/opinion/2017/03/23/how-the-new-york-times-mobile-first-strategy-has-turned-millennials-its-biggest>
- Coolidge, M. (2018, August 3). Why you need ETH to purchase CVL. *Civil*. Retrieved from <https://blog.joincivil.com/why-you-need-eth-to-purchase-cvl-de99bce1cfb7>
- Das, A., Datar, M., Rajaram, S., & Garg, A. (2007). Google news personalization: Scalable online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WWW 2007*. Retrieved from <https://www2007.org/papers/paper570.pdf>.
- Desrosiers, C., & Karypis, G. (2010).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neighborhood-based recommendation methods. In F. Ricci, L. Rokach, & B. Shapira (Eds.), *Recommender systems handbook* (pp.107-145). Boston, MA: Springer.
- Gantait, A., Patra, J., & Mukherjee, A. (2017, January 9). Integrate device data with smart contracts in IBM Blockchain. *IBM*.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bm.com/developerworks/cloud/library/cl-blockchain-for-cognitive-iot-aps-trs/index.html>
- Graves, L. (2016). *Deciding what's true: The rise of political fact-checking in American journalism*.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aim, M., Graefe, A., & Brosius, H. (2017) Burst of the filter bubble? *Digital Journalism*, 6(3), 330–343.
- Hegeman, J. (2018, May 23). Facing facts: Facebook's fight against misinformation. *Facebook*. Retrieved from

- <https://newsroom.fb.com/news/2018/05/facing-facts-facebooks-fight-against-misinformation/>
- Hileman, G., & Rauchs, M. (2017). Global blockchain benchmarking study. *Cambridge Judge Business Schoo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jbs.cam.ac.uk/fileadmin/user_upload/research/centres/alternative-finance/downloads/2017-09-27-ccaf-globalbchain.pdf
- Iles, M. (2018, May 5). The civil constitution (Beta). *The Civil Media Company*. Retrieved from <https://blog.joincivil.com/the-civil-constitution-beta-64460a181e08>
- Iles, M. (2018, May 11). The civil white paper. *The Civil Media Company*. Retrieved from <https://blog.joincivil.com/the-civil-white-paper-3e6c6f72dd9e>
- Lee, M., & Guinee, S. (2018, April 17). The New York Times has signed up a lot of subscribers. Here's how it plans to keep them. *Nieman Lab*. Retrieved from <http://www.niemanlab.org/2018/04/the-new-york-times-has-signed-up-a-lot-of-subscribers-heres-how-it-plans-to-keep-them/>
- Liu, J., Dolan, P., & Pedersen, E. R. (2010). Personalized news recommendation based on click behavior. *Google AI*. Retrieved from <https://ai.google/research/pubs/pub35599>
- Marchi, R. (2012). With Facebook, blogs, and fake news, teens reject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6(3), 246–262.
- Matters Lab (2018年5月31日)。〈Matters 项目草案：重塑内容价值链〉，《Matters Lab》。取自 <https://medium.com/matters-lab/matters-%E9%A0%85%E7%9B%AE%E8%8D%89%E6%A1%88-%E9%87%8D%E5%A1%91%E5%85%A7%E5%AE%B9%E5%83%B9%E5%80%BC%E9%8F%88-ae9f9aa98249>
- Nakamoto, S. (2008). 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Retrieved from <https://bitcoin.org/bitcoin.pdf>
- Nelson, J. L., & Taneja, H. (2018). The small, disloyal fake news audience: The role of audience availability in fake news consumption. *New Media & Society*, 1-18.
- New York Times (2014, March 24). Innov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presscouncil.org.au/uploads/52321/ufiles/The_New_York_Times_Innovation_Report_-_March_2014.pdf
- Newman, N., Fletcher, R., Kalogeropoulos, A., Levy, D. A. L., & Nielsen, R. K. (2018, June 22). *Digital news report 2017*.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Retrieved from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Digital%20News%20Report%202017%20web_0.pdf
- Otto, L., Glogger, I., & Boukes, M. (2016). The softening of journalistic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model of sensationalism, soft news, infotainment, and tabloidiz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7, 136-155.
- Owen, L. H. (2018, April 19). Facebook's news feed changes appear to be hurting — not helping — local news. *Nieman Lab*. Retrieved from <http://www.niemanlab.org/2018/04/facebooks-news-feed-changes-appear-to-be-hurting-not-helping-local-news/>
- Owen, L. H. (2018, June 13). Civil promises that you don't have to care about blockchain

- to care about what it's doing (also, its first newsrooms just launched). *Nieman Lab*. Retrieved from http://www.niemanlab.org/2018/06/civil-promises-that-you-dont-have-to-care-about-blockchain-to-care-about-what-its-doing-also-its-first-newsrooms-just-launched/?utm_source=Daily+Lab+email+list&utm_campaign=f426a1dca8-dailylabemail3&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d68264fd5e-f426a1dca8-396233593
- Owen, L. H. (2018, October 16). Civil's token sale has failed. Now what? Refunds, for one thing — and then another sale. *Nieman Lab*. Retrieved from http://www.niemanlab.org/2018/10/civils-token-sale-has-failed-now-what-refunds-for-one-thing/?utm_source=Daily+Lab+email+list&utm_campaign=1d802c524b-dailylabemail3&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d68264fd5e-1d802c524b-396233593
- Price, C. (2018, January 22). On blockchain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Strengths, weaknesses, and the likely road ahead. *Blockchain at Berkeley*. Retrieved from <https://blockchainatberkeley.blog/on-blockchain-and-the-internet-of-things-f6b0b2deb528>
- Rader, E., & Gray, R. (2015). Understanding user beliefs about algorithmic curation in the Facebook news feed. *Proceeding CHI'15 Proceedings of the 33rd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173-182.
- Ray, J. (2018, May 10). Proof of stake FAQ. *Ethereum*. Retrieved from <https://github.com/ethereum/wiki/wiki/Proof-of-Stake-FAQ>
- Stevens, H. (2018, February 6). 3 months later, Block Club Chicago picks up where DNAINfo left off. *Chicago Tribune*. Retrieved from <http://www.chicagotribune.com/lifestyles/stevens/ct-life-stevens-block-club-dnainfo-staffers-0206-story.html>
- Szabo, N. (1994). Smart contract. *Nick Szabo*. Retrieved from <http://web.archive.org/web/20160620185026/http://szabo.best.vwh.net/smart.contracts.html>
- Szabo, N. (1996). Smart contracts: Building blocks for digital markets. *Nick Szabo*. Retrieved from http://www.fon.hum.uva.nl/rob/Courses/InformationInSpeech/CDROM/Literature/LOTwinterschool2006/szabo.best.vwh.net/smart_contracts_2.html
- Twitter Public Policy(2017, September 28). Update: Russian interference in 2016 US election, bots, and misinformation. *Twitter*. Retrieved from https://blog.twitter.com/official/en_us/topics/company/2017/Update-Russian-Interference-in-2016--Election-Bots-and-Misinformation.html
- Wang, S. (2018, July 25). Want to support journalism with cryptocurrency on Civil? First you must pass this really hard quiz. *Nieman Lab*. Retrieved from http://www.niemanlab.org/2018/07/want-to-support-journalism-with-cryptocurrency-on-civil-first-you-must-pass-this-really-hard-quiz/?utm_source=Daily+Lab+email+list&utm_campaign=f936b4a298-dailylabemail3&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d68264fd5e-f936b4a298-396233593

Blockchain and Journalism – New Type of Purchase and Recommendation Platform for News

Jung-Hua Liu*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echnology background of blockchain and three journalism-related projects——Civil, Bitpress and Matters. Blockchain was proposed by Satoshi Nakamoto in 2008 and he released Bitcoin, the first cryptocurrency based on blockchain, in 2009. Blockchain is a decentralized ledger and it contains transactions in blocks. The difficulty of modifying data avoids double spending and keeps Bitcoin stable. In 2015, another blockchain-based cryptocurrency system, Ethereum, brought the feature of smart contract into blockchain. Smart contracts can be executed without the third-party agent, so it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Civil, Bitpress and Matters aim to build news/content distribution platforms based on cryptocurrency and develop new news recommender system to break the echo chamber. If the exchange between cryptocurrency and fiat currency is stable, it will create a sustainable ecosystem for journalism industry. Meanwhile, the tamper-proof trait of blockchain can trace origins of news to control the spread of fake news. Blockchain will be an opportunity to help journalists bring their readers/audience back and have their trust again.

* Jung-Hua Li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hih Hsin University, e-mail:emileliu@mail.shu.edu.tw

商营社群媒体的自律与问责： 政治经济学取径的批判

胡元辉*

本文引用格式

胡元辉 (2018)。〈商营社群媒体的自律与问责：政治经济学取径的批判〉。
《传播、文化与政治》，8:37-76。

投稿日期：2018 年 3 月 12 日；通过日期：2018 年 5 月 30 日。

* 作者胡元辉为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email:telyhhu@ccu.edu.tw

《摘要》

假新聞議題受到全球高度關注之後，社群媒體在假新聞傳播上所扮演的角色亦廣受議論。在言論自由與社會責任的糾葛之下，商營社群媒體企圖以若干消極的自律作為來解除外界壓力。本研究從政治經濟學取徑檢視商營社群媒體的運營機制及其所形塑的公共領域，期能厘清參與型與企業型兩種社群媒體概念的意義與局限，並透過社群媒體本質與功能的厘清，為社群媒體的問責機制理出可資依循的解決方向，進而探討公共型社群媒體在當前信息環境中的可能與挑戰。

关键词：公共領域、企業型社群媒體、自律、社群媒體、假新聞

壹、社群媒體與假新聞

假新闻或假讯息 (fake news / misinformation / disinformation) 近年来引发全球性关注, 此一与人类传播史几乎同其久远的课题何以会在近年发烧? 颇多研究者认为与社群媒体此一新兴传播工具的出现具有密切关系。因为它不仅大幅降低信息传播的成本, 而且能够凭借社群成员之间的信赖关系与几近真空的法令规管, 让假新闻的传布拥有更为便利的环境条件 (Carson, 2017, March 16)。

此外, 数据显示, 此一议题之所以引发全球性的广泛议论, 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系重要触媒。依据 google 搜寻热度的趋势变化显示, 网络用户搜寻 fake news 一词的频率自 2016 年 11 月起陡升, 而且与美国总统选举相互连动 (Carson, 2017, March 16)。美国事实核查组织 PolitiFact 因此将「假新闻」(fake news) 选为该年的代表性谎言 (Holan, 2016, December 13), 而牛津字典将「后真实」(post-truth) 选为该年度代表词汇的原因, 同样与社群媒体成为人们重要的新闻来源, 而且人们益发不信赖权势阶层所提供的事实有关 (Oxford Dictionaries, 2016, November 16)。

尽管假新闻的影响力为何, 学界与实务界仍有不同论断, 但大众对假新闻的感知确实日益增强, 不少人认为已到泛滥成灾的地步。一份由路特社新闻研究中心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于 2017 年初所进行的全球性大调查发现¹, 只有 24% 的受调查者同意社群媒体能够善尽区别事实与虚构之责, 较诸一般新闻媒体的 40% 为低。该项调查的质性研究亦显示, 用户认为社群媒体缺乏信息传播的规则加上病毒式算法的推波助澜, 共同导致了低质量讯息与假新闻的快速传播 (Newman, Fletcher, Kalogeropoulos, Levy, & Nielsen, 2017)。

假新闻明确悖离新闻报导最为根本的真实原则, 若不积极以对, 势必戕害人类沟通所系的信赖关系, 甚至可能摧毁民主社会的运作机制, 因此欧美国家公民社会要求社群媒体为假新闻负起责任的呼声愈来愈大。问题是社群媒体究竟要为假新闻负起何种责任? 它又应该采取何种作为来消弭假新闻的传播?

¹ 此份以新聞消費為主題之調查, 其量化研究係於 2017 年 1 月底至 2 月初在全球五大洲 36 個國家與地區以線上問卷方式進行, 共計超過 7 萬人填答問卷。

对于外界要求处理假新闻的呼吁，欧美国家最大的搜索引擎 Google 与使用者最多的社群媒体 Facebook 原本无意采取积极作为，坚持它们只是大众自由使用的开放平台，而非自行产制内容的媒体，不应将它们与传统媒体等量齐观。Google 与 Facebook 并强调民众自由交流与对话的重要意义，不能随意禁止某些信息的流通，以致侵害大众的言论自由。但在政府与民间的压力之下，Google 与 Facebook 等因特网与社群媒体公司仍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自 2016 年底陆续宣布采取若干自律作为 (Gunaratna, 2016, November 15)。

截至目前为止，Google、Facebook、Twitter 等使用人数字居前茅的平台都已采取类似的自律措施，包括强化自身对假新闻的人工与自动化事实核查，与非营利的事实核查组织及具公信力的媒体合作，对假新闻进行核查与标示，并透过各自的算法将标示为假新闻的讯息传播速度予以放慢，以及拒绝假新闻网站透过它们的广告联播网取得牟利的机会等。此外，这些网络平台与社群媒体亦透过若干信息素养知识的提供，协助教育使用者如何分辨假新闻，并在某些国家与大学新闻系合作，训练学生辨识及分析假新闻的来龙去脉。

即使如此，依据这段时间以来的实施状态观察，外界对于这些自律措施的作用似乎显得「无感」，甚至怀疑相关作为只是用来解消外界压力的「假自律」。英国《卫报》广泛访谈美国的事实核查组织与假新闻制造者之后发现，Facebook 目前的做法似乎效果有限，其原因不仅在于假新闻被揭露之前早已流传，被揭露之后亦有可能造成加速扩散的反效果。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在于脸书并未真正实现其自律的允诺，许多被核查组织认定为假新闻的讯息根本未在脸书上作出标示，甚至有的假新闻经过一段时间警示之后，竟然就回复「清白之身」。至于假新闻的分享速度是否真的遭到抑制，更是难以察觉，而 Facebook 对这些问题都拒绝说明细节 (Levin, 2017, May 16)。显见，即使网络搜寻或社群平台在外界压力之下宣称要进行自律，其实际作为仍有待观察。

除了网络与社群媒体的自律措施出现执行落差之外，政府机构是否应立法处理网络与社群媒体上的假新闻亦出现争议。相对于美国在法律作为上的

消极，欧洲国家则积极许多。欧盟执委会首先于 2016 年 5 月针对社群媒体有关仇恨的不法言论订定准则，要求 Facebook、Twitter、YouTube 与 Microsoft 等需在 24 小时内响应问题贴文的检举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 May 31)。其后陆续要求社群媒体必须针对假新闻提出更强势的作为，否则将考虑采取法律行动。2018 年 4 月，经过公众咨询与专家学者讨论之后，欧盟执委会宣布了处理网络假新闻的系列做法，包括要求网络平台业者制定共同遵循的实践准则 (Code of Practice)，设置独立的欧洲事实核查组织网络，提升欧洲民众的媒体素养，以及促进自愿性的网络识别系统等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April 26)。

德国是欧洲国家中行动最积极者，该国内阁于 2017 年 4 月 5 日将目的在打击网络仇恨言论与假新闻的法案送交联邦议院审议，此一简称为《网络执行法》(Network Enforcement Act, NetzDG) 的立法随即于 6 月 30 日获国会通过，并于 10 月 1 日正式生效，要求社群媒体必须在民众申诉 24 小时内删除明显违法的内容，较不清楚而有争议的部分也要在 7 天内处理完毕，并向投诉者回复处理结果。未能做到的公司将面临最高 5000 万欧元的罚款，而该公司在德国的负责人也将面临最高可达 500 万欧元的罚款。但德国的作法亦招徕侵犯言论自由的批评，指责该项立法会鼓励平台业者审查具争议性内容，亦可能对网络上的言论形成寒蝉效应 (Thomasson, 2017, April 5; Lomas, 2017, October 2)。

美国虽然一直未就立法管制假新闻的议题形成共识，但在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后持续延烧的「通俄门」事件影响下，已有美国国会议员于 2017 年 10 月推出名为《诚实广告法》(Honest Ads Act) 的立法案，要求对网络平台的政治性广告采取类似传统媒体的透明度规范，如揭露刊登者的联络信息、广告内容与对象、刊登时间、浏览状态等。此项立法案虽尚未获得国会通过，但包括 Twitter、Facebook 等几个主要的商营社群媒体平台业者都已宣布支持并执行草案中所拟的规范 (Lumb, 2018, April 10)。

面对假新闻的泛滥，究竟社群媒体的公共责任在哪？商营社群媒体公司只是科技公司，其平台服务只是开放平台，不该如传统媒体般接受管制，亦无需建立一般媒体的自律机制？抑或有其管制的必要，更须建置符合平台特

质与需求的自律机制？而如果社群媒体平台业者应该进行自律，那么自律机制又该如何设计方属妥当？显然仍是令人困惑而且存在争议的课题。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学取径检视社群媒体平台业者的运营机制及其所形塑的公共领域，以期透过社群媒体本质与功能的厘清，建立社群媒体（必要的）管制与（严谨的）自律的正当性，并为社群媒体的问责机制理出可资依循的解决方向。

贰、社群媒体运营机制的政治经济分析

因特网出现之后，有关它对民主社会的影响便出现乐观与悲观两种论调，前者认为因特网的近用、开放与互动等特质，将极有助于多元信息的交流与公民参与的实践，一旦大众能够变成信息通达的主动阅听人，民主质量即可随之提升。但后者则强调，因特网只是沟通的工具或媒介，人们如何使用因特网仍受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何况，实证经验显示，人类的民主实践并未因因特网而变得特别高明，各种数字乱象的存在具体否定因特网的民主功能（胡元辉，2014；Gade & Lowrey, 2011）。

社群媒体兴起之后，此种乐观与悲观主义的争论虽然继续延伸，但无可讳言，由于社群媒体在诸多政治与社会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在大众日常生活中扮演愈来愈吃重的角色，社群媒体的乐观主义论调毋宁更为昂扬。「参与型社群媒体」（participatory social media）的概念得到相当多的支持与接受，以致有关社群媒体的公共责任或管制问题，很难凝聚足够的社会注目，更别说是排上公共政策的政治议程（Fuchs, 2014a, 2014b; Napoli, 2015）。

问题显然在于吾人应如何理解与看待社群媒体的运作本质？或者，更精确地说，我们是否能对社群媒体作出真正具批判性的检视与反思？社群媒体，甚至是商营社群媒体确实是一个拥有巨大传播能力的平台，但谁拥有此一平台？平台所处的政治经济体制为何？经营此一平台的基本逻辑为何？谁因此一平台获利？谁又因此一平台而受害？其中的权力关系与劳动型态为何？如果这些问题不予思考，不做检视，势将难以论断社群媒体的实际影响与价值。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者正是上述课题。广义而言，政治经济学要探问社会生活中的控制（control）与生存（survival）状态，狭义来说，它要检视的是构成资源生产、分配与消费背后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就传播领域而言，就是关注传播场域中的权力运作，批判其中不合理的支配与剥削关系，以促成社会变革（Mosco, 2009; Fuchs, 2014a）。Mosco（2009）因此强调，权力是种资源，谁在社会阶层体系中拥有优势地位，谁就可以在市场取得相应位置。但「权力不仅是资源，亦为一种控制形式，被用来反击挑战者，维护自身优势地位。」（Mosco, 2009, p.220）

传播生态从上个世纪末以来出现剧烈变迁，因特网及其所衍生的各类新媒体如今已蔚为传播地景的崭新风貌，并成为人类信息生活的重要构成。面对此一传播生态的巨大转变，传播政治经济学亦发展出多种研究路径，以期厘清数字时代的传播特质。Mosco（2009, pp.119-123）曾归纳此一向新媒体移转的研究视角至少包括：强调新旧媒介的连续性，关注资本主义的非连续性，质疑新媒体的乌托邦愿景，以及探究新媒体所形成的明显社会议题，如知识产权的控制、电子监视与网络经济的真实意涵等。此一归纳虽未将其后蓬勃发展的社群媒体予以明显标示，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社群媒体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显然是必要而难以回避的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尽管已有一些社群媒体研究采取政治经济学取径，但相对而言，关于社群媒体的讨论仍多聚焦于其正面价值与社会效益，而忽略商营社群媒体的运作逻辑与权力关系；仍多探讨谁能获利，而不关切谁的权利受害。相对于一些理论称颂部落格与社群网站对传播权力关系的冲击，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认为吾人应对此种乐观主义采取保留态度，并进而检视商营社群媒体所存在的企业控制，因为「权力不对称意味的是：某些人在社会上受惠乃是以其他人的受损为其代价。」（Fuchs, 2014a, p.7）以下即从政治经济学取径对商营社群媒体的本质与运作进行分析与批判。

一、企业型社群媒体的特征

「参与型社群媒体」的支持者主张，社群媒体除了拥有一般因特网的特质外，更因其使用上的方便性与社群链接的功能，深化了因特网所带来的民主潜能。社群媒体的用户一方面更容易成为信息的生产性用户（prosumer），另一方面也能够更积极的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决策。这些被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却殊途同归的社群媒体功能至少包括：降低参与障碍、取消中间人（middlemen）、消费者 / 公民培力（empowered consumers）、迈向商业民主化、型塑参与式文化、展现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促进文化多样性等等（Jenkins, 2006; Shirky, 2008; Tapscott, 2008; Bruns, 2009; Howe, 2009）。

但，「参与型社群媒体」真的是社群媒体的最佳定位与写照？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企业型社群媒体」（corporate social media）才是社群媒体的真面貌。诸多研究指出，从影响社群媒体运作方式的政治经济脉络来看，社群媒体的世界与传统媒体殊无二致，尽管有非营利型态的社群媒体平台，但主流使用的平台均属企业公司所有，而一旦进入商业竞争与资本市场的领域，利润追求与商品经济的法则就必然成为公司经营的主导逻辑。传统商营媒体如此，新型态的商营网络与社群媒体依然如此。更令人担忧的是，Google 与 Facebook 等公司均已成为全球性大企业，且在市场上具高度垄断地位，其所具有的影响力甚至非传统的媒体巨擘可比。

若然，企业型社群媒体的特征为何？社群媒体的发展实则经历过根本性的变迁，许多社群媒体初建时确实展现为一种业余者驱动的社群平台，但随着社群媒体的跃进式发展及其营运规模的爆发式成长，社群媒体的企业属性、商业化内容走向与运用数据采集高额利益的经营模式也益发鲜明起来。「企业型社群媒体」的特征至少显现于以下三端（Fuchs, 2014a; Dijck, 2013; Iosifidis & Wheeler, 2016, pp.50-53）：

（一）大企业 with 政治人物具支配力与能见度

Fuchs（2014a, pp.98-102）分析 YouTube 上观赏次数排前 10 名的影片发现，环球音乐集团提供的音乐影片就占了 7 个，另外 3 个分属 YG 娱乐公司、索尼音乐娱乐及私人的产品，显示跨国媒体集团相当程度控制了 YouTube 的注意力经济（the attention economy）。在他对 Twitter 账号关注者人数多寡的

分析中亦发现，该社群媒体的政治面向亦存在注意力经济的阶层化问题，2013年3月关注者人数排在第五名的是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约2780万，但另类政治的代表如 Michael Moore 与 Noam Chomsky，或是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的相关账号，关注者人数就很少，最多的 Michael Moore 也只有146万，「占领华尔街」的账号则不到18万。

YouTube 在台湾的观赏情形与全球状态类似，依据 socialbakers 在 2017 年 12 月的统计²，观赏次数前 10 名的影片频道中，娱乐企业夺取多数的注意力，计有相信音乐、滚石唱片、杰威尔音乐、福茂唱片、华研国际、华纳音乐与环球音乐等 7 个音乐频道。位居第 6、8、9 名的中时电子报、东森新闻与壹传媒集团下的 TomoNews，虽然都是媒体，但都属于媒体集团，且其内容主要强调软性信息与社会八卦等吸睛议题。

社群媒体与网络确实有助于一般人的信息产制与传布，但显然不是所有使用者都具有相同的支配力，亦非所有信息都具有相同的能见度。能见度与注意力经济已经变成企业型社群媒体的核心过滤器，让有较大权力的行动者可以取得优势地位（Fuchs, 2014a, pp.81-82）。就此而言，企业型社群媒体乃是阶层化、非参与式空间（stratified, non-participatory spaces）。

（二）娱乐内容当道、政治内容边缘化

Fuchs（2014a, pp.98-102）检视 Facebook 最受欢迎的粉丝社团后发现，前 10 名社团中音乐与娱乐型就占了 6 个，其次是 Facebook 与 YouTube 所组的 3 个信息科技型社团，另一个则是可口可乐的品牌型粉丝社团，此一结果与前述调查共同显示，Facebook 与 YouTube 都是娱乐当道。相对的，政治内容则是相对弱势，脸书社团中只有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排在第 51 名，至于另类政治人物如 Michael Moore、Noam Chomsky 的粉丝数则都在百万以下，与前 10 名动辄 6 千万，甚至高达 2 亿以上的数量相较，可谓小巫见大巫。

² Socialbakers 有關台灣 YouTube 頻道觀賞次數的排名統計見
<https://www.socialbakers.com/statistics/youtube/channels/taiwan/>

Twitter 的情形亦然，前 10 个关注者人数最多的账号中，有 9 个属于娱乐导向，唯一的例外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此外，Fuchs (2014a, pp.190-192) 的研究亦显示，2009 年的 Twitter 热门话题中，属于政治者仅 7%，而娱乐取向者则达 38%；2010 年情形亦同，仅 3%与政治相关，却有 28%为娱乐性话题。至于包含主题卷标 (#) 的 40%热门话题中，政治同样处于边缘位置，音乐与约会是最常被使用的主题。此一统计再次证实，Twitter 上的能见度存在不对称的权力。

社群媒体在台湾的情形又是如何？依据 socialbakers 在 2017 年 12 月的统计³，Facebook 最受欢迎的前 10 名台湾粉丝专页中，音乐与娱乐类型同样高达 5 个（包括五月天阿信、周杰伦、王力宏、范范 范玮琪与 Hallyu World 韩流世界），另有一个交友社团 (Pairs 派爱族) 高居第 3 名。比较特别的是，有四个媒体的粉丝专页挤进前十大之列，分别是东森新闻、Yahoo 奇摩新闻、苹果日报及 ETtoday 新闻云。但这些媒体除 Yahoo 奇摩新闻属入口网站外，多强调实时新闻与软性八卦题材，甚至被视为「内容农场」，并不具备浓厚的公共服务或政治论坛色彩。

(三) 用户数据被转化为高获利商品

企业型社群媒体搜集其用户的在线行为之后，透过储存与分析，便可以细致掌握使用者的个人偏好与行为模式，藉此发展出定向广告 (targeted advertising)，诱使用户购买广告的产品或服务。广告收入乃 Google 与 Facebook 此类网络与社群媒体之主要营收来源，因此，如何持续拓展广告收入，亦即更有效的提升用户数据的经济价值，必然是这些公司的首要经营目标。

根据资料与市场分析机构 Zenith 的研究指出，2017 年，网络将超越电视，成为全球最大的广告媒介。2016 年，Google 与 Facebook 的广告营收已占全球五分之一，几乎是 5 年前的 2 倍，Twitter 的广告营收亦较 2012 年增长 734%，是全球成长最快的网络媒体。事实上，Google 与 Facebook 的广告收入在全

³ Socialbakers 有關台灣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統計見 <https://www.socialbakers.com/statistics/facebook/pages/total/taiwan/>。

球广告支出的占比，2012 年时尚只有 10.6%，四年之后的占比就翻倍，其利润之大可想而知（Kollewe, 2017, May 2）。

征诸两家公司的财报亦确实如此（表一），不仅以用户数字足迹（digital footprint）为基础的广告收入直线上升，整个公司的净收入亦是逐年攀升，到了 2017 年，Facebook 总营收已超过 406 亿美元，其中广告收入就有 399 亿余元，占总营收的 98.3%，而净收入则高达约 159 亿（Facebook, 2018）。至于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Inc. 在 2017 年的总营收约 1109 亿美元，其中 Google 广告收入约 954 亿，占总营收 86.0%，其年度净收入则约 127 亿（Alphabet Inc., 2018）。

表一：Google 与 Facebook 近五年（2013-2017）营收比较表

公司 年度	Facebook			Google (Alphabet Inc.)		
	广告收入	总营收	净收入	广告收入	总营收	净收入
2013	6,986	7,872	1,500	51,072	55,519	12,733
2014	11,492	12,466	2,940	59,624	66,001	14,136
2015	17,079	17,928	3,688	67,390	74,989	16,348
2016	26,885	27,638	10,217	79,383	90,272	19,478
2017	39,942	40,653	15,934	95,375	110,855	12,662

数据源：作者整理自 Google 与 Facebook 财报（Facebook, 2016; 2017; 2018; Alphabet Inc., 2016; 2017; 2018）

为了维持市场垄断地位与巨额商业利益，这些公司的公关费用亦水涨船高，以 Google 为例，2015 至 2017 年间，该公司在欧洲的软性游说费用就提升至 4.5 亿美元，企图修补其在欧洲人民与决策官员心目中的形象（Scott, 2016, July 19）。2017 年第二季在美国华府的游说经费亦打破该公司单季历史纪录，到达 593 万美金，较 2016 年同期增加了 40%（Shaban, 2017, July 21）。

二、数据商品的形成与数字劳动的剥削

从以上分析清楚可见，服膺商业逻辑，追求利润极大化的商营社群媒体并非如有些人士所描绘的公民参与利器，亦非人类社会迈向民主理想国的登龙快捷方式。相反的，从批判政治经济学所在意的「谁拥有、谁控制、谁获利」的角度来检视，商营社群媒体乃不折不扣的「企业型社群媒体」，它以用户「自愿参与」的糖衣包装了企业的「营利本质」，而且以不支薪或低薪取得的使用者劳动，为企业带来商业利益，甚至是巨额利润。

社群媒体用户的在线活动到底是何种性质的活动？是参与型社群媒体支持者口中的自主性、创造性活动？或是被商品化、被剥削的数字劳动？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社群媒体的在线活动乃是一种「无形劳动」(immaterial labor)，它为商品生产了文化或情感要素，亦即在线的社群关系，因而增加了商品的价值；它也是一种「免费劳动」(free labor)，使用者以生产性消费者 (producer-consumers) 角色在社群媒体上进行各种「额外活动」(excessive activity)，例如填写自己的背景数据，上传文字、照片、影音等内容，发表评论，并将之分享给自己的朋友。而社群媒体则将用户的所有使用轨迹予以集结、储存与分析，再将之卖给广告商 (Cohen, 2008)。用 van Dijck (2013) 的话来说，巨型跨国企业的社群媒体并不只是以促进使用者的连结为念，而是同时藉由撷取及剥削使用者的连结性 (user connectivity) 变成全球性的信息与数据探勘公司。

确实，社群媒体用户的活动结果并不只是表面上的信息接收与分享而已，Fuchs (2014a, pp.97-122) 强调，社群媒体与网络用户的在线活动乃是数字时代的新型态劳动，在线时间既是劳动时间，也是能够实现利润的潜在时间，因为在线活动都受到监视 (surveillance) 并转化为资料商品 (data commodity)。社群媒体为了积累资本，必然想方设法让使用者人数增加，停留时间增加，触及与点击广告机率增加，以期取得更多用户的数据，并增加利润实现的时间。而在社群媒体将用户生产内容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 的过程中，无论是被视为无形、免费或是玩乐劳动 (play labour / playbour)，由于使用者皆不支薪，剩余价值率 (剥削率) 趋近于无限大，用户的数字劳动 (digital labour) 可谓被严重剥削，既创造了数字血汗工厂 (digital

sweatshop)，亦使使用者沦为无领阶级（non-collar）、网络奴隶（netslave）。Fuchs（2017）曾以2012年Facebook的公开财务资料推算其工资率（wage share）为11.0%，利润率（profit share）为45.1%，但美国整体的工资率达24.8%，利润率则只有24.8%⁴，具体显示Facebook的工资给付相当的低，其原因就在于使用者的无偿劳动为社群媒体创造了巨大价值。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企业型社群媒体的典型资本积累策略就是对用户数字劳动进行剥削，它贩卖用户数据的所得远大于投入的资本，其与传统媒体资本积累过程的差异只是获取阅听人商品（audience commodity）的方法有所不同。以电视、收音机与网络公司来做比较，Fuchs（2010）和Bolano与Vieira（2014）都指出，采取被动阅听人模式的电视、收音机广告业者购买的是潜在阅听人关注度的统计数据，而网络公司则是代之以主动阅听人或生产性消费者（网络用户）使用网络时所留下的数据，包括他们的个人品味、偏好、欲望与通道等。因此，网络广告业者可以更精准地触及它们所想要的广告对象。阅听人商品理念的重要阐释者Smythe（1981 / 2006, pp. 249-250）曾感慨指出：「人需要有休息、反思、艺术熏陶、细致教养孩子、小区活动的时间，但是被意识产业（consciousness industry）施加的阅听取向的劳动压力却冷酷无情。」这句话在数字时代的今天仍是历久弥新。

三、隐私侵害与监控

从隐私的角度来看，社群媒体将用户数据商品化乃是对用户隐私的不合理对待。以Facebook为例，它虽然在政策宣言中强调，当它们传送广告时并不会分享用户的信息，但Facebook也许不会分享属于个人身分的信息，但它却会把搜集到的大量个人信息卖给广告商。个别网络用户的数字足迹或许不具商业价值，但大量用户的纪录，而且是可以被分析的纪录，则是广告业者的最爱（Iosifidis & Wheeler, 2016, pp. 52-53）。此外，Facebook的隐私策略掩饰了它对使用者的剥削，它所强调的分享只是数据贩卖及商品化的婉语

⁴ 工資率是經濟體工資總額佔GDP的比率，利潤率則是經濟體利潤總和佔GDP的比率。

而已。隐私对社群媒体平台提供者与使用者而言其实存在不对称关系，社群媒体平台提供者系以牺牲使用者的隐私来保障自己的利益（Fuchs, 2011）。

一些学者针对企业型社群媒体有关隐私政策的文件进行了精细研究，为上述论断提供了有力证据。Butosi (2012) 对 Facebook 与 Twitter 创设以来的隐私政策（privacy policy）及使用条款（terms of use）进行批判论述分析的结果显示，两个文件的主要功能比较像是工作契约，而非有关隐私保护的论述，亦隐匿了足以显示其信息商品化的相关流程。Fuchs (2014a, pp.165-168) 对 Facebook 隐私政策文件的分析抱持相同看法，他指出，由于该文件相当复杂与冗长，使用者根本不太可能阅读，而且文件中以与第三方分享信息（sharing information）的用语来取代贩卖数据之类的数据商品化宣告⁵，更是降低了使用者的警戒心。此外，Facebook 既未询问，也没有征得使用者同意是否要看定向广告，等于默认用户是自愿牺牲隐私来换取使用 Facebook 的机会，亦美化了广告对提升网站服务质量的价值⁶。

在自由经济的社会里，隐私虽然被视为保护私有财产的一种普遍价值，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分析指出，此种资本主义式的隐私概念同时让企业、政府得以「监控」一般人的媒体使用数据，遂行其牟利或政治控制的目的，因此其结果往往是富人与企业隐私受到十足的保护，并合法化对消费者与公民的隐私权侵害，企业型社群媒体的状况便是鲜明的例子（Fuchs, 2011）。藉由傅柯监控概念的运用与转化，企业型社群媒体的批判研究者主张，该类型社群媒体对用户数据的搜集、储存与利用，涉及不对称权力关系、控制与规训权力，并可能导致使用者付出代价（Fuchs, 2014a, pp.153-174）。易言之，企业型社群媒体用户的数字足迹在转化为数据商品的过程中受到公司的高度「监控」，并被利用以满足其经济目的，使用者的隐私在企业面前并未受到真正的保障。

⁵ Fuchs (2014a, p.166) 發現，2012 年 12 月版的 Facebook 隱私政策文件，分享（sharing / share）一詞出現 85 次，而販賣（sell / selling / sale）的相關詞彙則完全沒有使用。

⁶ Fuchs (2014a, p. 167) 指出，Facebook 雖然在它蒐集使用者資料的小甜餅（cookies）設定中提供自願退用（opt-out）的選項，但此一選項既不能在正常隱私設定裡看到，亦隱匿在文件字海中所附的一個網頁連結，充分顯露其以商業利益為先，隱私保護其次的心態與作為。

Cohen (2008) 以「監控的價值化」(valorization of surveillance) 來稱呼社群媒體此種以用戶數據來為資本創造價值的過程，但社群媒體的監控不只是現有用戶數據的商品化而已，還包括透過這些數據來留住用戶，並讓離開的使用者回籠。Fuchs (2010, 2012; 2014a, pp.163-164) 則以「大眾自我監控」(mass self-surveillance) 一詞來質疑參與型社群媒體支持者 Castells (2009) 所提出的「大眾自我傳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 概念⁷，他認為前者是後者在資本主義下的陰暗面，乃使用者不斷產製內容及交流信息才讓此種監控成為可能。事實上，企業型社群媒體不只存在企業監控，亦存在政治監控的侵害。此一狀態由美國中情局前雇員史諾登 (Edward Snowden) 所透露的政府機關監控內幕，以及社群媒體不當交出數據配合政府調查等事例中，即可窺知梗概。

社群媒體得以監控用戶數據並將之商品化的重要工具就是算法 (algorithm)，而且是不透明的算法。Van Dijck (2013) 的研究顯示，社群媒體的算法不僅將用戶的社群關係摸的一清二楚，而且掌握其消費模式與偏好。透過既有行為模式的掌控，社群媒體得以預測用戶可能的未來取向，而算法則穩穩地套住用戶，社群媒體透過它顯示了用戶所處社群的普遍價值與信念，亦促使使用者趨向此一共通態度或立場，以期獲取更多的社群關注或肯定。就此而言，算法本身就是某種社會關係或某種論述的實現者，其與傳統媒體公司將用戶行為轉向消費行動的作法並無根本差異，其中的分別只在於社群媒體能夠在微观層次掌握個人品味，進而透過「你可能也喜歡」的方式將其他的內容及各種廣告、營銷灌輸給使用者 (Bouvier, 2016, pp. 4-5)。

參、社群媒體公共領域的政治經濟分析

公共領域的探討雖由來已久，但隨著傳播生態的不斷變遷，其意涵與價值亦面臨重新評估與詮釋。特別是因特網出現以及社群媒體廣受使用之後，

⁷ Castells (2009) 的「大眾自我溝通」概念，係指有別於傳統大眾媒體溝通模式的新形式的社會化溝通 (socialized communication)。此一新興的溝通模式乃內容上自我產製、傳佈上自我導向，以及接收上自我選擇的多對多溝通型態。

有关公共领域的讨论不仅备受重视，抑且众议纷纭。惟无论是支持 Harbermas (1989) 趋向单一、全面的公共领域概念，或是主张多元、另类的公共领域观点，多认为公共领域在民主政治中具有关键地位，乃实现人民自治之重要凭据。既是如此，社群媒体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自应准确理解与定位，方足以让它发挥应有的功能。遗憾的是，从政治经济学取径来看企业型社群媒体所形塑的公共领域乃是「被企业殖民 (corporate colonization) 的公共领域」，无法成为公众理性讨论与批判的场域。

一、网络化公共领域的理想与现实

从参与型社群媒体的角度来看，社群媒体的出现让一般大众可以藉之分享意见、交流看法，而且是以更为便利、更为主动的方式进行沟通，既赋予大众更多的个人自由，也解放了他们的创造力，相当有助于公共领域的型塑。倡议网络化公共领域 (networked public sphere) 概念的 Benkler (2006, p. 272) 即指出，「网络允许所有公民改变他们与公共领域的关系。公民不再需要是消费者与被动的旁观者，他们可以变成创作者与基本的主体。也就是在这层意义上网络得以民主化。」

Benkler (2006) 认为，网络化信息经济的形成已使原有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大众中介的公共领域 (mass-mediated public sphere)，向网络化公共领域移转。后者透过因特网让每个人有说话、询问与调查的机会，有成为政治对话主体的可能，因而改善了以往由商业化、集中化商业媒体为核心平台的公共领域结构。尽管网络化公共领域仍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但较诸大众中介的公共领域仅能容纳相对有限的议题、观点，并受到媒体所有人的过度掌控与商业化操作，仍然是可欲的进展。

类似 Benkler 主张网络化信息环境已为人类社会带来结构性变化，并正面肯定网络与社群媒体在公共领域建构上的作用者甚多，他们相信处于新信息环境下更为自主的个体以及个体间的协作将有助于更好的民主参与，以及更反思性的公民文化。例如 Tapscott (2008) 即认为以互动与协作为特征的数字工具与网络世代，将使美国乃至其他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迈入「民主 2.0」

时代，因为「对于知识创造与社群建构这两个数字时代政策制订的核心面向，Web 2.0 科技提供了支持工具，让政策制订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比以前更为容易、更为省钱。」(Tapscott, 2008, p.264)

但网络与社群媒体真的只会是公共领域的推手？实证研究的结果迄今尚无鲜明共识，不少研究对此有所保留，至多只能肯定网络与社群媒体有助于沟通管道与互动频率的扩增，但量的扩增是否足以推进公共领域则是未知数。一份针对奥地利 Twitter 使用者及其所形塑之网络化公共领域的实证研究即显示⁸，作为政治沟通的媒介，尽管 Twitter 明显促进了政治中心与公民间的连结，让一般公民得到更多参与政治论述的管道，但奥地利的政治推特领域 (Twittersphere) 主要仍是既有权势者挥洒的舞台。至于公民是否因此而有更多的参与感？公民在 Twitter 上的参与是否足以影响政治过程？又是否能够发展出更具包容性的公共领域？仍然无法论断 (Ausserhofer & Maireder, 2013)。

不可否认，社群媒体确实加大也加快了人类社会的信息流动，特别是日新月异的行动装置更让网络化的信息环境得以便利而快速的发展。以往，人们之间的沟通可能要耗费不少时间与金钱，却未必能够有效传达，现在却可以在弹指之间进行多对多的沟通，而且费用相当低廉。但相对的，许多人亦感觉新传播科技所带来的沟通新局并未消弭以往「有沟未通」的问题，甚至因为信息的泛滥与混乱，用户操作新媒体的能力落差，以及同温层 (stratosphere) 与回音室 (echo chamber) 现象的形成等等因素，使人们的沟通质量更为低落与劣质。例如关注网络回音室现象的 Sunstein (2017) 虽然认同网络化公共领域的存在，但也强调信息碎片化 (fragmentation) 问题的严重；虽不认为大型社群媒体平台已经危及民主，亦同意它们已对民主构成挑战，并从审议民主的角度，建议脸书等社群媒体平台建置对立观点与机运按键 (opposing viewpoint and serendipity buttons)⁹，让不同于用户既有立

⁸ 本研究係以研究者自行發展出的使用者中心法 (user-centred method)，針對 374 名奧地利 Twitter 政治核心使用者及其網絡在 2011 至 2012 年特定時段的推文資料進行分析，並與同時段日報的文章進行比較。

⁹ 所謂對立觀點按键是指使用者按键後將可接收到與使用者立場相對的動態消息，而

场的信息有机会被看到。

显然，社群媒体的理想主义并非社群媒体现实样态的最佳诠释，以全然正面的评价来看待社群媒体上所产制的内容根本不切实际。Iosifidis 与 Wheeler (2016, pp. 53-54) 衡平地指出了社群媒体内容的双重本质：其一是被社群媒体运用来累积利润的私有财，其二则是足以成为公共领域组成份子的公共财。唯有正视社群媒体内容的双重本质，一方面同意社群媒体在参与式民主上的潜能，另一方面接受社群媒体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下的局限与扭曲，方能以开放态度审视社群媒体与公共领域的关系。

对此一课题抱持开放态度的 Iosifidis 与 Wheeler (2016, pp. 28-34) 就具体指出社群媒体必须面对的五项课题：非结构性的参与、不可信赖的信息、审查制度、企业的在线活动与隐私顾虑，以及批判性讨论的阙如。其中非结构性的参与系指社群媒体上的对话缺乏行为规范，以致难以对焦，既不易达成共识，亦难以设定策略目标。至于作为公共领域核心本质的批判性讨论则是指具实质内涵的对话或有意义的辩论，但社群媒体却充斥着琐细浅薄、不具价值的交流，而且缺乏原生性的新闻内容。

诚然，人们的在线关系或网络参与往往是随机性、间歇性的弱连结，未必是持续性、专注式的强连结，因特网与社群媒体对于公共领域的影响也因此不能一厢情愿的认定。对新媒体的民主潜能有所保留的斯洛法尼亚社会学者 Žižek (1998)，以相对于互动性 (interactivity) 的「互卸性」(interpassivity) 概念说明媒介用户自以为是主动，实则是被动的状态，用马克思商品拜物教 (commodity fetishism) 的概念来说，就是社会关系愈来愈体现为一种客体的关系。懒人行动主义 (slacktivism) 是另一个常被用来指述网民热衷网络表态却无实际线下行动的情形。许多人以为写个部落格、点个赞或在社群媒体上组织社团，就可以产生影响力或改变现存状态，此种想法被 Morozov (2009, May 19) 讥讽是懒人世代理想类型的行动主义。

尽管许多人仍乐观看待因特网的信息超载现象，或是因之而出现的众声喧哗与金钱依归的「巴别塔缺陷」(Babel objection)，相信自主与协作的个人

機運按鍵則是指使用者若按此鍵將可因此暴露於非預期與非選擇性的動態消息。

在某种程度上有能力克服这些问题 (Benkler, 2006)。但若从政治经济学取径来探究企业型社群媒体所能形塑的公共空间，显然无法如此乐观以对，亦必须对此种公共领域的理想主义提出质疑，因为此类看法并未真正探问下列问题：「谁拥有因特网平台？谁拥有社群媒体？」(Fuchs, 2014b, p. 58)

二、被企业殖民的公共领域

企业型社群媒体的所有者强调，由于社群媒体的近用、便利与快捷，它相当有助于开放社会及参与民主的发展，对人类社会具有革命性的贡献。Facebook 的使命宣言及其变迁可说是此种认知的代表性脚注。

Facebook 原本的使命宣言是：「赋予人们分享的力量，让世界更加开放连通」(Give people the power to share and make the world more open and connected)，此一使命定位充分显示出该公司对于社群媒体信息分享能力的自信，亦对信息分享的结果抱持高度期待。问题是一个遵循市场逻辑的公司要如何实现股东利益，同时达成美好的企业愿景？2017 年 6 月，Facebook 修改了它的使命宣言，强调 Facebook 要「赋予人们建立社群的力量，并且让世界更加紧密连结 (Give people the power to build community and bring the world closer together)」(Zuckerberg, 2017, June 23)，无论此一新使命的出现是否与假新闻等社群媒体的发展及相关的社会批评有关，外界要问的是，如果 Facebook 上充斥着破坏人们相互信赖关系的假新闻，又如何能够让世界更加紧密连结？同样的问题是：一个遵循市场逻辑的公司要如何激励人们组织具有意义的社群，从而建立成熟的公共领域？

依据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分析，Fuchs (2014a, p. 102) 明白指出，「社群媒体并没有建构出公共领域或参与式的民主空间，而是遭到企业的殖民，特别是那些支配注意力与能见度的多媒体公司。」即使是在一些社群媒体被认为发生极大催化作用的政治与社会运动中，如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抗议与革命，Fuchs (2014a, pp.102-103) 亦不认同脸书革命、推特革命等说法，因为让革命发生的是特定社会条件下集体组织的人民，而非科技本身。特别是在商营社群媒体的世界，大企业及政治人物居于掌控地位，所谓公众参与乃是一种

虛假意識 (false consciousness) 而已。

Fuchs (2014b) 从当前社群媒体所存在的三种对抗来分析社群媒体所形塑的公共领域 (表二)。其一是经济层面的对抗, 存在于用户数据与社群媒体公司利益之间; 其二为政治层面的对抗, 存在于使用者隐私及产业监视复合体 (complex) 与公民追求权势者问责之间; 其三为公民社会层面的对抗, 存在于辟建公共领域及企业、国家殖民之间。Fuchs (2014b, p.89) 认为社群媒体虽有成为公共领域的潜能, 但此一领域却被政治与金钱力量所操控, 以致当前的社群媒体整体而言并无法形成为一个公共领域, 而是被企业与国家以一种特殊主义的形式所掌控与殖民。或者藉另位政治经济学者 McChesney (2008, p. 377) 的话来说:「因特网只能再制部分的公共领域」, 而且就算要发挥对公共领域有所帮助的「部分」功能, 犹必须有其他制度架构的支持, 例如获得适当补助与独立的新闻业。

表二：社群媒体的对抗

领域 (Sphere)	对抗存在于..... (Antagonism between...)	
经济	使用者利益：数据保护与企业税的问责	企业利益：用户数据的透明/商品化与企业秘密
政治	公民利益：让权势者问责与免于权力机构干预的沟通	权力持有人利益：维护权力机构的秘密与泄密者的定罪

公民社会	抗议行动藉由网络化沟通能够开创在线与线下的政治公共领域	社群媒体透过企业与政治控制来限制、封建化与殖民这些公共领域
------	-----------------------------	-------------------------------

数据源：“Social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by C. Fuchs, 2014b,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12 (1), 78.

诚然，自由主义下的传播理论也会探讨个人的信息自主，也会检讨企业或政府的干预，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则更进一步省思传播生态中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所构成的权力不对等。因此，探讨社群媒体与公共领域的关系时，势难以回避企业型社群媒体用户的社会不平等，亦无法跳过其所有权本质所可能造成的后果。若不能正视企业殖民公共领域的事实，并思考所有权民主（ownership democracy）的重要性，期待社群媒体对公共领域的建构发挥正面作用将是缘木求鱼。

肆、社群媒体的管制与问责

社群媒体已经是当今人类社会重度使用的媒介，并为一般民众重要的信息来源。根据美国皮优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 2016 年初所进行的调查发现，尽管部分社群媒体用户拥有多重消息来源，但 62% 的美国人会从社群媒体获取新闻，而且 18% 的受调查者表示常常如此（Gottfried & Shearer, 2016, May 26）。路透社新闻研究中心 2017 年初的全球性调查亦发现，年轻世代颇仰赖社群媒体与数字媒体作为其主要消息来源，18 到 24 岁的年龄层中，约三分之一（33%）的受调查者表示，社群媒体是他们主要的新闻来源，超过电视与报纸总合的 29%，也高于在线新闻网站的 31%。不过，年龄层愈高的受访者对社群媒体的依赖度就愈低（Newman, Fletcher, Kalogeropoulos, Levy, & Nielsen, 2017）。

此外，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社群媒体的使用平台已形成鲜明的集中化现象，若干商营社群媒体巨头几乎囊括绝大多数的使用者。据 2018 年 4 月的

统计，Facebook 的积极用户帐户已达 22 亿 3 千 4 百万，居全球之冠。其后为 YouTube 与 WhatsApp 的 15 亿，Facebook Messenger 的 13 亿，WeChat 的 9 亿 8 千万及 Instagram 的 8 亿 1 千 3 百万¹⁰。

依据前文分析，对公共意见与论述具影响力的商营社群媒体已因商业逻辑的驱动，出现企业型社群媒体的特质与弊病，如何提升其公共服务功能已是民主国家无可回避的课题。尤其是商营社群媒体的市场占有率被少数企业寡头垄断，必须防制其在追逐私人与公司利益时伤害公共利益，甚至要求其采取保障公共利益的积极行动。有鉴于社群媒体在当前传播生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在建构公共领域上所具有的潜能，究竟政府是否应介入管制？商营社群媒体又应如何问责以履行应负的公共责任？允值重视并深入辩证。

一、社群媒体的管制

商营社群媒体该不该管制已是近年来政府部门与实务界讨论的课题，假新闻、隐私权等议题发酵之后，讨论热度更为提高。面对政府管制的主张，商营社群媒体最大的挡箭牌就是言论自由，他们强调对社群媒体上的信息进行筛检或过滤，是对使用者言论自由的巨大伤害¹¹。此一说法自非虚言，毕竟言论自由乃个人得以自我实现，文明得以向前发展之重要基础，对社群媒体平台上的内容任意进行处理确有可能侵害言论自由。

¹⁰ 相關資料請見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2014/global-social-networks-ranked-by-number-of-users/>

¹¹ Facebook 創辦人兼執行長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在接受媒體訪問時便強調，他信奉新聞自由，Facebook 處理假新聞的做法不會顧慮是否影響它們賺錢，而是有更多的價值必須考量（safian, 2017, April 11）。

支持商營社群媒體應擁有高度自由的學者 Levinson (2017, November 28) 即強調，若對社群媒體進行管制，「主要的受害者將不會是假新聞的傳播者，而是我們的表達自由。」他反對科學哲學家 Karl Popper 的「容忍的吊詭」(paradox of tolerance)¹²，認為政府若禁止仇恨言論，反而可能使各種言論都有機會被視為仇恨言論，以致壓制了言論自由的表達空間。既然社群媒體已經可以透過算法來指認並移除假新聞，那么就由社群媒體自律即可，如此不僅符合這些媒體公司的利益，亦可強化使用者在線上活動的自信。

相似的看法亦出現在若干研究機構，紐約大學 Stern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17) 的報告即指出，立法管制社群媒體可能扼殺因特網原本具有價值的面向，類似德國以立法方式重罰不能移除仇恨言論的社群媒體公司，反而可能使業者錯誤地移除平台上的大量內容。因此，政府的介入無助於網絡自由信息流動的促進，而且會對言論自由的基本人權造成立即的威脅。倫敦政經學院的媒體政策計劃項目 (Media Policy Project) 亦在其政策建議中強調，政府可以在對付假新聞的行動上扮演會議召集人或觸發器的角色，但行動要特別謹慎小心，以免傷害言論自由與媒體自主 (Tambini, 2017)。

但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從來不是絕對自由，對社群媒體進行適當而必要的管制是否絕不可行？強調應對商營社群媒體採取更大程度管制的學者 Tusikov (2017, November 7) 即指出，「言論權並非絕對權力」，社群媒體應否管制的辯論實質上是一場信息控制權的戰役，涉及甚么樣的数据可被搜集與販賣？甚么樣的內容可被允許在網絡傳播？以及誰來決定？她不認為光

¹² 巴柏在 1945 年發表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一書中指出，無所限制的寬容必然導致寬容的消失，因為「不容異議」的哲學主張往往不願進行理性論辯，亦不同意其追隨者聆聽理性的論證，進而教導支持者以武力回應外界的質疑。為了保障寬容社會的存在與運作，就必須抵制「不容異議」對社會所帶來的猛烈襲擊。

靠社群媒体平台的现有自律作为足以解决恶意传播的假新闻问题，基本原因就在于社群媒体平台若限缩足以产生广告营收的信息流动，根本违背它赖以获利的商业模式。何况，被宣称可以用来抑制假新闻的算法乃是公众无法检视的禁区，政府与公民至少有权了解这些形塑我们言论权的社群媒体公司是否真正立足于公共利益？

以往有关社群媒体治理的研究与论述偏重用户层面，而较少论及社群媒体平台维护良善信息环境的责任，但传播政策与管制领域的学者专家确已开始注意商营社群媒体治理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算法在其中所产生的影响。Napoli (2015) 的研究即指出，既然社群媒体乃算法驱动的平台 (algorithmically-driven platform)，平台的营运者可藉由算法在新闻与信息的流动上扮演具影响力的角色，那么就如同过去对传统新闻媒体可以控制政治流程的担忧一样，我们似乎也应应对社群媒体平台提出相同的问责课题。同样的，就社群媒体的内容而言，我们也可以提问：是否要像传统新闻一般，要求社群媒体的算法必须纳入公共利益的概念？

社群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共通性，尚可以在两者同具的制度本质中得到印证。从制度理论 (institutional theory) 的角度入手，Napoli (2014) 以媒体科技可以被视为一种制度出发，论证算法在当代媒体系统动态中的某些角色与功能确有其制度化的本质。算法就如同其他媒体制度一般，能够直接形塑使用者行为，影响其偏好的形成与内容产制的决定，而它之所以能产生如此的作用，亦与其他媒体制度相似，都是经由复杂的社会过程所不断发展而成。算法既然与传统媒体制度类似，都会促进与框限媒体组织与媒体用户的行为与认知，显示网络搜寻与社群媒体的算法与传统媒体的运作相通，都具有相当的制度性 (institutionality)，因此，对算法驱动平台进行管制或赋予公共服务义务，有其具说服力的论据基础。

商營社群媒体业者以往一直主张，它们只是提供平台供使用者自由交流，并非传统产制内容的媒体，不应以管制媒体的方式来限制社群媒体的运作。诚然，社群媒体乃至其他网络平台的运作未必与传统意义的媒体相同，政府相关管制政策仍应考虑不同传播科技的特质，但许多传统媒体早已具有策展性质，并不纯然都是自行产制内容，而依据本文前面的分析显示，商營社群媒体的平台服务表面上是使用者独立自主的传播行为，实质上是在不透明算法操控之下的信息流动，平台所有者其实是以各种方式介入了内容传播，包括平台上的定向广告等商业活动。在媒体定义已然转变的今天，与传统媒体制度存在相通制度性的大型网络搜寻或社群平台，显然无法以自己不是媒体来推托自律责任。何况，社群媒体早已存在依据他人检举将用户停权之机制，足见社群媒体并非完全放任的平台，具有类似传统媒体的编辑权能。

社群媒体所遭致的批评不只来自外部，犹包括曾在其内工作的高层主管及投资人，一些 Facebook 的前高层及股东即抨击该平台正在破坏社会应有的运作形式，平台上充斥假新闻，缺乏公民论述，亦无助于使用者之间的合作。他们亦指责该公司执行长 Mark Zuckerberg 无能且无心处理假新闻议题 (ABC/AP, 2017, December 13)。面对连串内外的批评与压力，Zuckerberg 于公开响应中承认政府对因特网的管制已是「无可避免」(Kelly, 2018, April 11)。既然，社群媒体已经是不少民众的重要讯息来源，而商營社群媒体又已形成垄断结构，而且是全球性的寡头垄断，对公共事务影响力巨大，岂容完全豁免于管制？真正的问题显然在于如何管制以实现其应有的问责。

二、社群媒体的问责

问责乃自由经济体制下所有企业的重要课题，重视企业伦理之公司会透过法定及自我作为主动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公共义务，传播产业亦不例

外。传统媒体的问责机制至少包括严谨的自律规范、切实的员工教育训练、透明的营运信息，以及负责任的公众申诉管道与公众意见调查等。前文已论及商营社群媒体在假新闻议题上的自律作为未见贯彻，事实的演进亦证明商营社群媒体的自律无法符合社会期待，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出现的「通俄门」事件，乃至 2018 年英国剑桥分析 (Cambridge Analytica) 等公司接连爆发的 Facebook 数据泄露事件，在在显示社群媒体的自律作为只是不断寻求亡羊补牢，而且是「压力驱动」式的改革，社会每多一分压力，这些巨头的自律作为才向前迈进一步。

不少研究显示了商营社群媒体业者在自律作为上的迟钝，以社群媒体公司的隐私政策为例，Fuchs (2010) 指出，「经验研究显示，在自律的情况下，只有少数公司执行的隐私政策能够守住公正的信息作业。」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清楚揭露，商营社群媒体服膺用户数据的隐私问题交由企业自律的意识形态，因为自律乃维护其商业利益之关键要素，吊诡的是，商营社群媒体对自律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以自律合理化其用户数据商品化的操作，另一方面却又排斥履行公共责任所必需施行的严谨自律，充分显现商营社群媒体以商业利益为上，公共利益居次的营运原则。

截至目前为止，商营社群媒体在外部压力下所采取的自律作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 透过内部人工审查与自动化侦测 (automated fact-checking, AFC)¹³，以及外部第三方事实查核来抑制假新闻的泛滥；(二) 强化申诉机制来处理平台上所传播的仇恨言论与假新闻；(三) 提升政治广告的透明度以降低有心人士或外国力量恶意操控选举的可能性；(四) 严密控制合作单位所取得的用户数据，以免数据外流与不当利用。为此，社群媒体确实增加了经费支出，亦达致若干成果，例如在人工审查假新闻的人力部署上，

¹³ 自動化事實查核技術已對事實查核工作產生若干助力，惟離高度自動化的目標仍然遙遠，其推進有賴包括平台公司在內的多方面支持 (Graves, 2018)。

Facebook、Twitter、YouTube 均宣称 2018 年底前全球将到达或超越万人 (Facebook newsroom, 2018, March 29; Mosseri, 2017, April 6; Rosen, 2018, May 15; Twitter Public Policy, 2018, April 5; Wojcicki, 2017, December 4)。问题是这些自律作为是否已足以构成社群媒体的完整问责机制，以及这些作为是否得到落实而非口惠实不至？

反对政府管制社群媒体的纽约大学 Stern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17) 亦不认为这些平台巨头的自律措施已经足够，从推进高质量商业行为的角度出发，该中心主张有关社群媒体恐怖主义内容与政治假新闻的治理应采取管制与现况之外的第三条路，亦即社群媒体若不愿接受政府管制，就必须在对付在线有害内容，增进新闻报导与公民讨论质量等核心社会利益上，扮演更为积极的自治角色。而它们所建议的做法包括：强化公司治理、改善算法、导入更多「阻力」(friction)、增加人工监管、改革广告模式、促进产业合作与确认政府角色等 (参表三)。不过，该中心接受立法规范在线政治广告须揭露付费刊登者资料。

表三：社群媒体应该实现的自律作为

强化公司治理	针对恐怖主义内容与政治假新闻进行全面的内部弱点评估，并就结果采取解决行动。
改善算法	就内容可信度找出更新与更多的精确指标

导入更多「阻力」	调整用户接口以纳入警示、通知，以及其他在使用者与可疑内容之间可以形成「阻力」的可能形式，以减少使用者分享或点阅有问题的内容。
增加人工监管	投入足够人力来审视与评估内容，同时提供使用者更多提报有害信息的工具
改革广告模式	将所有关于治理、技术与人工监管的建议皆运用于广告业务
促进产业合作	数字平台之间应分享知识以极大化对抗有问题内容的效益，并与公民团体、广告商、内容产制者及使用者增加互动，以强化问责并建立使用者信赖。
确认政府角色	政府应致力于不会威胁言论自由的工作，如提升媒体素养。

数据源：Harmful content: The role of internet platform companies in fighting terrorist incitement and politically motivated disinformation, by Stern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17, New York, NY: NYU Stern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Stern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17) 的社群媒体自律主张基本上并未超越这些巨头业者的现行作为，只是要求将自律做得更为彻底与到位而已。但学界与公民社会在这些自律作为之外，尚提出不少建议，其中尤以营运透明化为其焦点，强调社群媒体除了广告主数据的透明化，尚有诸多可行与应行之透明化作为。它们指出，社群媒体平台愈透明化，就愈能受到利害关系人的审视与节制，不仅有助于利害关系人对社群媒体本质与运作的理解，并能促进彼此之间的良善关系与连结，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共利益。

学者 Napoli (2015) 即认为，以往有关社群媒体治理的论述鲜少对其算法如何彰显公共利益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因此社会应该对算法治理 (algorithm governance) 如何实现公共利益进行更为宽广的讨论，其中，算法的透明度是必须面对的问题。Napoli (2015) 强调，算法公开虽然存在影响商业模式、营收来源或阻碍创新的疑虑，但社群媒体业者可以仿效传统媒体将阅听人调查委托专业组织保密进行的方式，将算法的透明问题交由产业赞助的组织来处理，如此即可不必担心产业秘密泄漏给竞争者的问题。

欧盟委员会针对假新闻议题邀请专家学者于2018年3月所完成的对策报告中，相当完整的罗列了社群媒体应该透明化的面向，包括（一）财务数据的透明，如提供某些特别信息的所有者、赞助内容的提供者、影响者（influencer）与机器人（robots）的费用提供者等；（二）在线新闻来源的透明，如建构新闻来源透明度指针、增加优质信息的能见度、有关信息选择的算法；（三）事实查核的透明，如结合第三方的查核方法与作业状态、符合隐私权下的数据近用、查核作业与经验的交流等（European Commission, 2018）。这些建议最后导引欧盟对社群媒体平台作业准则的要求，可视为实现透明化政策的第一步。

就财务资料的透明化而言，持政治经济学观点的 Fuchs (2014a, pp. 159-160) 则更进一步主张发展新的、另类的隐私权概念，视隐私为劳工与消费者的集体权利，要求企业型社群媒体的所有人及其企业收入应公开接受检视，让财富透明化。尽管这些透明化的要求未必能立即与全面获得实行，但毫无疑问，基于商营社群媒体在信息传播与民主运作上愈来愈大的影响力，社群媒体巨头们显然将在问责机制上，特别是自律措施方面面临社会更大的压力。诚如 Napoli (2015) 所强调，社群媒体的治理架构「在其拥有的力量与应该抱持的责任之间要有更大的一致性」。亦如 Scholz (2013, p. 6) 的质问，我们要思考的是：「社会到底要赋予多大的权力给网络上的主要网站？难道至为重要的数字平台不该被规管，甚至是国有化？」

确实，在基进的国有化主张之外¹⁴ (Srnicek, 2017, August 30)，商营社群媒体如何被适度管制以向社会问责，已是不可逃避的课题。现阶段的管制课题不是要对内容进行直接监理，更不是要作为真理的裁决者，而是要以促成商营社群媒体的完整与有效问责作为起点。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言之，商营社群媒体可行之问责机制至少包括公司营运数据的透明开放（如用户数据的运用、广告作业、事实查核作业、算法等）、公众申诉机制的完整建立，以及用户信息素养的培育等。就假新闻的处理而言，目前带有敷衍色彩的事实查核不仅无济于事，申诉机制的贫弱更是让使用者的权益与救济无所依托。未

¹⁴ Srnicek (2017, August 30) 認為，面對網路平台巨頭將來運用人工智慧等科技更進一步獲取資料，擴增其平台帝國霸業的威脅下，小幅度的規管措施已不足以因應這些業者擁有並控制 21 世紀人類社會基礎建設的風險。

来除了平台自身的人工与自动化事实查核应该更为积极、准确之外，目前与第三方合作的事实查核亦应扩大与贯彻，并让使用者申诉机制标准化、透明化。

伍、结语：社群媒体作为传播公地的斗争

对美国硅谷文化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 Ayn Rand 倡导自利型客观主义 (self-interested objectivism)，相信不需要阶层化政治控制的计算机网络，足可测量、控制与自我稳定社会，处于此种社会中的人类可以只为自己的幸福而工作 (Iosifidis & Wheeler, 2016, p. 41)。但网络与科技世界是否真如 Ayn Rand 此种科技未来主义者的乐观描绘？Fuchs (2011) 在他对 Facebook 所做的研究中即以质问的口吻表示：「如果 Zuckerberg 真的不在意利润，那么为何 Facebook 不是一个非商业的平台？而且为何要采用定向广告？」反言之，既然企业型社群媒体对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存在各种可能的负面影响，那么尊重市场自由竞争的民主体制又该如何面对垄断性商营社群媒体平台所带来的反民主威胁与挑战？吾人显然有必要对此进行更深层、更多元的思考。

一、社群媒体政治的再建构

在社群媒体的介入与发展之下，人类的信息沟通系统虽然出现诸多新的变化与可能，但一如所有重大的科技革命，一旦经过资本主义式发展的「洗礼」，便无可避免于国家权力与企业权力的「操控」，此两种权力在社群媒体发展上的关系被 Fuchs (2017) 解析为相互抓背式 (scratch one another's back) 的彼此回馈与协助。Trottier 与 Fuchs (2014) 亦在探讨社群媒体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当代的社群媒体具有显著的「企业－国家－权力」(corporate-state-power) 的现象，乃有权力的企业与国家利益现身与会合的力场 (force field)。处于此一力场中的公民社会就如同各种线下的斗争一般，尽管资源不对称，仍试图藉由各种沟通资源挑战企业与国家权力，以致社群媒体政治与线下政治殊无二致，都是不平等的权力场域。

本文所分析的企业型社群媒体特质明确显示，当前商营社群媒体的运营机制已严重侵蚀社群媒体的民主潜能与公共意涵，公民社会在商营社群媒体的角色是脆弱的、边缘的，也因此，商营社群媒体所形塑的公共领域乃是被企业殖民的公共领域，离 Harbermas (1984) 所期待的理想的言说情境 (ideal speech situation) 甚远。就此而言，Mosco (2009, pp.151-155) 将公共领域视为公民实现民主的社会过程的论点，特别具有意义。理想的公共领域必须让公民能够平等且充份的参与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事务的决策，但要实现平等及参与的公共领域，其中必然存在商品化与民主的斗争，社群媒体政治亦因而会是一场公民争取传播公地的持续斗争。

社群媒体作为思想与实践的斗争场域，其结果并非命定，社群媒体的未来仍视复杂的社会斗争动态而定。社群媒体可以是培力的工具，也可以是宰制的途径，它是否能成为公民愿意投入时间与他人相互交流、产制内容的场域，「全决之于人们要如何使用因特网与社群媒体」(Iosifidis & Wheeler, 2016, p. 33)。Cohen (2008) 即指出，社群媒体可以被创造来谋取利润、追求好玩，也可以用来解决问题、动员民众与分享信息，显然在商业驱动的模式之外，具有集体社会性知识 (collective social knowledge) 的社群媒体尚有大量的潜能未被实现。

毫无疑问，看待社群媒体不能再以科技为核心，而须清楚认识商营社群媒体的企业本质，看清其与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社群媒体的使用虽然可促进人类活动的社会化，因而具有提升民主化沟通的潜能；却也可能陷入资本主义商品化逻辑的牢笼而使社群媒体的功能沦为有限的社会性 (limited sociality)，严重断伤人类沟通应有的民主意涵 (Fuchs, 2014a)，此一吊诡在商营社群媒体处理假新闻的作法中再次得到印证。由于商营社群媒体体系以商业利益为其营运之优位原则，一旦认真处理假新闻便可能损及既得利益，若非社会压力巨大，商营社群媒体连目前的虚弱自律都可能不会出炉。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强调社会实践 (social praxis)，寻求思想与实践的统一，以期为所有人创造更大的福利 (Mosco, 2009)，主张透过批判的洞见，形成意识，展开行动，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而奋斗 (Fuchs, 2014a) 因此，商营社群媒体平台能否发挥一定的、必要的公共服务功能，能否在公民社会

的要求与压力下，成为民主的公众沟通系统的正向伙伴，真正的人类解放工程的有力工具，实有赖此时此刻吾人的作为而定。没有具体的斗争行动，就不会有可欲的未来。用 McChesney (2008, p. 379) 的话来说，新传播科技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只有自觉行动的人类方能处理与解决问题」。从传播政策的角度言之，吾人的自觉行动除了建立商营社群媒体的问责机制之外，尚存在值得思考的另类解决方案：建构公共型社群媒体。

二、公共型社群媒体的建构

据统计，在前 100 大的全球网络平台中，营利型者占 98%，只有 2% 属于非营利性质 (Wikipedia 与 BBC Online)。这些网站中有 88% 采用定向广告作为资本积累的模式，另有 10% 系以计次付费、订阅、产品或服务贩卖、营销所得，以及分类广告模式营运 (Jin, 2013)。此种资本主义在因特网的运作形态被 Jin (2013) 称为平台帝国主义 (platform imperialism)，乃是数字科技与数字经济时代新型态的帝国主义。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平台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形成，全拜使用者的免费或玩乐劳动所赐，但并非所有社群媒体的用户活动都如同商营社群媒体一般的商品化，例如用户在非营利媒体或平台上的活动虽然是没有交换价值，没法创造利润的非商品化劳动，却是有助于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许多学者与关心人士因此提出各种公共型社群媒体的倡议，希望开发社群媒体的正面价值与民主潜能。

公共型社群媒体的主要构思有两种，其一为将传统公共广电积极转型为公共服务媒体 (public service media, PSM)，藉以制衡商业化与集中化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巨头 (Iosifidis & Wheeler, 2016, pp. 54-55)。欧洲与全球许多具有公共广电传统的国家颇多藉由该国公共广电媒体带动全社会的数字转型，经由不断的理念辩证与实证经验显示，传统的公共广电组织若能在数字平台提供积极服务，不仅有助于自身的永续经营，更重要的是，能够抑制数字信息环境的商业化导向，并将公共利益与实践延伸至新兴的传播生态。

Iosifidis (2011) 即强调, 虽然因特网与社群媒体有能力创造更健康的公共领域的认知未必是个迷思, 但它的民主与培力功能不应被夸大, 其理由包括: (一) 因特网的开放参与可能沦为混乱而无结构性的对话; (二) 经济与技术能力等因素影响因特网使用的普遍性; (三) 政治高度管制及民主国家存在不同形式的网络审查; (四) 因特网已经变成企业活动的主要舞台; (五) 广泛对话与批判讨论在网络上经常缺席; (六) 因特网内容高度党派化, 以及 (七) 网络公司不产制原创新闻内容等。因此, 相较于网络平台提供者, 在信息、民主化、去中心化、公民互动与普及性等五个领域, 公共服务媒体都比商营网络业者更能发展出具包容性与涵盖性的社会架构, 进而有助于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公民参与的推展。

其二为另类社群媒体 (alternative social media) 的建构。此类型社群媒体多以开放原始码方式 (open source) 开发, 免费提供使用, 但不做广告, 而是依赖捐款维运。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有许多非营利的另类社群媒体出现, 例如现在仍维持运作的 diaspora* (<https://diasporafoundation.org/>) 与 Riseup (<https://riseup.net/>), 或是一些被社会运动所使用或开发, 但现已停止运作的社群平台, 如 2011 年西班牙「愤怒的人群」运动 (Indignados) 所使用的 Lorea, 以及 2012 年 1 月由「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 所开发的 Occupii 等。

另类社群媒体都是由公民社会的积极行动者所制作、拥有与维运, 相对不受到政府及企业的控制, 而且无论是组织结构、内容或参与者, 都与企业型社群媒体迥异, 换言之, 此类社群平台主要是以批判的、另类的信息传播为主 (Fuchs & Sandoval, 2015)。以目前最广为人知的 diaspora* 为例, 它以去中心化的节点 (pods) 来储存用户数据, 用户可登录任何节点, 自由与网络上的其他使用者联系, 并拥有自己的数据, 而不会像商营社群媒体般遭到大企业中心化储存与利用用户数据¹⁵。

¹⁵ diaspora*的去中心化結構可參考官網說明, 見 <https://diasporafoundation.org/about>。

但另类社群媒体尚难与企业型社群媒体竞争，其原因一方面是遭到后者以各种方式进行的压制或孤立¹⁶，另一方面则与此类社群媒体的功能有关。不少社会运动者或公民社会的积极行动者对于使用这些另类社群媒体感到为难，因为这类平台虽然提供较多的隐私，较少的监控，而且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它们的触达率低，难以与圈外的大众进行沟通，加上使用者必须投入更多的经费与劳力，形成资源分配上的困难。此种两难局面的结果就是使另类媒体的发展史变成一种自愿性进行自我剥削劳力的过程，同时，所有权的自由吊诡地变成公民自由权的限制（Fuchs & Sandoval, 2015）。

Fuchs（2014a, p. 264）认为，另类因特网的实现必须要有另类社会环境的搭配作为根本性的支持，此一环境要素就是一个参与式的民主社会，一个团结与协作的信息社会。显然，欲达到此一境地仍有长路要走，更要付诸行动。众多可行或已行的行动方案中，让商营社群媒体履行其社会责任厥为重点之一。为了解决此一寡头式媒体结构下的传播民主困境，一些欧美的学者与运动人士建议，应该对诸如 Google、Facebook、Amazon 与 Apple 等这些在许多国家逃避税负的巨型跨国公司进行征税行动，并将税收所得挹注于非营利媒体。甚至可以透过参与式预算的作法，由公民决定如何分配这些经费（Fuchs & Sandoval, 2015; Fuchs, 2017）。

欧美国家以往即曾基于竞争及多样化等原则，要求寡头垄断或具优势市场地位之传统媒体提供具体资源，协助弱势或另类媒体。在传播生态出现剧变的今天，从大众的无酬劳动中获取巨额利润的商营社群媒体巨头，既已成为信息生态之主角，且已形成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对其课以税捐或要求提供必要资源，用以挹注公共型社群媒体，实乃维护公共利益之必要与可行措施。

参考书目

胡元辉（2014）。〈建构中的新新闻生态系统—共识、争议与展望〉，罗世宏、童静蓉

¹⁶ 各商營社群媒體之間也是相互封鎖，以期使用者只在自家集團的平台之間流動，藉而取得有利的競爭優勢（Van Dijck, 2013）。

- (編),《社交媒体与新闻业》,页251-274。台北:优质新闻发展协会。
- ABC/AP. (2017, December 13). Facebook hits back at former executive's claims the company is 'destroying how society works'. *ABC*. Retrieved from <http://www.abc.net.au/news/2017-12-13/facebook-hits-back-at-chamath-palihapitiya-criticism/9254918>
- Alphabet Inc. (2016). Alphabet Inc. form 10-K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5. Retrieved from https://abc.xyz/investor/pdf/20151231_alphabet_10K.pdf
- Alphabet Inc. (2017). Alphabet Inc. form 10-K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s://abc.xyz/investor/pdf/20161231_alphabet_10K.pdf
- Alphabet Inc. (2018). Alphabet Inc. form 10-K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7. Retrieved from https://abc.xyz/investor/pdf/20171231_alphabet_10K.pdf
- Ausserhofer, J., & Maireder, A. (2013). National politics on Twitter: Structures and topics of a networked public spher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6(3), 291-314.
- Benkler, Y. (2006).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olaño, C. R. S., & Vieira, E. S. (201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ternet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nd a reply to Fuchs.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15(3), 1-10.
- Bouvier, G. (2016). What is a discourse approach to Twitter, Facebook, YouTube and other social media: Connecting with other academic fields. In G. Bouvier (Ed.), *Discourse and social media* (pp. 1-14). Oxon, UK: Routledge.
- Bruns, A. (2009). *Gatewatching: Collaborative online news production* (2nd Ed.).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Butosi, C. (2012). Social net-working: Explor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online social network industry.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in Master of Arts, Western University. Retrieved from <http://ir.lib.uwo.ca/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692&context=etd>
- Carson, J. (2017, March 16). What is fake news? Its origins and how it grew in 2016. The Telegraph. Retrieved from <http://www.telegraph.co.uk/technology/0/fake-news-origins-grew-2016/>
- Castells, M. (2009).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U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N.S. (2008). The valorization of surveillance: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Facebook.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22(1), 5-22.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 May 31).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IT companies announce code of conduct on illegal online hate speech [Press release]. Brussels, BE: Author. Retrieved from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6-1937_en.htm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April 26). Tackling online disinformation: Commission proposes an EU-wide Code of Practice[Press release]. Brussels, BE: Author. Retrieved from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8-3370_en.htm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disinformation: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High level Group on fake news and online disinformation.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Retrieved from [file:///C:/Users/ASUS/Downloads/Amulti-dimensionalapproachtodisinformation-ReportoftheindependentHighlevelGrouponfakenewsandonlinedisinformation%20\(1\).pdf](file:///C:/Users/ASUS/Downloads/Amulti-dimensionalapproachtodisinformation-ReportoftheindependentHighlevelGrouponfakenewsandonlinedisinformation%20(1).pdf)

- Facebook. (2016). *Facebook annual report 2015*. Retrieved from https://s21.q4cdn.com/399680738/files/doc_financials/annual_reports/2015-Annual-Report.pdf
- Facebook. (2017). *Facebook annual report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s://s21.q4cdn.com/399680738/files/doc_financials/annual_reports/FB_AR_2016_FINAL.pdf
- Facebook. (2018). *Facebook annual report 2017*. Retrieved from https://s21.q4cdn.com/399680738/files/doc_financials/annual_reports/FB_AR_2017_FINAL.pdf
- Facebook newsroom. (2018, March 29). Hard questions: What is Facebook doing to protect election security? *Facebook*. Retrieved from https://newsroom.fb.com/news/2018/03/hard-questions-election-security/?utm_source=dldr.it&utm_medium=twitter
- Fuchs, C. (2010).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eb 2.0 surveillance. Vienna, AT: Unified Theory of Information Research Group. Retrieved from <http://www.sns3.uti.at/wp-content/uploads/2010/10/The-Internet-Surveillance-Research-Paper-Series-3-Christian-Fuchs-Critique-of-the-Political-Economy-of-Web-2.0-Surveillance.pdf>
- Fuchs, C. (2011). An alternative view of privacy on Facebook. *Information*, 2(1), 140-165.
- Fuchs, C. (2012).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eb 2.0 surveillance. In C. Fuchs, K. Boersma, A. Albrechtslund, & M. Sandoval (Eds.), *Internet and surveillance: The challenges of web 2.0 and social media* (pp. 31-70). New York, US: Routledge.
- Fuchs, C. (2014a). *Social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UK: SAGE.
- Fuchs, C. (2014b). Social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12(1), 57-101.
- Fuchs, C., & Sandoval, M. (201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t and alternative social media. In C. Atton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alternative and community media* (pp. 165-175). London, UK: Routledge.
- Fuchs, C. (2017). Facebook. In B. J. Birkinbine, R. Gomez & J. Wasko (Eds.), *Global media giants* (pp. 428-444). New York, NY: Routledge.
- Gade, P. J., & Lowrey, W. (2011). Reshaping the journalistic culture. In W. Lowrey & P. J. Gade (Eds.), *Changing the news: The forces shaping journalism in uncertain times* (pp. 22-42). New York, NY : Routledge.
- Gottfried, J., & Shearer, E. (2016, May 26). *News use acros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2016*.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Retrieved from file:///C:/Users/asus/Downloads/PJ_2016.05.26_social-media-and-news_FINAL-1.pdf
- Graves, L. (2018). *Understanding the promise and limits of automated fact-checking*. *Digital News Report*. Retrieved from <http://www.digitalnewsreport.org/publications/2018/factsheet-understanding-promise-limits-automated-fact-checking/>
- Gunaratna, S. (2016, November 15). Facebook, Google announce new policies to fight fake news. CBS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www.cbsnews.com/news/facebook-google-try-to-fight-fake-news/>

- Habermas, J.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ranslated by T. McCarthy.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Habermas, J.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UK: Polity.
- Holan, A. D. (2016, December 13). 2016 Lie of the Year: Fake news. PolitiFact. Retrieved from <http://www.politifact.com/truth-o-meter/article/2016/dec/13/2016-lie-year-fake-news/>
- Howe, J. (2009). *Crowdsourcing : Why the power of the crowd is driving the future of business*. New York, NY: Three Rivers press.
- Iosifidis, P. (2011). The public sphere, social networks and public service medi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4(5), 619-637.
- Iosifidis, P., & Wheeler, M. (2016). *Public spheres and mediated social networks in the western context and beyond*.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Jenkins, H. (2006).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U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Jin, D. Y. (2013). The construction of platform imperialism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11(1), 145-172.
- Kelly, E. (2018, April 11). Zuckerberg: Federal regulation of Facebook 'inevitable'. USA Toda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18/04/11/zuckerberg-federal-regulation-facebook-inevitable-faces-second-day-capitol-hill-hearings-facebook-pr/506235002/>
- Kollewe, J. (2017, May 2). Google and Facebook bring in one-fifth of global ad revenue.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7/may/02/google-and-facebook-bring-in-one-fifth-of-global-ad-revenue>
- Levin, S. (2017, May 16). Facebook promised to tackle fake news. But the evidence shows it's not working.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7/may/16/facebook-fake-news-tools-not-working>
- Levinson, P. (2017, November 28).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social media would be a 'cure' far worse than the disease. *The Convers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theconversation.com/government-regulation-of-social-media-would-be-a-cure-far-worse-than-the-disease-86911>
- Lomas, N. (2017, October 2). Germany's social media hate speech law is now in effect. *TechCrunch*. Retrieved from <https://techcrunch.com/2017/10/02/germanys-social-media-hate-speech-law-is-now-in-effect/>
- Lumb, D. (2018, April 10). Twitter joins Facebook in supporting the Honest Ads Act. *Engadge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ngadget.com/2018/04/10/twitter-joins-facebook-in-supporting-the-honest-ads-act/>
- McChesney, R. W. (200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dia: Enduring issues, emerging dilemmas*. New York,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 Morozov, E. (2009, May 19). The brave new world of slacktivism. *Foreign Policy*. Retrieved from <http://foreignpolicy.com/2009/05/19/the-brave-new-world-of-slacktivism/>
- Mosco, V.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2nd ed.). London, UK: Sage.
- Mosseri, A. (2017, April 06). Working to stop misinformation and false news. Facebook. Retrieved from <https://newsroom.fb.com/news/2017/04/working-to-stop-misinformation-and-false-news/>
- Napoli, P. M. (2014). Automated media: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perspective on algorithmic media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4, 340-360.
- Napoli, P. M. (2015). Social media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Governance of news platforms in the realm of individual and algorithmic gatekeepers.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39(9), 751-760.
- Newman, N., Fletcher, R., Kalogeropoulos, A., Levy, D. A. L., & Nielsen, R. K. (2017).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17*. Oxford, UK: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Retrieved from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Digital%20News%20Report%202017%20web_0.pdf?utm_source=digitalnewsreport.org&utm_medium=referral
- Oxford Dictionaries (2016, November 16). Oxford Dictionaries word of the year 2016 is...POST-TRUTH. [Announcement]. Oxford, UK: Autho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xforddictionaries.com/press/news/2016/11/17/WOTY-16>
- Rosen, G. (2018, May 15). Facebook Publishes Enforcement Numbers for the First Time. Facebook. Retrieved from <https://newsroom.fb.com/news/2018/05/enforcement-numbers/>
- safian, R. (2017, April 11). Mark Zuckerberg on fake news, free speech, and what drives Facebook. Fastcompan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astcompany.com/40397297/mark-zuckerberg-on-fake-news-free-speech-and-what-drives-facebook>
- Scholz, T. (2013). Introduction: Why does digital labor matter now? In T. Scholz (Ed.),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pp.1-9).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cott, M. (2016, July 19). Google, trying to endear itself to Europe, spreads \$450 million around.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6/07/20/technology/google-europe-lobbying-eu.html>
- Shaban, H. (2017, July 21). Google spent the most it ever has trying to influence Washington: \$6 million. *The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switch/wp/2017/07/21/google-spent-the-most-it-ever-has-trying-to-influence-washington-6-million/?utm_term=.d5ef6d881fd8
- Shirky, C. (2008). *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 London, UK: Penguin.
- Smythe, D. W. (1981/2006). 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 In M. G. Durham & D. M. Kellner (Eds.), *Media and culture studies: KeyWorks* (pp. 230-256). Malden, MA: Blackwell.

- Srnicek, N. (2017, August 30). We need to nationalise Google, Facebook and Amazon. Here's why.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7/aug/30/nationalise-google-facebook-amazon-data-monopoly-platform-public-interest>
- Stern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17). *Harmful content: The role of internet platform companies in fighting terrorist incitement and politically motivated disinformation*. New York, NY: NYU Stern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Available at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47df270e4b0ba184dfc490e/t/59fb31bc0d929735d3d01d95/1509634510957/Final.Harmful+Content.+The+Role+of+Internet+Platform+Companies+in+Fighting+Terrorist+Incitement+and+Politically+Motivated+Propaganda.pdf>
- Sunstein, C. R. (2017). *#Republic: Divide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ambini, D. (2017). *Fake news: Public policy responses. Media Policy Brief 20*. London: Media Policy Project,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 Tapscott, D. (2008). *Grown up digital: How the net generation is changing your world*. New York, NY: McGraw-Hill.
- Thomasson, E. (2017, April 5). German cabinet agrees to fine social media over hate speech. *Reuters*. Retrieved from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germany-hatecrime-idUSKBN1771FC>
- Trottier, D. & Fuchs, C. (2014). Theorising social media, politics and the state: An introduction. In D. Trottier & C. Fuchs (Eds.), *Social media, politics and the state: Protests, revolutions, riots, crime and policing in the age of Facebook, Twitter and YouTube* (pp. 3-38). New York, NY: Routledge.
- Tusikov, N. (2017, November 7). Regulat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before it's too late. *The Convers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theconversation.com/regulate-social-media-platforms-before-its-too-late-86984>
- Twitter Public Policy (2018, April 5). Expanding and building #TwitterTransparency. Twitter Blog. Retrieved from https://blog.twitter.com/official/en_us/topics/company/2018/twitter-transparency-report-12.html
- Van Dijck, J. (2013). *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 A critical history of social media*.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jcicki, S. (2017, December 4). Expanding our work against abuse of our platform. YouTube Official Blog. Retrieved from <https://youtube.googleblog.com/2017/12/expanding-our-work-against-abuse-of-our.html>
- Žižek, S. (1998). *The interpassive subject*. Paris, FR: Traversess.
- Zuckerberg, M. (2017, June 23). Bringing the world closer togethe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acebook.com/zuck/posts/10154944663901634>

Self-Regul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in Commercial Social Media: A Critique from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Yuan-Hui Hu*

ABSTRACT

After the issue of fake news started receiving world-wide attention,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disseminating fake news has also been widely discussed and debated. Under pressure to maintain an equilibrium between freedom of speech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mercial social media have attempted to put in place several perfunctory self-discipline measures as a response to outside scrutiny. The study intends to examine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commercial social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t shap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al economy. It hopes to clarify the meanings and limitations of two types of social media concepts: participatory and corporate. By illuminating the nature and functions of social media,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within social media can be established. Finally, the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encountered by the public social media under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re discussed.

Keywords: corporate social media, fake news, misinformation, public sphere, self-discipline, social media

* Yuan-Hui H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mail: telyhhu@ccu.edu.tw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知识劳工的困境研究：
以出版产业的编辑人员为例
姚建华*

本文引用格式

姚建华 (2018)。〈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知识劳工的困境研究：以出版产业的编辑人员为例〉，《传播、文化与政治》，8:77-102。

投稿日期：2017 年 7 月 5 日；通过日期：2017 年 11 月 20 日。

* 作者姚建华为加拿大女王大学 (Queen's University) 社会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出版研究中心副研究员，email: yaojianhua@fudan.edu.cn

《摘要》

作为对当代知识劳工研究有益的补充，本文旨在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出版产业中编辑人员所面临的四个主要的困境。这些困境集中在技术、政治、经济以及最重要的阶级关系和权力变化的层面，并与当前的社会转型紧密联系。导致这些困境的原因主要来自新媒体技术发展、如何在媒体市场化的进程中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原则、「单位制」的瓦解与出版社的转制，以及知识劳工内部的不断分化。除此之外，通过以上海两家出版社为案例研究，本文勾勒了传播产业和包括编辑人员在内的知识劳工所处的制度化的权力结构之间广泛的社会关系。

关键词：出版产业、知识劳工、社会转型、媒体市场化、编辑人员

壹、导言

知识劳工研究对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们提出了许多严肃而又重要的问题。Bell (1999) 指出, 随着知识技术型社会的崛起, 尤其是当社会开始依赖于理论信息 (theoretical information) 的形成与传播的时候, 一个新的领导阶层, 即: 有良好教育背景的科技工人所形成的知识阶层正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正是由于对以教育和技能中信息生产与传播为基础的精英制度的重视, 知识劳工已经成功转变为当前全球新政治与经济体系中的核心角色。

许多学者认同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不断地补充和完善, 例如 Herbert Schiller (赫伯特·席勒)、Harry Braverman (哈里·布雷弗曼)、Manuel Castells (曼纽尔·卡斯特) 以及 Vincent Mosco (文森特·莫斯科)。与产业工人相比, 具备专业技能、大多数以中产阶级自居的知识劳工在全球市场中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Mosco 和 McKercher (2008) 敏锐地洞察到, 知识劳工在总工作岗位中所占的比重不仅在发达国家中稳步上升, 在相对贫困的国家更是迅猛增长, 同时他们在全世界劳工运动中也变得更加活跃。

然而, 由于技术融合 (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 和企业兼并 (制度性兼并; corporate or institutional convergence) 的共同作用已导致劳工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萎缩, 包括知识劳工在内的劳动者处境堪忧。正如 Ross (2009) 所描述的那样: 即使在传统的专业领域内, 终身制的雇佣模式也已不复存在, 而弹性雇佣关系 (contingent employment) 变得更为普遍。因此, 无论是低端行业中的产业工人还是高薪岗位的知识劳工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并且他们都不得不为始终变化的市场竞争做准备。知识劳工面临的压力来自长时间的工作、不断提前的截稿时间、由劳动分工而导致的自主性降低等等。更糟糕的是, 他们还面临着对自身未来强烈的不确定性、临时的劳动合同, 甚至无法从任何保障性的社会保险中得到援助等情况。

作为对当代知识劳工研究有益的补充, 本文旨在揭示知识劳工所处的权力关系网络和制度背景; 在此基础上, 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 分析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在中国的出版产业中, 数字时代传媒改革和社会转型给以编辑人员为代表的知识劳工带来了四个主要的困境。这些困境集中在技术、政治、经济以及最重要的阶级关系和权力变化的层面。

贰、文献综述

在《传播的劳动》一文中，Mosco（2006）提出，除了极个别的文献以外，传播劳动和阶级形成是传播研究中的盲区。然而，在传播产业中雇佣劳动数量的不断上升，由企业兼并和数字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技术和制度变化使传播学者愈加关注「工作和劳工组织变化的本质」，进而强调对宏观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的了解（Mosco, 2008, p. 121）。因此，劳工研究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传媒和传播更为广泛的历史转型过程，尤其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劳工问题，有助于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个全面而具有很强诠释力的理论结构。

首先，知识劳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他们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朱西西、代长珍，2009）。具体来说，在马克思看来，从生产的角度对阶级进行划分，工人阶级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存在，他们拥有共同的身份，而这种身份根植于他们雇佣劳动力的身份——他们不掌握生产资料、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获得工资（Braverman, 1974）。因此，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在中国，工人阶级由下列人员组成，「他们通过自己的体力劳动或者技术，间接或者直接运用生产工具生产商品，提供劳动服务或者为生产及服务提供说明，并由管理人员进行监管」（陆学艺，2002，页 127）。具体来说，工人阶级从事**物质商品**（material commodities）的生产，比如衣服、玩具、化学药品以及电子产品等，同时进行**非物质商品**（non-material commodities）的生产，比如：知识、信息、管理和服务等。

在向市场经济疾速转型的同时，中国的工人阶级同样也经历着转型和重塑。在经济改革之前，对于工人阶级的普通理解就是，他们包括城市的劳动力，并不具有任何独立的生产和再生产工具，因此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成为雇佣劳动力，主要靠劳动所得维持生计。因此，工人阶级的主体就是产业工人。然而，中国经济改革将工人阶级的概念不断地扩大化，形成了新的「工人阶级」概念，这个新的概念，包括四种社会划分：提供体力劳动的工人（蓝领工人）、提供智力劳动的工人（白领工人）、从事教育或者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公务员和公共领域的管理人员（刘玉方，2001年12月36日）。也就是说，在中国，工人阶级的概念已经扩展为包括：国有企业、集体经济以及私营部门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农村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私营企

业主、个体户、士兵、大学生以及下层社会的人（如外来务工人员 and 乞丐等）。

在官方话语中，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一样，他们同样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因此，从事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部门的知识劳工，当然包括媒介知识劳工都被认为是工人阶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在中国，一个统一的、联合的工人阶级概念正在形成。

其二，张望军和彭剑峰在《信息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趋势》（2001）中阐述到，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章程，知识劳工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的阶级利益与工人阶级其他组成部分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联系往往是通过他们的工作连接起来的。因此，我们需要研究知识劳工与产业工人之间的关系，并且研究他们的身份、意识和行为。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知识劳工的劳动需要与产业工人的劳动联系起来进行考虑；同时，他们面临着相同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而共同面临的挑战。

除此之外，对于知识劳工的社会分析需要考虑到知识劳工和产业工人与共产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在中国，与国家经济或国有企业相关的重要经济决定需要得到共产党和政府的同意，所以不管是知识劳工还是产业工人，都不可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物质利益，并将这些利益转化到政治决策之中或者导致分配过程中的政治变化。因此，不管知识劳工还是产业工人都处在相同的境遇之中——他们需要服从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而从实质上来说，后者对社会资源拥有所有权和分配权。

另一方面，Lee（2007）指出，劳动政策改革已经重新塑造了工作和雇佣劳动的法律关系；因此，国家对工人和工作场所的政治控制越来越弱化。随着单位制的瓦解，以及伴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的劳动合同概念的引入，1995 年颁布了第一部《劳动法》。这些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劳动法》的颁布从本质上规定了对雇佣劳动关系进行规范的不再是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而是《劳动法》。此外，用以解决劳动纠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于 1993 年起实施，涉及调解、仲裁、诉讼三个环节（Ho, 2003）。这些法律和条例的颁布与实施说明在劳动力的分配过程中，劳动力的市场机制取代了劳动力的行政管理机制。随着法律和市场重要性的不断提升，不管是产业工人还是知识劳工对共产党和国家过去的那种政治和

经济的依赖性不断减弱，而对于市场的依赖性不断增强。

参、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批判性地分析中国知识劳工，特别是出版产业的编辑人员在当代社会转型中面临的困境，及其探究这些困境的成因。这些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和半开放式的深度访谈。

一、文献研究法

报纸、杂志、宣传手册、政府公报和商业财报，以及新闻报导是本研究文献资料的主要来源。

首先，本研究收集并分析了政府提供的各类相关资料，以此来追溯传媒产业的发展历程。其中最重要的数据源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等部门的工作报告、白皮书和政策文件。有关劳工与雇佣关系的官方信息，本研究则参考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国务院的官方资料。

其次，年鉴是本文的重要文献来源。由于在质量、可获得性和成本方面的优势，年鉴被认为是最广泛、最专业的官方资料（Vallas, Finlay, & Wharton, 2009）。本文参考了各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出版年鉴》以及《中国信息产业年鉴》。它们全面描述了中国传媒行业的年度发展（特别是出版产业的发展）和产业关系中的技术进步。

第三，本文运用大量非政府组织的报告来对官方资料进行补充。Denzin 和 Lincoln (2003) 指出，因为政治宣传的用途，官方资料可能被操控，因此存在偏差或谬误。有鉴于此，本文在文献的选择过程中格外关注了传媒产业和劳动关系领域内许多重要的非政府性质报告，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中国传媒发展索引年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北京劳动和社会保障论坛的《中国劳工问题报告》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和人口和发展研究中心的《上海人力资源发展报告》等。

二、半开放式的深度访谈

本文以上海的两家出版社为研究案例。在 Yin (2009) 看来, 案例研究不仅可以检视个案的复杂性, 更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刻理解与之相关的更为宏观性的系统性问题——案例研究的方法对一个想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审视同一问题的研究者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方法了。

(一) 深度访谈的基本问题

在本研究中, 与编辑人员的访谈首先得到了出版社领导的同意。深度访谈的对象主要是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层级的编辑工作者 (共八名, 每家出版社四名)。访谈对象都阅读了《访谈信息表》中的相关信息和条款, 并签署了《访谈同意表》。

深度访谈包括结构性的和开放式的问题, 每个访谈的时长大约在 2-3 个小时, 并基本在编辑所工作的出版社内完成。深度访谈主要聚焦于下列问题:

1. 作为一名编辑人员, 您的工作过程在过去的一些年间是否发生了变化, 您是如何应对这些变化的?

(1) 您能具体描述工作过程的变化吗?

(2) 在这个过程中, 技术起到了哪些作用? 你是否意识到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困境, 尤其是新媒体的运用对您工作带来的挑战?

(3) 媒体市场化的过程是否对媒体扮演的「政治宣传」角色带来冲击? 如果有冲击的话, 这种冲击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2. 您是否意识到编辑人员社会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的总体变化? 您觉得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3. 您觉得在出版社内部资深编辑人员和年轻编辑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区别? 这些区别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二) 补充性访谈

对于上海其他大型出版社三位主编的深度访谈是对以上两个案例有益的补充。此外, 深度访谈的对象还包括上海市出版局的政府官员和上海市出

版工作者协会的工作人员。这些访谈，结合从案例研究中所收集的第一手数据，可以说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媒介知识劳工，尤其是出版产业的编辑人员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对于上海市出版局政府官员的访谈问题主要聚焦于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上海市政府、区政府）在改善媒介知识劳工现实困境中发挥了哪些积极的作用，比如政府如何解决媒介知识劳工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等问题；政府在扩大劳工组织影响方面，出台了哪些相关政策和完善方案。对于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工作人员的访谈，主要聚焦于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组织了哪些活动，使得不同出版社中不同年龄、性别、职称以及教育背景的编辑人员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深度访谈旨在探讨将编辑人员组织和联合起来的制度性安排和设计。表一总结了每位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表一：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受访者编号	性别	年龄	教育背景	类别
受访者 1	男	46	本科	编辑
受访者 2	女	37	硕士	编辑
受访者 3	女	55	本科	编辑
受访者 4	女	33	硕士	编辑
受访者 5	男	25	本科	编辑
受访者 6	女	31	硕士	编辑
受访者 7	男	32	硕士	编辑
受访者 8	男	55	本科	编辑
受访者 9	女	34	博士	主编
受访者 10	男	58	本科	主编
受访者 11	男	59	博士	主编
受访者 12	男	48	硕士	政府官员
受访者 13	女	43	本科	政府官员

(三) 半开放式深度访谈中的伦理问题

在半开放式深度访谈中，需要强调以下两个伦理问题。第一，Berg (2007)

强调案例研究的每一个步骤都离不开主观决策——从研究案例的确定，到撰写最终结果和报告。他提出：主观决策与数据收集分析中的**样本误差** (sample bias) 和**计量误差** (measurement bias) 紧密相关。在本文的案例研究中，样本误差可能发生在以下两个方面：受访者的选择是否保证随机性，以及研究的出版社是否具有代表性。同时，鉴于每个人对民主、集权制以及市场化的定义不尽相同，计量误差也是存在的。然而，论证的正确性不仅在于研究者应尽量尝试所有可能的方法以规避主观决断，更在于做出定论、选择标准前的不断三思 (Stake, 2000)。

在半开放式深度访谈中，本文采用了一种综合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三角法 (triangulation)，力求明晰所有的选择和方法。在 Denzin 和 Lincoln (2003) 看来，数据源广泛的研究会更为精确。三角法——运用不同资源（在本文中，包括文献研究、观察和深度访谈）分析同一问题——以便更精准地展现所研究问题的各个方面。

第二个伦理问题与受访者的匿名保密相关。任何涉及个人观点和个人环境的质性研究法都会对受访者造成潜在的威胁，例如失业、声誉和社会地位的降低 (Stake, 2000)。本文的研究对匿名保密的要求更为突出，因为受访者可能因为所提供的特定信息而被轻易辨认。为了保护受访者，在与受访者首次接触时，他们就被告知可以随时选择退出研究的权利——在访谈开始、进行和结束的各个阶段。同时，如果他们选择撤回他们提供的信息，这些信息将被立即，同时永久性地删除。《访谈信息表》和《访谈同意表》都对退出访谈的细节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并在访谈之前提供给受访者。此外，访谈对象的真实姓名在本文中均被隐去。

肆、出版产业处境堪忧的编辑人员

Mosco (2009) 指出，社会生活由结构和能动力量相互构建，结构 (structure) 在这个过程中由人类能动行为 (human agency) 来组建，而它又提供了组建所需的「媒介」本身。Giddens (1984) 进一步论证到：结构是在社会生产中隐喻的、不断循环的规则和资源。结构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具有「主体性缺失」的特性。然而，社会系统中不仅存在着结构，同时也

包含了人类的能动性，而人类的能动性是跨越时间和空间进行再生产的。因此，对于社会系统结构的分析意味着将能动性的观点、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融入到对社会结构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去。

从这一点上来说，结构和能动性并不是两个独立的现象，而是在现行的社会生活模式中相互构连的。所以本文主要研究中国传媒产业中的结构化过程（尤其是出版产业），强调结构（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和能动性（出版产业的编辑人员）之间的联系，并尝试着弥合关注结构的理论视角和强调行动和能动性视角之间的鸿沟。

除此之外，Mosco 和 Giddens 都认识到，结构化理论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其对于社会变化的关注。社会变化的过程被描述为：结构由人类的能动性进行生产和再生产，而人类能动性通过结构这个「媒介」而存在。也就是说，结构化理论需要我们认识到维持系统平衡性的要素以及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变化的破坏性要素（Hobsbawn, 1973）。正因为这样，本文旨在将中国媒介知识劳工所面临的困境与当前更为宏观的社会转型联系起来，并具体分析出版社编辑人员面临的四个主要困境。

一、中国出版产业的技术变革

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为目的和宗旨的中国经济改革，始终关注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网络的快速应用和发展。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媒介知识劳工大量使用信息技术。技术发展对于出版产业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编辑人员能够通过计算机网络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用一个较为低廉的成本更新知识和提升职业技巧，以及快速获得外部的数据库和通信网路——这些数据库和通信网路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和内部的数据库一起使用（张子辉，2004）。对于编辑人员而言，通过使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如运用文本和量化信息，生成表格和图形显示，以及更好地利用分析软件），大大缩短了出版周期——由原先半年甚至一年以上的出版周期缩短到几个月甚至是几周，从而加快了图书生产的速度。同时，在传统的出版流程中，编辑人员既要审读浩繁的文字稿件，又要与作者、印刷以及发行等各环节保

持直接的联系；而在数字化时代，他们不但可以使用先进的校对软件，有效降低文字差错率，还可以通过网络实现与各出版环节的实时联系，极大地降低了单本图书的平均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图书印装质量明显提高，开本、装帧形式日趋丰富多样，版式、插图一改原有的呆板单调的白纸黑字，变得图文并茂，兼具参考性、阅读性和欣赏性。除此之外，现代物流技术则保证图书能够以最快速度与读者见面，提高了出版产业的经济效益（王晨，2009）。

但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技术的发展，出版产业的编辑人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都来自于他们劳动过程和劳动环境的改变。

首先，新技术所带来了普遍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效应，使得编辑人员的工作被不断地简化。毋庸置疑，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去技能化」的趋势不断朝着职业阶梯上部发展：「去技能化」不仅成为产业工人的一个特征，也开始成为知识劳工的特征。对于大多数的编辑人员而言，媒介数字化技术很大程度上使他们脱离了 Braverman（1974）强调的生产的「概念」（conception）层面。在中国大多数的出版社中，编辑人员主要负责审阅草稿、校对排版错误，以及确保出版内容的政治正确性等具体实务。编辑人员越来越感到随着技术的发展，他们的职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不断贬值，而这些往往是他们之前所引以为傲的（Liu, 2006）。对于编辑人员而言，这些职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包括：对于语言逻辑的精准把握（对语法、文体、标点、措词、惯用法、文字精简的精通）、选题策划知识、排版、印刷技术的基本知识、编辑学理论知识和出版美学知识、传播学理论知识以及社会心理学知识等。

第二，与新技术的「去技能化」效应紧密相联的是，对于大多数编辑人员而言，其就业机会不断减少。计算机在工作中的引入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比如技术人员。中国 2011 年新媒体和媒体融合技术人才的缺口为 60 至 80 万人（黄孝章、张志林、陈丹，2011）。但是，对大多数出版产业的求职者来说，就业机会不断缩减。我们并不难理解：当技术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大多数出版社的领导更倾向于雇佣资历较浅，但专业技术娴熟的编辑人员，而非资历较深但缺乏专业技术的编辑人员（Zhao, 2001）。通过对编辑人员技术能力而非职业经历和知识的强调，编辑

人员的独特性逐步消失殆尽。

第三，编辑人员面临着不断强化的工作压力。中国大多数出版社的领导都给编辑人员设置了非常繁重的工作量；在他们看来，编辑可以在数字时代通过网络更为快速而有效地完成他们的工作。通过与出版社编辑人员的深度访谈发现，因为较大的工作量，编辑人员在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外加班成为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不断加班的压力使得工作和休闲以及办公室和家庭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除此之外，对于那些大多数工作时间都在计算机前的编辑人员而言，他们普遍都有腰肌劳损、视力疲劳、颈椎病以及其他健康问题。

从专业技术层面上的工作压力而言，编辑人员需要不断掌握和更新数字化出版技术应用知识，包括电子出版物制作知识、数字版权保护知识、跨媒体出版知识以及计算机网络知识等。因此，将自我描述为「创造性劳动者」的编辑人员与所谓的「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发难辨。从内容知识层面上的工作压力而言，编辑人员需要关注千变万化的图书市场、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出版形势、共产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文化思潮的走向、专业领域的动态、相关出版和印刷技术的更新以及出版材料的变化等。

第四，虽然来自于网络的信息为编辑人员提供了许多知识的新来源，但也带来了信息超载的问题 (Garrison, 2000; Donald & Keane, 2002)。考虑到技术革新的速度，编辑人员需要不断地拓展和提升他们的职业知识，以及提高对海量数字化内容汇聚、分析和有效利用的能力。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信息对于编辑人员选题的判断和市场营销的策划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出版产业的商业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变化，使出版业务变得非常复杂——制作、版式、营销等方面选择变得更多，也就意味着即使是最基层的编辑人员，也必须了解更多的知识和信息。正如一位资深的高级编辑人员（受访者 1）在访谈中提及的：

随着出版产业链的不断扩展，我们不但需要面对同行之间的竞争，更需要面对来自其他信息媒体和娱乐业的竞争；因此，对于产品推向市场的速度以及对技术和商机的反应速度，成为制胜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格外关注所有流动的信息，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

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人物、新闻事件、国际纠纷、娱乐舞台，凡被民众所关注的话题，都可以成为选题和营销的助力。所以说，我们学习知识的能力和获取最新信息的技巧变得格外的重要。

第五，新技术的引入加强了管理层对编辑人员劳动过程的控制。一旦科技使某项工作可以操作、可以推向市场、可以控制，就会产生强大的测量和监督的欲望；从一个侧面来说，这是权力的一种新的形态。在传媒产业中，通过技术对知识劳工施加工作压力和进行更严密控制异常普遍；编辑人员在出版社中不断屈从于「电子全景监控」(electronic panopticon; Adams & Welsh, 2008, p. 221)。在访谈中，一位编辑人员（受访者 5）这样说道：

在出版社中，领导经常通过手机对图书编辑的过程进行全程操控。我经常从他那里收到与工作相关的手机短信，有时甚至是在周末。我感到压力非常大，因为我不再享受到这份工作先前所给我带来的那份独立性和自主性。领导可以随时联系我。我需要 24 小时保持手机开机，甚至是休息或者休假期间，以便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接受领导委派的新任务。

诚然，办公室工作电子化的转变为出版社的领导采取额外的控制机制提供了可能性，而计算机系统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技术支持。在上海的一些出版社中，监控设备在工作中开始慢慢使用，用来监控编辑的正常工作。毋庸置疑，这种不断强化的监控加剧了编辑的压力和不适。

二、媒体市场化进程中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原则

长期以来，在中国，探讨国家、市场与媒介知识劳工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媒体与社会研究中的热点话题。一方面，「国家」、「政府」、「政党」等分析单元常常被看作是外在于社会公众，甚至与社会公众利益相对立的「权

威力量」。媒介知识劳工「独立」、「自由」的信息传播活动所面临的若干限制成为不断印证这种二元关系的论据。另一方面，「市场」的力量或被当作消解权威的有力手段，或被认为是建构威权的共谋者。对传媒活动二元论的分析视角既构成了媒介知识劳工自身职业的一种基本取向，也构成了多数关于媒介知识劳工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王维佳，2011）。

（一）市场竞争的兴起

Minxin Pei（裴敏欣）认为：「在中国，市场的力量已经成为了社会角色不断巧妙地影响政治过程和改变国家和社会之间平衡的一个主要途径」（Pei, 1994, p. 150）。对于中国的传媒产业而言，市场化的深远影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媒体在体制上对国家的依赖性——这主要通过利益、行为以及导致大众传媒结构变化的商品化过程而得以实现（Lee, 2000; Gang & Bandurski, 2011）。市场化已经使中国的大众传媒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市场竞争以获得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像先前那样，通过其在整个传媒系统中的层级位置以及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获得生存和发展。¹ 为了响应媒体的市场化进程，中国的媒介知识劳工已经更为清晰地认识到市场的需要，通过各种合法的手段来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因此创造利润成为了他们活动中非常重要的目标（陈丽菲，2007）。

编辑人员重新认识到具有较强市场开拓力的重要性，同时他们需要更多地对读者负责。市场开拓力包括市场开拓的广度和深度。就广度而言，它包括市场覆盖面、市场管道的开拓、饱和市场的切入、空白市场的占领、潜在市场的发掘等，其中格外重要的是随着媒体市场化的深入，编辑人员需要为读者提供更有吸引力的信息，包括：经济新闻、体育新闻、社会新闻以及实用的日常信息。此外，编辑需要不断通过回馈和受众参与来和读者进行不断的互动。在与一名编辑人员（受访者4）的深度访谈中，她这样说道：

¹ 展開來說，中國的媒體已經進入了「內容為王」的時代。在市場經濟時代，決定媒體生存和發展的因素不再是行政力量，而是靠媒體的品質和內容說話。在計劃經濟時代，出版社不存在生存的壓力問題，也不存在相互競爭讀者市場的問題。計劃經濟時代的出版物可以不考慮讀者的需求，而只考慮宣傳任務和宣傳效果。但改革開放以後，計劃經濟時代那種靠行政命令搞出版發行的做法已行之無效。

现代编辑人员需要牢固树立读者导向的理念。以前对于书稿有无市场和读者，我们不是很关心。但现在，通过市场调研来了解读者的需求就变得异常重要。比如之前在确立选题、内容安排、版式设计等方面，我们很多情况下会从自己操作方便的角度来考虑，而现在一切需要从满足读者需求出发的角度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具备快速、准确判断书稿内容是否具有市场的能力，并通过对读者反应的预判，不断对书稿内容进行修改。

就深度而言，市场开拓力包括市场细分、对读者的宣传和开发，以及售前与售后服务等。为了更好地对图书进行销售，编辑人员需要不断利用大众传媒（主要是互联网）加强对图书的宣传活动，如新书发布仪式、签名售书、读书活动。一方面，编辑人员对图书进行宣传是图书宣传的一种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出版社也往往自行编印一些宣传品，如俱乐部会刊等，利用各种途径赠送读者，让他们加深对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的了解，引发和增强读者的购买动机，从而将社会效益和读者需求两者更好地有机结合起来。这位编辑人员在访谈中补充道：

在出版社中，我们往往通过新书简介、书评以及搜集市场回馈信息更好地与读者互动，增加图书的销量。具体来说，新书简介主要介绍图书的主要内容、特点、读者对象和适用范围；书评旨在通过更广泛和深入的分析 and 评论，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和阅读指导；市场回馈信息主要包括：图书内容、文字、编校、装帧质量、定价以及社会效益。在当前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结构中，城市消费者的文化需求是我们首要关注的——因为他们具有更强的购买能力。

总之，媒体市场化过程导致了信息的多样化，强调商业性和专业主义的利益要求。因此，尽管共产党对于大众传媒的控制不减，但这种控制正渐渐受到来自媒体市场化过程的挑战——经济的原则和市场的逻辑已经开始对决策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 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原则

尽管与市场化过程相伴随的各种社会变迁，使大众传媒的作用和功能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内，大众传媒的地位仍十分特殊且敏感，因为它被视为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工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于共产党和国家增强合法性以及大众的思想引导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Chan, 2003)。因此，大众传媒根本的指导原则并没有发生转变——从原则上来说，大众传媒仍然是共产党和政府重要的政治宣传工具，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赵月枝看来，「宣传模式」是分析中国传媒产业的一个根本的结构框架 (Zhao, 1998)。

在宣传模式的分析框架内，内容审查成为了对中国出版产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为**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事先审查**，主要是指在言论出版、传播之前实施控制，具体包括出版计划备案制度、重大选题备案制度、责任编辑制度。**事后审查**是指在具体言论被出版并公开传播之后，根据法律规定和出版物产生的不良影响，对作者或出版者实行处罚。在中国，后者是对出版物采用的主要审查制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出版物审读制度，即：对含有违法内容的出版物依法追究其作者、出版者和传播者的责任。

中国出版产业中的编辑人员需要无条件地遵循「共产党领导」的原则。他们在工作中需要仔细地选择「正确」的措辞——因为他们所处的体制因素直接影响着他们对于媒介内容的选择，他们通常不会选择出版与出版社指导原则相背离的题材，因为这将意味着被调离岗位或者解除合同 (刘晓红, 2007)。比如，他们使用官方能够接受的话语体系尝试着对商业活动进行框架性的描述，然后将宣传的分析植入到市场的逻辑中去。这个观点在与出版社编辑人员 (受访者 7) 的深度访谈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左证。

在出版社中，严格的规范要求编辑人员了解 (共产) 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的环境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准确把握具有全局性、整体性和前瞻性的问题，从而培育自身的「专业意识」，这种意识既包括政治鉴别力，又包括政治敏锐性，这是编辑人员思想修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清楚地帮助我们辨析编辑工

作意识形态的边界。这种「专业意识」同时也可以帮助编辑决定哪些问题和表达是不可能被接受的。良好的「专业意识」可以有效地将（共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体现在选题当中，并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因此它是「职业成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许多媒介知识劳工选择与政治经济精英合谋，成为他们的支持者。而且，中国的媒介知识劳工成为了相对自律的群体，以应对审查及其与之相伴随的共产党的权力和制度化的控制（Pan, 2000 ;Pan & Lu, 2003）。虽然中国的传媒系统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的速度与市场化进程呈正相关性——然而，在中国的传媒产业中，坚持「共产党领导」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关注「共产党领导」的原则，因为共产党依然领导并对大众传媒进行管理，同时规范着传媒产业中的知识劳工及其行动。

（三）宣传—商业模式中的持续张力

在媒体市场化的进程中，共产党和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指导大众传媒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市场需要创新，而这种创新的要求使共产党和国家面临着诸多的压力，需要他们不断对传媒产业中的政策进行动态的调整。因此，中国的每次媒体改革都是共产党和国家与市场之间互动的产物。

然而，在由共产党领导的传媒系统和中国现行的媒体市场化过程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对媒介知识劳工而言，这种结构性的张力表现为对共产党的忠诚和专业主义之间的博弈。Dong 与 Shi 认为，这种矛盾性带来了许多变化，包括他们身份的变化、工作性质的变化、社会作用的变化以及对于工作评价和奖励原则和标准的变化（Dong & Shi, 2007）。在这些变化中，最根本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媒介知识劳工面临着创造利润、推进媒体民主化以及促进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压力。而不管是媒体民主化的推进还是政治和社会改革都需服从于整个国家的政治利益。这就构成了赵月枝所定义的「宣传—商业模式」的内核，同时它也是中国媒介知识劳工工作和生存环境的根本特征（Zhao, 1998, p. 151）。

在中国的出版产业中，大多数编辑人员已经充分意识到这种张力的存

在，这实实在在地表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而并非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层面。在与一位出版社编辑人员（受访者 8）的深度访谈中，他提到：

出版产业已经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具有双重功能的产业。一方面，与大多数的企业一样，出版社必须创造利润；另一方面，出版社是国家宣传工具的一部分。因此，出版社作为企业，并不在工商部门的直接监督之下，而是在宣传部门的直接控制之下。宣传部门颁布了许多「可以做的事情」和「不可以做的事情」用来规范我国的出版产业。

正因为出版社的这种双重属性，我们必须在既定的政治结构框架内不断追求经济利益。因此，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出版社开始越来越少地出版政治性读物，如重要领导的讲话，而越来越多地出版不具有政治性的读物，如关于娱乐和公共服务的图书。这种变化虽然是渐进的，但却异常清晰。关于时尚、园艺、旅游以及厨艺方面的图书已经十分流行。然而，不管出版什么样的读物，我们必须创造性地确保「政治正确性」。更为重要的是，出版社中大多数的编辑人员和领导以及政府官员为了打破「政治禁区」而需要创造性地发挥他们的「政治智慧」，而不是简单地批判和颠覆官方的「意识形态」框架。

一言以蔽之，从中国的媒体市场化伊始，媒介知识劳工需要同时对共产党和公众的利益进行表达，兼顾党内的精英、商业精英、文化精英以及城市中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这种协商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了中国媒介知识劳工的角色，他们不断陷入权威 / 社会责任、宣传 / 服务大众的两难困境。

三、「单位制」的瓦解与出版社的转制

在改革开放之前，出版社为每位编辑人员提供相对稳定的工资和较为良好的工作环境，以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出版社为个人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

保障，包括：养老金、住房、医疗和学校等。与此同时，出版社也是宣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组织，以加强党的领导 (Naughton, 2007)。一旦进入某家出版社，编辑人员往往会在该出版社工作直至退休。因此，在「单位制」体系内，中国的出版社不仅仅是经济组织，同时具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非经济功能，即：行政功能、政治功能以及社会福利功能。

然而，在「单位制」体系内，大多数的编辑人员并没有对出版社表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他们中的部分工作并不十分努力，而且生产效率相对低下。除此之外，他们既不受管理规范的约束，也不受管理程序的控制。举例来说，在出版社中，缺勤率一直居高不下；在工作时间，编辑人员往往外出处理自己的个人事务。正因为如此，一种新的管理体系的应运而生就变得非常必要——在新的体系中，改变这种生产怠慢的态度和行为就成为了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单位制体系伴随着一系列对社会雇佣关系结构的重塑而彻底瓦解。1986年，国务院通过引入劳动合同制度，重新规定了劳动关系。新的劳动合同鼓励每个企业根据自己的经济和利润情况，雇佣或者解雇在职员工。换句话说，企业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他们对人事和薪资具有决定权，而不像在先前的单位制体系中，单位只能被动接受由当地劳动局分配到单位中的每个员工 (Whyte, 2010)。²

但在新的企业制度体系中，工人阶级面临着新的被边缘化的威胁，因为工人的收入不断减少，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被企业辞退或者解雇，且不受国家的保护。在一些具体的案件中，当企业面临破产的时候，企业全体员工的工作和生计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同样，单位制体系的社会福利系统被国家福利系统替代，而在国家福利系统中，工人的奖金、补助和福利分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福利的大幅度缩减日趋明显。举例来说，在单位制体系中，工人的医疗花费全部由单位进行实报实销，有些单位甚至负责家属的医疗费用。然而，在新的体系中，即使是工人本人享受到的医疗福利也变得非常有限。

² 中國出版社的改革包括兩個具體的步驟，即「改企」和「轉制」：前者是指出版社由原來的事業單位身份轉變為「自負盈虧」的企業身份；後者是指出版社從「單一國有制」改為「股份制」。參與本論文深度和補充性訪談的編輯人員所在的出版社現均為股份制（有限）公司。

在中国的出版产业中，废除单位制体系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出版社的社会和政治压力，同时改善他们在市场中的经济状况。为员工和退休人员提供奖金、补助以及福利成为了许多出版社入不敷出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时，出版社编辑人员所领取的奖金、补助和福利差不多和他们在出版社拿到的工资几乎相当。为了更好地应对沉重的经济负担，许多出版社纷纷尝试着减少员工的福利；要求编辑人员个人部分地支付自己的福利，比如继续教育和培训费用、医疗费用以及住房费用，而且支付比例越来越高；奖金、补助和福利分配的标准更以绩效为标准，而不再以公平为第一要义。

对于编辑人员而言，这些变化是实质性的。在出版社从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制的过程中，他们的职业安全感变得越来越弱，社会福利保障大大减少。从这方面来说，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人」的优势地位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改变 (Rocca, 2003)。因此，我们并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多数大学和专业院校的毕业生不会选择编辑工作作为他们最为理想的职业，尽管编辑人员的社会地位依旧很高。此外，为了更好地应对职业安全感的消逝和社会福利保障的缩减，大量的编辑人员更倾向于去民营或者是跨国出版公司工作。因为与由国有出版社转制而来的出版集团相比，大多数民营和跨国出版公司可以为编辑人员开出更高的工资，提供更为灵活的工作方式，即使这可能意味着更大的工作压力。因此，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不管是民营出版公司还是跨国出版集团在中国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他们在图书出版市场的份额几乎接近于整个图书出版产业每年出版总量的 50% (崔保国, 2010)。

四、知识劳工内部的分化

在单位制体系中，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分配资源的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现象——这可能导致相同职业工人的利益出现分歧或矛盾。然而，因为所有的工人都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这些分歧或矛盾不具有本质的对抗性。但是，通过对在上海许多出版社进行的深度访谈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工人之间非对抗性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受到来自于传媒改革的挑战，尤其是对出版社而言，当出版社从事业单位转型为企业的时候，这种非对抗性的关系已

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初级编辑和高级编辑在出版社中被区分对待，这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断紧张。首先，初级编辑和高级编辑签订合同的年限不同。在上海的许多出版社中，通过与编辑人员的深度访谈发现，初级编辑一般都在工作的前三年每年签订劳动合同。直到第四年开始，才可能每三年一次签订合同。与此同时，高级编辑一开始就可以三年签订一次合同。在这以后，他们签订终身制合同。对高级编辑来说，合同更多的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并不对他们产生实际的作用——他们之所以需要签订劳动合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动法》的规定。

其二，在出版社中，初级编辑和高级编辑的工作难度和强度不一。从出版产业的市场化伊始，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高级编辑往往负责利润比较丰厚或者市场比较成熟的图书，如：编辑教科书。另一方面，在上海的许多出版社中，初级编辑往往主要负责专业性较强的图书。对这些图书而言，要预测有多少读者会购买这类图书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市场的不可预见性，利润变得不可预期。在与一位出版社编辑人员的深度访谈中，他谈论到：

在我们的出版社中，高级编辑主要负责编辑和出版会议手册或者政府指南。他们不需要为这些出版物的销售问题担忧，因为这些出版物往往会事先被购买。初级编辑通常需要编辑与科学技术相关且非常专业的图书。举例来说，领导给我安排编辑一本关于糖尿病研究的当代科学发展图书的任务。这些图书的读者群非常有限，因此出版这些图书不可能带来丰厚的利润。我的同事中有专门负责「季节性」刊物的，比如说关于针织的图书。他们往往面临着固定的截止日期，因为在这个期限之前，这些图书的需求量很大。因此，从事「季节性」图书出版的编辑往往需要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加班加点，有时一天需要工作 12 个小时，甚至通宵达旦。

其三，对于初级编辑和高级编辑的奖惩机制大相径庭。就奖励机制而言，高级编辑一般来说比较容易得到晋升。在中国的出版产业中，高级编辑因为

他们的年龄而并非他们的职业技能或者能力而受到大家的尊敬——因为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长者往往会得到更为广泛的尊敬。就惩罚措施而言，高级编辑即使未能完成相应的利润指标，只要他们工作态度端正，不影响领导对其他编辑人员的管理，基本上不会因为完成不了工作指标而影响自身的实际收入。相反，初级编辑为出版社所创造的利润相对来说就会进行较为精确的计算，而他们收入的很大部分来自于其为出版社带来的利润。也就是说，如果初级编辑不能够完成利润指标，他们的总收入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正因为这样，初级编辑承受着更大的经济和工作压力，他们需要确保出版的图书叫卖，因此他们对读者的需求极其敏感。

事实上，在中国的出版产业中，初级编辑和高级编辑面临着因媒体市场化而带来的共同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导致了编辑人员不断被边缘化。然而，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即使与初级编辑相比，高级编辑可能缺乏竞争力，但初级编辑的境遇更令人担心——他们被迫签订时效性更短的合同、承担更具挑战性和压力更大的工作，以及出版社内不公允的奖励和惩罚措施。因此，雇佣关系广义上的分化现象（fragmentation of employment）日益明显，尤其是当这种不同和不公平出现在「曾经在相同工作环境中被雇佣的工作人员」之间（Flecker et al., 2009, p. 32）。现在，初级编辑和高级编辑都持续地感受到巨大的工作压力和不确定性（Krings, Nierling, Pedaci, & Mariangela, 2009）。然而，最为根本的是，在初级编辑中弥漫着不满意感，初级编辑和高级编辑之间不断涌现的矛盾和摩擦导致了编辑人员之间紧张的关系，从而加剧了出版社知识劳工内部的分化，削弱了劳工联合和劳工抗争的阶级基础和可能性。

伍、结论

社会转型是结构和能动性相互建构的过程。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的经济改革伊始，中国出版产业的改革对每位编辑人员工作和生活的每个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对他们雇佣关系、工作环境、生活状态、社会关系的影响。包括技术、政治、经济以及最重要的阶级关系和权力变化层面的根本社会变革使他们陷入困境。导致这些困境的原因主要来自新媒体技术发展、

如何在媒体市场化的进程中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原则、「单位制」的瓦解与出版社的转制，以及知识劳工内部的不断分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编辑人员被迫采取不同的方式来保障他们自身的权利，并竭力摆脱他们现在所处的种种困境。其中较为有效的一个方式就是内部协商。大多数大型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尤其是初级编辑在出版社中劳工组织的说明下，已经通过各种管道和领导之间建立了各种交流的途径，为的是能够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并且通过各种规定来对他们的工作时间和每个月的工作量进行限定。更为重要的是，在对中国的出版产业编辑人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将他们所遇到的问题视为整个工人阶级遇到的挑战的一部分，并在分析的过程中，理解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劳工在当代中国转型过程中所面对的共有的问题、风险、挑战与前途，以及与工人阶级的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传播产业和包括编辑人员在内的知识劳工所处的制度化的权力结构之间广泛的社会关系裨益良多。

参考书目

- 王晨（2009）。《中国出版业的产业竞争与政府规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 王维佳（2011）。《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朱西西、代长珍（200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知识劳工〉，《中国经贸导刊》，24: 103-104。
- 陆学艺（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陈丽菲（主编）（2007）。《现代图书编辑实务教程》。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 崔保国（主编）（2010）。《2010年中国媒体产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子辉（2004）。〈在体制和技术上同步推行出版改革〉，《中国出版》，12: 37-39。
- 张望军、彭剑峰（2001）。〈信息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趋势〉，《中国人才》，8: 21-23。
- 黄孝章、张志林、陈丹（2011）。《数字化出版产业发展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 刘玉方（2001年12月36日）。〈浅谈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结构的变化〉，《工人日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OP-c/89831.htm>）
- 刘晓红（2007）。《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Adams, Tracey and Sandy Welsh. (2008). *The organization and experience of work*. Toronto, Canada: Thomson and Nelson.
- Bell, D. (1999).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Berg, Bruce. (2007).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6th ed).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 Braverman, Harry.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Chan, J. (2003).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and media marketiz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newspaper, TV and internet markets in China. In C.C. Lee (Eds.),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pp. 159-176). New York, NY: Routledge.
- Denzin, N., & Lincoln, Y. (2003). Introduction: The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Denzin & Y. Lincoln (Eds.),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materials* (pp. 1-45).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onald, S., & Keane, M. (2002). Media in China: New convergences, new approaches. In S. Donald, M. Keane & Y. Hong (Eds.), *Media in China: Consumption, content and crisis* (pp. 3-17). New York, NY: Routledge.
- Dong, S.G.P., & Shi, A.B. (2007). Chinese news in transition: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ompetition. In D. K. Thussu (Eds.), *Media on the move: Global flow and contra-flow* (pp. 182-197). London, UK: Routledge.
- Flecker, J., Holtgrewe, U., Schönauer, A., & Stavros, G.(2009). *Value chain restructuring and company strategies to reach flexibility*. Leuven, Belgium: HIVA.
- Gang, Q., & Bandurski, D. (2011). China's emerging public sphere: The impact of media commercialization,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internet in an era of transition. In S. Shirk (Eds.), *Changing media, changing China* (pp. 38-76).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rrison, B. (2000). Journalists' perceptions of online information-gathering problem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7(3), 500-514.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a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 V.H. (2003). *Labor dispute resolution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labor rights and legal reform*.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 Hobsbawn, E. (1973). Karl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ography. In R. Blackburn (Eds.),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s* (pp. 265-283). New York, NY: Vintage.
- Kring, B-J., Nierling, L., Pedaci, M., & Mariangela, P. (2009). Working time, gender and work-life balance. Leuven, Belgium: HIVA.
- Lee, C. C. (2000).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Lee, C. K. (2007). *Working in China: Ethnographies of labor and workplace transforma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 Liu, C.D. (2006). Deskilling effects on journalists: ICTs and the labour process of Taiwanese newspaper reporters.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 695-714.
- Mosco, V. (2006).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 494-497.
- Mosco, V. (2008).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Canadian Journal of*

- Communication*, 33, 121-125.
- Mosco, V.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2nd ed). London, UK: Sage.
- Mosco, V., & McKercher, C. (2008).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Naughton, B. (2007).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and London: MIT Press.
- Pan, Z.D. (2000). Improvising reform activities: The changing reality of journalistic practice in China. In C. C. Lee (Eds.),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pp. 68-111).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Pan, Z.D., & Lu, Y. (2003). Localizing professionalism: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China's media reforms. In C.C. Lee (Eds.),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pp. 215-236). London, UK: Routledge.
- Pei, M.X. (1994).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cca, J.-L. (2003). Old working class, new working class: Reforms, labour crisis and the two faces of conflicts in Chinese urban areas. In T. Fisac & L. Fernandez-Stembridge (Eds.), *China today: Economic reforms, social cohes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ies* (pp. 77-104). London, UK: Routledge.
- Ross, A. (2009).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it: Life and labor in precarious times*.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Stake, R. (2000). Case studies. In N. Denzin & Y.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2nd ed) (pp. 435-454). Thousand Oaks, CA: Sage.
- Vallas, S., Finlay, W., & Wharton, A. (2009). *The sociology of work: Structures and inequalitie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hyte, M. (2010).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Yin, R. (2009).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4th ed). Beverly Hills, CA: Sage.
- Zhao, Y.Z. (1998).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Zhao, Y.Z. (2001). Media and elusive democracy in China. *The Public/Javnost*, 8(2), 21-44.

**The Problems of Knowledge Workers in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 Case Study of Editors in the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Jianhua Yao*

ABSTRACT

Contributing to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knowledge workers,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four critical problems for editors in the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These problems, tightly associated with current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cluding technologi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nes, and, most importantly, changes in class relations and power dynamics are the following: problems related to technological change, problems of how to follow the political principle in the media marketization process,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the smashing of the work-unit system, and problems resulting from internal divisions within knowledge workers. Moreover, by incorporating findings discovered in the case studies of two publishing houses in Shanghai,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wider so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power structure in which editors, and knowledge workers in general, are situated.

Keywords: knowledge workers, editors, publishing industry, media marketiz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 Jianhua Yao receives his PhD. degre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Queen's University, Canada. He is currently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He also serves as a research assistant in The State Innovative Institute for the Studie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ociety at Fudan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Research Center at Fudan University. email: yaojianhua@fudan.edu.cn

当代拉丁美洲的另类传播： 委内瑞拉英语另类媒介及其对主流新闻的回应*

冯建三**

本文引用格式

冯建三 (2018)。〈当代拉丁美洲的另类传播：委内瑞拉英语另类媒介及其对主流新闻的回应〉。《传播、文化与政治》，8:103-139。

投稿日期：2018 年 3 月 19 日；通过日期：2018 年 6 月 30 日。

* 初稿发表于「绿色小组与另类媒体运动—纪录的政治与其当代意义」研讨会，台湾绿色小组影像纪录永续协会主办，台北市华山文化园区，2016 年 11 月 20 日。承蒙审查人的批评与建议，现稿已大幅度增删与润饰。

** 作者冯建三为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e-mail: jsfeng@nccu.edu.tw。

《摘要》

委內瑞拉在本世紀開啟新頁，宣稱「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是其奮鬥目標。十多年來，雖然距離該宣稱的達成仍有很遠距離，該國已經取得的若干成績仍應肯定，惟該國傳統、也是主流傳媒及海外菁英媒介輕則不予報導，更多則是就其必有的缺陷，放大乃至扭曲與丑化，遑論揭示委國奮進的國際意義。見此，委國政府結合烏拉圭…等拉美國家，先後成立「南方電視台」西班牙語及英語頻道，美、澳、英、德等多國的知識分子與社運人士也創設「分析委內瑞拉」英文網站，以報導、匯整並流通有別於主流新聞的委內瑞拉歷史與當代情境的知識與詮釋，提供了關注委國及世界進步志業前景的人，不可或缺的信息來源及理解框架。

关键词：「委內瑞拉分析」網站、「南方電視台」網站、另類傳播、委內瑞拉、新聞扭曲

壹、拉丁美洲政府与另类传播

反移民、反对女性主义及其价值观，怀疑「气候变迁」说法而不热衷再生能源政策的「另类德国党」(AfD) 在 2013 年崛起、并在 2017 年入秋于联邦政府取得国会席次。¹不过，AfD 的「另类」(alternative) 概念，其内涵与本文无关，这里所说的「另类」仍然承袭似已约定俗成的指涉，它是有别于主流，并且与基层及参与民主、环境保育、LGBT 权益、劳动民主、经济平等、社会民主有较多的亲近连结。

从事另类新闻编采与评论的华人，从 2009 至 2015 年联合出版三本文集，纪录与检视两岸四地及马来西亚华人多年来的另类、草根、小区，或者，游击式的传播活动（林蔼云、叶荫聪编，2009；叶荫聪编，2011；管中祥编，2015）。其中，公权力（国家 / 政府）与这类传媒的关系是些什么并不是这些文字的主轴，因此仅有三位来自香港、澳门与台湾的作者，以略多于蜻蜓点水的篇幅，稍见提及。

比如，港府一度宣布要让「香港电台」，使其转型为公共广电机构，港人曾经就此发起「撑港台运动」，但除此之外，从事另类传播活动的香港人，鲜少有人处理「传播政策」议题。在台湾，情况有些不同，论者曾经意识到台湾的公共电视无法不由政府编列预算，但其新闻对公权力的批评并不少见，包括对另类观点的呈现；另有创办独立媒体的人则说，渠所从事的传播活动，约略可以算是得到「公部门的支持」、「拿国家经费进行『另类试验』」（叶荫聪，2009，页 49, 52, 54, 66；叶荫聪，2011，页 65；叶荫聪，2015，页 21；梁家权，2015，页 179；管中祥，2009，页 105-6；管中祥，2015，页 116, 125）。

前述三本文集之外，另有学者提醒，中国大陆政府固然严格限制其传媒的政治表意尺度，惟大陆传媒在报导某些社会运动与社会冲突的时候，不但保守，并且往往「积极介入」而「正面报导」（赵鼎新，2017，页 281-309）；「另类媒介」在中土自然也是存在的，它们是「对主流媒介议题缺失与商业

¹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ternative_for_Germany

垄断的有效补充」(曹晋, 2015, 页 123); 邱林川(2013) 特别重视新工人阶级对新媒体网络的建构与使用, 而民间社团与倡议人士同样屡屡运用网络等媒体, 为劣势人口发声(Yin, 2018)。但大陆传媒的这些表现, 与公权力的政策并无任何关系。

综合前述扼要说明, 是要用来对比拉美情境。在华人社会, 从事另类传播活动的人至今鲜少从正面的角度, 探讨公权力媒体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还没有将「传播权」当作是如同教育、医疗健康…等等权利, 视为是政府必须要有所作为而给予满足的权利项目。华人倾向于认定, 政府若是袖手旁观、不去侵犯传媒的编采自由与运作空间, 已属可贵, 消极表意自由的取得与维系, 似乎已经穷尽了华人社会对公权力与传媒关系的想象。对于当前的中国大陆与马来西亚之华人, 固然如此。对于台湾的华人来说, 同样走过这个历史情境: 解严以前的台湾, 在公权力的指挥下, 主流影音传媒漠视或扭曲异端活动, 因此有「绿色小组」在 1986 年诞生, 纪录与流通遭致政府压制的内容, 其成员并未想象公权力可以对其所从事传播活动, 能有正面贡献。(陈世宏, 2016)

拉丁美洲的另类传播与华人的经验, 呈现强烈对比。

一方面, 对公权力敬谢不敏的姿态, 一如华人社会, 同样也是存在。在这方面, 最知名的是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EZLN)的例子, 他们善用新传播科技(Burbach, 2001), 从事「改变世界不夺权」(Holloway, 2002; Guillén, 2017)的抵抗运动, 这些原住民、农民及其社会运动举世知名; 虽然, 墨西哥另有从事选举并挑战体制的左翼民族主义力量, 研究拉美政治的人指出, 他们原本有机会执政, 却先后在 1998 与 2006 年, 两度出于执政者选举舞弊, 致使未能取得权位(Hayden 2015, p.124, 196)。

他方面, 拉美的另一种经验可以说是迥异于 EZLN 的模式, 二者南辕北辙。这里是指, 本世纪以来, 拉丁美洲同样、甚至更为引人注目的另一个社会现象, 是以委内瑞拉为首(其次是玻利维亚与厄瓜多尔)的宣称。2005 年以来, 他们先后出现重要的政治力量, 矢志要建设「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Burbach, Fox, & Fuente, 2013), 其中一个重要的机制就是〈打造国家, 推

进革命：小区与公共媒体的例子〉(Artz, 2012)。然而，依据美国「自由之家」的测量，以上三国的新闻自由得分在 2001 年是 40~44 分，仅属于「局部自由」(台湾的 21 分则是「自由」)²，到了 2015 年，它们甚至退到了「不自由」的状态(得分是 49~80 之间，台湾仍是「自由」的 26 分)³。

因此，假使「自由之家」的测量为真，拉美经验就是华人经验的悖论。在不自由、并且每况愈下的环境，委内瑞拉等国的社运份子依旧在召唤公权力，协助其小区与公共传媒等另类传播活动的推行；即便他们未必能够如愿，甚至遭其政府以社会主义之名，予以阻碍。

何以华人与拉美的经验存在这个反差？是不是「自由之家」的测量未必正确，甚至可能因为带有偏见而扭曲？这个论题值得探索，但这里存而不论，本文的任务是添加重要的案例，补充下列陈述：

委内瑞拉在 1970-1980 年代已经有很多人努力，想要建立小区与另类媒体，但它们彼此并没有联系，也没有得到政府通过法案的方式给予支持...1984-1999 年间，委国政府核发了 300 个收音机电台执照及 50 个地方电视台执照。但这些新照有八成是私人持有，与后来人们称为另类或小区的传媒，创办宗旨并不相同。到了查维兹 (Hugo Chavez) 于 1998 年当选总统后...过去十年的小区媒体可说业已不可同日而语，相较于 1980 年代这类媒体以秘密方式存在的光景，当前的这类委国传媒面貌，已经得到明显地改观...既有立法架构的支持，又有基本权利的保障。电波民主化的进程至此已经出现质变... (Martens, Reina, & Vivares 2016, p.275)。

与前引陈述相互呼应，《粉红浪潮：拉丁美洲的传媒近用与政治权力》(Artz, 2017) 对委内瑞拉在本世纪的传媒政策，也有相当高的评价；它说委内瑞拉扮演了前导的角色，领先在 1999 年的新宪法第 58 条肯认人们应当有

² <https://www.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FOTP%202002%20Regional%20Score%20Tables.pdf>

³ https://www.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FH_FTOP_2016Report_Final_04232016.pdf

「自由与多元传播」的权利。继之，2000年她再以新的传媒法，率先在拉丁美洲创下传媒三分的概念（「国有」、「私有」与「小区」媒体）。到了2004年，《收音机与电视社会责任感法》设有「民主化与参与」专章，强化本国与小区影音的生产。联合国表意自由报告专员鲁氏（Frank La Rue）认为，这个制度设计在「拉美及世界，都是模范」；其后，再有阿根廷、乌拉圭、厄瓜多尔与玻利维亚，也都先后提出类似的新法。在拉美出现的这幅新世纪、新传媒景观，「在政府支持下，小区传媒相当兴盛…这类传媒犹要胜于公共媒体…（可以呼应）草根活跃份子的要求，使其得以通过民主的方式，直接控制自己所经营的传媒」，并且，这些作法正是联合国人权宣言的落实，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0年报告书《许多声音 一个世界：迈向新而更为公正并且更有效率的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NWICO）所提出的主张。（Ciccariello-Maher & Sapiezynska, 2017, pp. 50-51, 60）

不过，这些进展与专论较少得到资深传播研究者的注意。比如李金铨编纂的《国际传播》回顾并检讨拉美依附理论（Lee 2015a, pp.8-10; 2015b, p. 211），未曾就此着墨；又如，莫斯科（Mosco, 2009）甚至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第二版，删除了第一版仍予强调的NWICO及有关拉美传媒的讨论（Mosco, 2009）。但拉美的经验毕竟突出而难以见弃，表现在新世代的研究者的相关论述渐有积累（Fernandes, 2010, 2011; Martinez, Fox, & Farrell, 2010; Abalo, 2014; Cole, 2014; Guerrero & Márquez-Ramírez, 2014; Martens, Vivares, & McChesney 2014; Block, 2015; Hintz, 2016）。相较于英文的阐述，中文讨论也有一些，但并非实地的调查，而是文献的汇整与诠释。（冯建三，2009，页14-15；冯建三，2014a；冯建三，2014b，页24-36；张志华 2013；张建中 2013）。

虽然列属这些拉美另类传播的论述之林，本文自有三个特点。首先，本文介绍的两家媒体有其重要性，但传播学术界的相关探讨不足，「委内瑞拉分析」（venezuelanalysis.com, VA）除自述的文献之外，似乎别无专论，有关「南方电视台」（TeleSurtv.net）的介绍大多聚焦在西语频道及其网站，它的英语部门在2015年7月方始开办，评介尚少。其次，前述两个英语网站，特别是VA的原生及其转载的报导与评论相当重要，若要在欧美主流传媒散播的形象之外，另寻委内瑞拉的新闻及其诠释，VA是不能或缺的首要来源。

最后, TeleSur 的诞生, 是委国倡议, 他国政府响应; VA 是出身美国、英国、澳洲与德国等地的人, 结合委国社运人士所创, 其内容固然不排除服务委国人, 但既然是以英文行世, 其主要的作, 便是要让关注委国情势的海外人士, 得以从中取得另类的材料与观点。

貳、委內瑞拉：何以值得研究

委內瑞拉引起世人瞩目的原因, 与查维兹有关; 或者, 比较准确地定位, 应该说这是委国草根群众从 1950 年代以来的奋斗成绩 (Velasco, 2015), 是「我们创造了查维兹」的过程 (Ciccariello-Maher, 2013)。查维兹在 1992 年发动政变, 不遭唾弃, 反成英雄, 1994 年出狱, 1998 年底当选总统, 起初以「第三条路」知名, 后渐激进, 至 2005 年初宣布其前进方向的旗帜, 是「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一直到查维兹于 2013 年 3 月辞世至当年底, 已有不少纪录与解析 (中文部分可以参考冯建三, 2014b)。

2014 年初伊始, 委国两大传统执政党为主、计有 20 余个政党所成立的「民主团结联盟」(Mesa de la Unidad Democrática, MUD) 升高对峙。查维兹的继承人, 亦即「社会主义统合党」(del Partido Socialista Unido de Venezuela, PSUV) 党魁与委国总统马杜洛 (Nicolas Maduro) 承受挑战。这是新的、更为猛烈的攻击, 从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入夏不到四年, 委国相关事件已见若干英文维基百科的条目, 单仅依照年次排列, 就有四个。⁴除此之外, 另有一个独立的条目, 铺陈了该 2014 至 2018 年初的各类相关事件。⁵其中, 若干条目也有相应的中文版本。⁶拥有员工 100 多人的全球情报公司 Stratfor (全名是战略预测公司 Strategic Forecasting, Inc.), 从 2015 年起也设置专页网站, 编纂更为实时的委国事件作为投资者的参考。⁷

⁴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meline_of_the_2014_Venezuelan_protes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meline_of_the_2015_Venezuelan_protes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meline_of_the_2016_Venezuelan_protes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7_Venezuelan_protests

⁵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4-2018_Venezuelan_protests

⁶ 比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4-2018年委內瑞拉示威>

⁷ <https://www.stratfor.com/topics/politics/venezuelas-challenges> (2016 年 8 月 31 日檢視)

但是，這些中英文材料雖然數量很多，其立場與觀點卻是流於單一，致使它們等於是複製的過程，強化並且放大了委國反對派的說法與觀點。檢視「維基」條目所引述的 532 個來源，至少有 224 個取自反查派的西語傳媒，英語傳媒如 CNN 等等得到了 104 次引述；至於 TeleSur，僅出現兩次，VA 則未見援引。⁸

另類傳播得以出現的重要動力之一，肇因於主流傳媒報導不盡人意。本文的寫作同樣出於這個過程。在 2002 年委國政變而本地報紙大幅報導之前，作者對委內瑞拉完全陌生，其後，委國最大無線電視頻道執照在 2007 年屆滿但未得延長的新聞，再次讓人產生好奇與狐疑，遂在本地譯自英美傳媒的報導之外，另行積極尋找不同的來源，試圖比較準確地掌握與理解委內瑞拉的變化。

既有新的閱讀，前所未見的委內瑞拉地景，漸次浮現。除了另類傳播系統的成長，在歐美亞非等國都出現貧富差距擴大的背景中，本世紀的委內瑞拉一直到 2014 年底國際油價急速下跌之前，其社會的不平等程度反而減緩，醫療保健、各級教育、居住條件與其他社會福利的改善，也有不俗的成績。委國傳統的男尊女卑秩序固然尚無翻轉，但男女平權的意識明顯提升。普羅大眾因為生活境遇的改善，主體意識浮現並且日漸強化，以此作為基礎，基層組織與政府共構的「地方綜合體」建設雖然無法一帆風順，却有群眾仍在

時，2016 年 8 月 29 日事件亦已記錄）。

⁸ 以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4-16_Venezuelan_protests(2016/8/28 下載)這個條目為例，532 個引述，僅有兩則出自 TeleSur，VA 未見援引，委國最激進與草根的查派網路媒體 <http://www.aporrea.org> 也未見引用，雖然該網站經常批評官僚查派。反對查派的西文報紙或網站，該條目至少引述 224 次，包括 El Universal 有 101 次、2014 年 7 月 5 日被西班牙私募基金購買的 La Patilla 是 73 次、El Nacional 也有 33 次，而 TN24 是 17 次。可能支持查派的報紙 Ultimas Noticias 僅出現 12 次。英文的引述是 CNN(26)、路透社(22)、紐約時報(22)、衛報(14)、美聯社(10)與 BBC(10)合計 104 次，曾經與 TeleSur 合作但 2011 年因報導阿拉伯之春(sic)有不同意見的 Al Jazeera 則僅獲引用 4 次，蘇俄對外媒體 RT 獲得 2 次引用。該條目的維基中文版正文約 1.4 萬字，192 個引述有 103 處西文而 88 處英文，但沒有引述 VA、TeleSur 或 aporrea。造成引述「形式」偏倚的原因，或許有三。一是 VA 等是另類媒體，不受注意；其次是寫作維基的人，立場偏向反對派；三是寫作這個高度政治性條目的人，得有「美國民主基金會」等美國政府設置之基金會的支持。形式偏倚之外，另有實質偏倚，請見正文的討論。

挫折中奋斗前进（冯建三，即将出版）。内政之外，委内瑞拉再以其丰富的石油蕴藏作为后盾，推动以加勒比海地区为主的跨国区域合作项目 ALBA（见后文），俨然成为强权外交与金权经贸之外，另一种值得肯定的国际关系。

这些努力取得了若干成绩，虽然委国依赖石油的经济模式没有变化，致使环境遭受破坏的趋势尚未扭转（Salas, 2017）。然而，即便这些进展仍有严重缺陷，《倾听委内瑞拉》（Listen to Venezuela）的作者之看法相当准确，他们认为委内瑞拉的「社会运动…在 1990 年代加速，结合了『老派』的政治…它是巨型的实验，企图促成取代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另类方案之出现。」（Wayne & O'neill, 2011, p.130）让人扼腕的是，在欧美主流传媒主导而台湾传媒亦步亦趋之下，这个意义及其开拓的格局在扭曲之下，无法得到与世人公正见面的机会，从而对于世界走向的鼓舞与警惕，无从产生应有的作用。

这篇文章基于前述认知而作，将先行勾勒 2014 年初至 2017 年底的重要事件，以及台湾传媒译自外电所呈现的委国形象。其次，本文将要介绍与定位 TeleSur 与 VA 的性质。最后则是引述与整饬 TeleSur 而特别是 VA 的材料，提供有别于欧美及台湾主要传媒所传达的委内瑞拉事实与观点。

参、后查维兹年代的委内瑞拉及其形象

查维兹在 2012 年 10 月第三度当选总统。当时，已经连续二次代表反对联盟 MUD 参选的美丽达（Merida）省长卡普里莱斯（Henrique Capriles）很快接受结果并恭喜查维兹（Economist, 2012, October 13, pp.45-46）。这是罕见的纪录，过去，MUD 在各次大选之前，无不指控选举将有舞弊，选后则持续责怪选务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选民的决定。

查维兹在选后五个月辞世，总统改选在 2003 年 4 月登场，卡普里莱斯第三次代表 MUD 参选，仍然落败。同年底地方选举登场，MUD 再告失利，选票差距从 1% 增加至大约 10%。MUD 连番败选，并且流失更多选票，但它不肯接受民意的仲裁，反而伺机升高对抗。2014 年初，委国一起凶杀案激发民愤，大学生当中出身相对优渥的群体示威，MUD 顺势介入并持续主导。从 2 至 5 月，他们在反对派控制的若干城市或城区，发动「刮凌霸」（Guarimba）

街头暴力活动，常见手法包括在交通要道设置路障、投掷汽油弹、攻击政府建筑物、自制火炮攻击执法人员……等等。该次冲突持续 3 个多月，造成 43 人身亡，支持及反对政府的人各占了半数。但该国及海外新闻不谈在野势力必须要为死伤负起更大责任，反而颠倒是非，全面斥责政府杀人（Robertson, 2014, April 5; Ripley, 2017）。论者说，这次事件堪称世界奇迹：富人上街以暴力反对得到穷人支持的民选政府。对于这个荒谬的格局，智利学生联盟发布声明谴责委国学生会（Main, 2014, February 24）。以捍卫「自由软件运动与表意自由」知名的委内瑞拉人罗尔（Roa, 2014, May 22）则说，美国政府复诵委国反对派的说法，但实际上反对派的表意自由并没有遭到限制，他并且质疑，任何人假使通过社群媒体为暴力行动煽风点火，「英美等任何国家会容许吗？」

何以败选的 MUD 未曾消沈，反而改采更为激烈的「武斗」？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委内瑞拉从 1998 至 2013 年举办了 19 次选举，其后要至 2015 年底才有大选（国会代表），MUD 不愿意让执政联盟得到两年平稳治国的时空。其次，温和派普里莱斯虽然参选总统失利三次，但没有失去支持，而 MUD 的激进派早就环伺在侧，也蓄势待发想要夺取联盟的领导权，中产阶级学生的街头行动，正好提供了机会（Salas, 2015, p.213）。不过，亦有人提醒，领导权的竞逐固然存在，但 MUD 的温和与激烈路线的差异不宜夸大（Ellner, 2014）。

MUD 激进派在 2014 年的代言人是洛佩兹（Leopoldo López）与玛丽亚·马沙杜（María Corina Machado）。他们很快提出「下台」（the Exit, la Salida）作为运动的口号与要求，虽然马杜洛就任不到一年、未曾违法。

两人不是政坛新手，事实上，他们与 2002 年 4 月反查派所发动、成功两天而后崩盘的政变，渊源很深。曾经在政变期间出任一日总统的卡莫纳（Pedro Carmona）事后出版《在历史前作证》。他说，当时反政府的游行队伍突然改变方向，「授权的人就是首都加拉加斯查卡欧（Chacao）区长洛佩斯」（Laovato, 2015, July 27）。由于路线骤然改变，反对派人群在此引导下，很快就与力挺政府的群众冲突，造成十九人死亡。马沙杜则早在 2001 年成

立 Súmate，这是得到美国民主基金支持的反查派市民组织，她自己也签署了⁹2002 年的政变勒令¹⁰，2004 年的罢免查维兹公投活动，她也是领导人之一。

到了 2014 年 5 月，委国执政党与工商业界及 MUD 协商与谈判之后，街头动荡在该月底渐次平息。不过，这个时候反而是美国不肯罢手，其两院外交委员通过草案要求白宫制裁委内瑞拉，而当年底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也签署了执行命令（VA, 2014, May 28; BBC, 2014, May 29; Reuters, 2014, December 19）。过了半年多，国际石油价格开始大幅滑落（见表二），委国经济情势恶化，2015 年底 MUD 取得国会将近三分之二席次、2016 年 MUD 再次发动罢免公投、2017 年最高法院暂代国会职权引发系列动荡至 7 月底（Koerner, 2017；冯建三，2017a, 2017b）。如（表一）所述，从查维兹去世至 2018 年初，国际舆论频繁报导委内瑞拉的物资供应短缺，甚至指其已经到了「人道危机」的地步（见后文）。

表一：根据中文传媒标题，委内瑞拉经济即将崩盘，2013.4-2018.1

2013.5.17	委内瑞拉全民疯抢卫生纸 政府承诺进口 5 千万卷 /中国日报
2013.6.12	委内瑞拉商品短缺严重 卫生纸白糖成稀罕物 /中国食品饮料网
2013.8.13	委内瑞拉物资短缺引发购物骚乱 造成一男子丧命 /环球网
2013.11.15	委国上百商人 哄抬物价遭逮 /大纪元
2014.2.13	委内瑞拉纸张缺乏进口受限多家报社被迫停刊 /中国证券报
2014.5.2	全球痛苦指数 委内瑞拉第一、台湾第 88 /中央社
2014.8.23	委内瑞拉 超市买面包验指纹 / 人间福报
2015.1.14	油价暴跌 委内瑞拉濒临崩溃 / 经济日报
2015.2.27	石油换卫生纸 解委国物缺乏之苦？ /人间福报
2015.6.12	受不了齐头式薪资 委内瑞拉爆大学教授出走潮 /风传媒

⁹ 但她事後表示政變次日進入總統府，只是要探訪臨時總統卡莫納的夫人，她們是舊識故交。她又以為進入總統府本來就得在名簿上簽名，哪裡知道簽名等於是支持要廢除所有民主機構權利的勒令。不過，這個說法頗遭質疑，因為「政變陣營簽署勒令的儀式，早就通過幾乎是每個主要電視台與收音機電台，（重複）向全國放送，要說通通沒有看到或聽到，幾乎絕無可能。」（Jones 2007:352）

¹⁰ 2002 年 4 月 12 日，亦即政變次日起草完成，一般以據此勒令而擔任一日總統的卡莫納（Pedro Carmona）之名簡稱為 Carmona Decree，正式名稱是《民主轉型與國家團結法》（Acta de Constitución del Gobierno de Transición Democrática y Unidad Nacional）。

2015.8.9	物价涨 6 成委内瑞拉抢粮大战 /华视
2015.10.20	委内瑞拉币.狂贬..连抢匪都不要 /联合报
2016.1.31	委内瑞拉经济危殆 /工商时报
2016.3.16	委内瑞拉全国放假一周 减少高耗电对付电力危机 /星岛日报
2016.5.5	委内瑞拉变卖 12% 黄金储备求现 /工商时报
2016.6.21	委内瑞拉军人在面包店站岗防抢 大学生垃圾堆中找饭吃 /ET 新闻云
2016.8.16	人道危机？ 委国 15 万人越境买食 /世界日报
2016.9.18	委内瑞拉面临粮缺 5 岁女孩体重仅 5 公斤 /自由时报
2016.10.15	委内瑞拉监狱缺粮 3 囚犯疑被狱友杀来吃 /苹果日报网
2016.11.9	委国经济崩盘 总统下令民众挺军方配粮 /中央社
2016.12.20	委内瑞拉爆粮食危机 穷人只得送掉或弃养小孩 /风向新闻网
2017.1.3	800 万人每日只吃一餐 委国饥民涌入巴西 /TVBS
2017.2.14	委内瑞拉强硬派副总统 遭美列为大毒枭 /中央广播电台
2017.3.2	全球购买力排行：委内瑞拉人一天收入买不起早餐 /每日头条
2017.3.28	动物园没钱买食物了 大象只吃南瓜瘦成「大驴子」/ET Today 新闻
2017.4.1	委内瑞拉「政变」 最高法院夺权取代国会*1 /自由时报
2017.4.7	委内瑞拉连 3 天示威冲突 首都形同瘫痪 /公视
2017.4.20	委内瑞拉发动「示威之母」：全国百万人抗争的摊牌时刻 /联合新闻网转角国际
2017.4.28	不满施压 委内瑞拉要退出美洲国家组织 /新华网
2017.5.2	面对反对声浪，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宣布重新制定宪法 /端传媒
2017.5.7	反政府抗争再起 委内瑞拉妇女上空抗议 /自由时报新闻网
2017.5.21	汽油弹满天飞！委内瑞拉抗争持续 50 天 20 万人街头示威 / ETtoday 新闻
2017.6.13	委内瑞拉抗议人士烧黑政府办公楼外墙 /法广 RFI
2017.6.28	委内瑞拉抗争扩大 直升机攻击最高法院 /公视
2017.7.9	出乎意外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获准出狱 /苹果日报
2017.7.21	委内瑞拉反对派发起 24 小时罢工 要求总统放弃修宪 /环球网
2017.7.31	委内瑞拉政府：制宪议会选举投票率 41.5% /联合报
2017.8.12	川普不排除军事干预委内瑞拉危机 /中时
2017.8.18	委内瑞拉食品短缺 动物园动物被偷走果腹*2 /新华社
2017.8.26	美国宣布对委内瑞拉施加新制裁 设 30 天缓冲期 /中新社
2017.9.26	委内瑞拉经济重创民不聊生 民众卖发换现金*2 /民视
2017.10.12	委内瑞拉经济萎靡 露宿者当街剥皮割猫食*2 /东(方报业)网
2017.10.16	委内瑞拉地方选举马杜洛阵营大胜 反对派拒绝接受 /香港电台
2017.11.18	逃离软禁 遭罢黜委国首都市长将往欧洲 /中央广播电台
2017.12.4	委内瑞拉执政党副主席：资本主义是恶魔 /多维新闻网
2017.12.11	反对党抵制选举 专家：奉送马杜洛 /台湾醒报
2017.12.24	委内瑞拉释善意 圣诞节前夕放反对人士 /中央社
2018.1.6	委内瑞拉政府下令部分商品降价 超市被民众抢购一空*2 /新华网

*1 从 2017 年 4 月 1 日开始后的 4 个半月，民生物资短缺的新闻（以*2 予以标志）大量减少。

所有新闻在 2018 年 6 月 10 日点击仍可读到全文，本文电子文件均已加入超连结，点选即可连上原引述来源；若点击而无法取得，可能是原传媒网站已经取下该则新闻，假使遇有这个情况，请寄电邮给本文作者或本刊编辑 editor.2015ccp@gmail.com，当另以电邮寄请参考。
数据源：本研究搜集。

表二：世界原油价格，1998-2017

年*	油价	年	油价	年	油价
1997	19.65	2005	60.57	2013	105.03
1998	13.34	2006	74.40	2014	98.17
1999	20.53	2007	78.21	2014.12.28	52.03
2000	27.43	2008	78.21	2015	47.12
2001	26.35	2009	69.45	2016	41.45
2002	27.02	2010	78.95	2017	46.02
2003	30.54	2011	95.70	2017.12.29	60.42
2004	43.80	2012	88.06		

* 若未注明，各年均以 7 月 16 日或最近该日的可得油价为准。

数据源：<http://www.investing.com/commodities/crude-oil-historical-data>

〈表一〉显示，外电指称的委国物资短缺从 2013 年入春以来，即已开始。但〈表二〉显示，油价的下跌趋势，一直要到 2014 年底方见开始，对于依赖石油出口取得外汇的委内瑞拉，油价下跌的连动反应，就是进口物资的质量走低。反过来说，如果 2013 至 2014 年间 MUD 阵营因掌握经济资源而发动的经济战规模没有更大、假使马杜洛政府的治国效能没有大举恶化，那么这两年油价仍然处于高峰期，不应该会有那么多的物价短缺新闻，除非相关报导夸张不实。其次，2017 年 7 月的国际油价是 46 美元，犹低于 2014 年底的 52 美元，但从 2017 年 3 月底至 8 月中旬，外电却已很少报导民生物资的匮乏。

何以出现这个变化？可能的理由之一是，2017 年 4 月起至 7 月底，又有规模比 2014 年「刮凌霸」更大的对抗与暴力系列事件，致使外电暂时舍弃

了民生经济新闻，转而集中报导政治冲突。第二个理由是，先前的民不聊生新闻言过其实，至少它们是片面而不是完整的报导，并且，该类型报导很有可能演变为外力（特别是美国）顺势干预的口实之一，无论这是做此报导之传媒预期或未曾预期的后果。

无论是哪个理由，有待厘清的议题是，2013 年起至今（2018 年初）的委内瑞拉物资短缺，究竟到了那个程度、是哪些原因造成，委国政府的对策响应有没有产生作用？（表一）已经铺陈了主流传媒的说法，下文因此传达另类传媒 TeleSur 以及 VA 所提供的信息，从中判断与评估何者可能更为接近实况。

肆、委内瑞拉政府领衔创造：TeleSur

「毫无疑问，小区传媒很重要...但还不够，我们还要大处着想...全球发言。」

——TeleSur 创台台长、乌拉圭记者阿瑞哈尼安(Aram Aharonian)
(Artz, 2006)

查维兹在 2004 年 12 月与古巴签约。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平等程度，让人骇异」，两国因此率先成立「我们美洲人民的玻利瓦尔联盟」(Alianza Bolivariana para los Pueblos de Nuestra América, ALBA)，更为重视公平贸易及区域的经济整合，至今已有 11 个会员国，人口将近七千万。¹¹ALBA 在 2005 年召开第一次高峰会议，推出 19 个合作领域，包括「大众传媒」项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办西班牙语的「南方新电视台」(La Nueva Televisora del Sur, TeleSur)，它已经在 2005 年 7 月 24 日开播(Harris & Azzi, 2006, p.4, 14)。

¹¹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BA>，最後讀取 2018 年 6 月 13 日。

表三：ALBA 的 19 项合作领域

石油与能源	交通运输与传播	军事	外债	经济与财政
轻工业与基本工业	天然资源	土地、食物主权与土地改革	教育	大学
科学与技术发展	大众媒介	健康医疗	性别	移民-身份认同
居住条件	人民主体与参与政治	原住民运动	工人运动	

数据源：Harris 与 Azzi (2006, p.4)

关于 TeleSur 的资金构成，说法不一。西方传媒当中，较早报导的《纽约时报》指其创台基金是 2500 万美元，其中 70% 来自委内瑞拉，阿根廷与乌拉圭合起来占了 30%，巴西与古巴仅提供技术协助 (Forero, 2005, May 16)。BBC 记者品特引用了这个说法 (Painter, 2008, p.48)。2006 年 2 月出版的澳洲刊物则访问创台台长、乌拉圭人阿瑞哈尼安 (Aram Aharonian)，他所提供的的数据是，出资国有四个，该电视台的节目有六成是新闻并且是原创，年度营运经费是一千万美元。略晚于该篇的澳洲报导，作者美国教授的长篇文章所引述的四国出资比例是委内瑞拉 51%、阿根廷 20%、古巴 19%，以及乌拉圭的 10%，巴西仍为技术援助 (Artz, 2006)。若是依据 TeleSur 的维基条目，那么，出资的构成是委国 54%、阿根廷 15%、古巴 14%、乌拉圭 7%、玻利维亚 5% 而尼加拉瓜 5%；阿根廷在 2016 年春夏之交退出后，出资国是六个国家，有厄瓜多尔而无阿根廷，但六国出资比例没有述明。¹²

由于资金来自这些国家的政府，外界不免认为 TeleSur 的内容很有可能迎合当政者的需要。有见于此，该台必须宣称自己拥有独立自主的空间。是以，出身记者、已经担任信息与传播部长将近一年的伊撒拉 (Andrés Izarra) 在 TeleSur 开播数日之后，辞去部长职位，专任 TeleSur 主席。TeleSur 试图表明，这个新的电视机构可以汇通「国家」与「社运」两个领域，双方固然不免冲突，却也拥有携手共进的时刻，二者未必总是对立 (VA, 2005, July 27)。该台提高自身公信力的第二个作法是，邀请西方及拉美社会声望良好的人士组成顾问团，成员包括阿根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斯基韦尔 (Adolfo Pérez

¹²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lesur_\(TV_channel\)](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lesur_(TV_channel))，最後讀取 2018 年 6 月 13 日。

Esquivel)、尼加拉瓜解放神学家兼诗人卡迪纳尔 (Ernesto Cardenal)、作品《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译成 20 种语言的乌拉圭记者与作家加莱亚诺 (Eduardo Galeano)、英国《新左评论》编委阿里 (Tariq Ali)、美国纪录片制作人及古巴支持者蓝道 (Saul Landau)、法国世界报 (Le Monde) 海外版主编暨史学者拉莫内特 (Ignacio Ramonet)、阿根廷电影制片人鲍尔 (Tristán Bauer)、美国自由软件先锋史托曼 (Richard Stallman)¹³，以及美国演员暨社会活动家格洛弗 (Danny Glover)。¹⁴

2011 年夏季的报导指出，TeleSur 在北美与拉美 12 个都市，派有 26 位记者，是拉美最大型的通讯网络 (Reardon, 2011, August 4)。至 2013 年初，张建中 (2013, 页 78, 82) 引述的数据指 TeleSur 的记者人数已增加至 160 位。2014 年初的委国反对派暴力示威之后，总统马杜洛等人对于要有英语频道对外发声的重要性，感受深刻，于是加快推动。到了 2015 年 7 月英语频道开播当日，发自迈阿密的美国报导说，其英语总部设在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 (Quito)，不是加拉加斯，当年在经常预算之外，另增经费 1760 万美元，聘用 36 位英语人才产制多媒体内容并与社交网站合作；该报导又说 TeleSur 的记者达 800 人，惟这个数字太高，似乎不太可能，除非是包括不定期的自由撰稿人所供应的内容。编采记者人数的多寡有其意义，他们遵循的报导眼界与立足点也很重要，对此，TeleSur 的国际顾问、每周也在该频道主持【阿里论世界】节目的阿里表示，假使有人说 TeleSur 是「拉丁美洲左派的喉舌，这是虚伪的说法」，因为：

「真实的情况是，全球各个企业财团的传媒是市场体系的喉舌.....

(但是) 没有人指控美国的传播网络是官方宣传体系的喉舌... TeleSur 的英语频道有不同的哲学，并且有不同的世界观...我们不造假、不做作，我们不会刻意剪裁特定内容才让纪录片播放，但西方电视有时却会干出这些勾当。」(Hussain, 2014, August 6)

¹³ 但他在 2011 年 2 月因不接受南方台報導利比亞戰爭的立場，辭去顧問職務，見前註。

¹⁴ 見前註。

伍、「外力介入」以示团结同心：VA

「绝大多数的国际英语传媒持续迎合美国政府及跨国集团所设定的议程，扭曲、漠视并且捏造委内瑞拉的现实情况。Venezuelanalysis.com 与它们对比明显，我们在委内瑞拉站定脚跟，就委内瑞拉遭遇的困顿与进展，提出他处所无的第一手新闻与分析，呈现深度与可靠的说明…这个网站的目标是要报导委内瑞拉的进展，持续提供新闻，同时要将新闻放在脉络中，结合深度分析与背景信息…要为活跃份子、学术工作者、记者。知识分子、不同国度的政策制订者，以及一般大众，提供服务。」¹⁵

「分析委内瑞拉」(Venezuelanalysis.com, VA) 在 2003 年 9 月创办，它是网络原生媒体，「内容」如其自我期许，无论是自行编采与撰写，或是转述其他来源的报导与评论(包括长篇的学术论文)，VA 完全专注在委内瑞拉。因此，相对于间歇、偶尔，但也在若干时刻大量再现委内瑞拉的英语主流传媒(无论是相对守成的美国《福斯电视网》或英国《经济学人》、《每日电讯》、《每日邮报》与《泰晤士报》等，或是自由派的《卫报》、《纽约时报》或 BBC)，VA 呈现的委内瑞拉，其当前与历史面貌，更为丰富、也相对深入，同时提供了与有别于主流传媒的事实、解释与立场。

一、VA 的创办

VA 的主要创办人维尔珀特(Gregory Wilpert)出生在美国，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墨西哥裔美国人。在德国完成高中学业后，他回返美国就读大学。根据他自己的陈述，由于反对美国的拉美政策、也因为母亲的背景，以及他个人对于革命的梦想，维尔珀特较早就开始对拉丁美洲产生了兴趣。完成社会学博士学位不久，他在纽约结识在美国读书的委内瑞拉籍妻子，两人结婚

¹⁵ 参見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donate/appeals/2010>;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bout>

后，双双在 2000 年联袂回到（或说前往）委国。当时，维尔珀特获得富尔布莱特（Fulbright）基金会的资助而在委国中央大学任教。最早的时候，由于查维兹出身军旅，这就使得维尔珀特在内的很多欧美人士都对查维兹存有戒心，无法力挺（Wilpert, 2013, December 4）；即便拉丁美洲在残暴军人执政之外，另有一种值得称道的进步军人阵营（Gott, 2015, March 9），但查维兹是否属于这个传统，毕竟在其执政之初，很多人尚难断定。

维尔珀特的转变大约是在 2001 年底。入住委内瑞拉超过了一年，他亲临其境有了第一手考察与感受，逐渐发现查维兹并非故作姿态。当时，查维兹提出 49 种法律案，包括提高外商缴交委国政府的石油权益金及其分配方式，也包括土地、水利与渔业等等领域的改革。有了崭新体会的维尔珀特认为，新的对抗正在委国进行。果然，到了 2002 年初，查维兹支持度一下子从前一年的 80% 急速下降到了 30%，反对派忧惧他是威权统治者，要不就是社会主义者，或两者都是（Coronil, 2011）。接着就是 4 月的政变，维尔珀特亲身在委，眼见海外英语（及委国的私有）传媒对于玻利瓦尔革命强打猛攻，完全与他亲自经历的直接见闻与认知全然不同。其后，维尔珀特「完完全全重新另有了聚焦」、有了新的看事的角度；先前曾经在萨尔瓦多从事多年群众组织与团结工作的维尔珀特「下定决心要成为全职记者，专为另类传媒报导委内瑞拉。」（Wilpert, 2013, December 4）政变两周之内，维尔珀特接受了 40 次国际传媒访问，有了觉悟，他认为应该挺身「矫正错误的信息」，不应该仅只是在大学授课。有了视角的变化，组织认知与理解的方式也就更为锐利，维尔珀特完成了第一本有关委内瑞拉转型的政治社会学著作（Wilpert 2005）。

委国政变一年多之后的 2003 年 9 月，通过共同朋友的引介，维尔珀特与桑切斯（Martin Sanchez）等人联手创办了 VA，期待通过这个英文网媒「提供左翼社会运动的视野，俾便世人了解玻利瓦尔革命。」（Albert, 2013, March 5）桑切斯本人则在更早一些，亦即在政变之后的一个月，就已经先与同志催生了至今仍然是委国最重要的西班牙文的草根激进网站 aporrea.org。¹⁶

¹⁶ 在 2004 年接受外交官職位後，桑切斯已經離開 aporrea.org，取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porrea.org>，上網日期：2016 年 5 月 27 日。

二、VA 的媒体观

维尔珀特自承，他与友人创办的 VA 信仰「民主社会主义」，它所秉持的新闻观可以分作三点陈述 (Wilpert, 2013, December 4)。首先，客观与平衡固然是新闻编采的重要原则，但西方多数传媒在报导本世纪的委国事件时，很难说已经达到这些标准，重要原因是这些传媒自以为没有立场而只是中立。作为另类传媒的 VA 坦承自己的立场，它的报导并不排斥、也会交待与其歧异或冲突的说法，但 VA 更为接近与传达中下阶层、被排除者，以及草根运动者的言谈、经验及愿景。

其次，即便有其立场，VA 并不认为自己是特定党派的传声筒，VA 坚持必须拥有自主的发言空间。「实存社会主义」或「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政权执政初期所坚持的专政，其正当性随着过渡时期的消逝而褪色；他们的经验显示，传媒即便认同社会主义，但如果没有解释何谓社会主义的空间，势将使得社会主义沦为口号而其内涵空洞化，社会主义的宣称甚至可能会变成特定党派利益的遮羞布。

第三，公权力与传媒结构的最佳关系，不是国家机器消极无为。委国政变当年，哈洛维出版《改变社会不夺权》(Holloway, 2002)，VA 创办后曾就此提出批评 (Alam, 2005, April 15)。其后，维尔珀特似乎以第二本专著《攫取权力改变委内瑞拉》(Wilpert, 2007)，更为鲜明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过，必须注意的是，与其说哈洛维与维尔珀特的立场与认知彻底对立，不如说两本书的考察背景有很大的差别。哈洛维笔下的墨西哥，其社会条件与历史情境与维尔珀特专注的委内瑞拉，截然不同。再者，身为「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者」(open Marxists) 的重要阐述者，哈洛维在《改变社会不夺权》问世八年后，另有《钻裂资本主义》的出版，此时他的立场似乎已经稍有和缓。现在，他认可了委内瑞拉与玻利维亚夺取国家机器作为改造工具的路线；他肯认这个路线的支持者不必然会是国家主义者，而是能够同时从事双重运动的人。这个路线力图夺取国家机器并推动改造，却也同时强调自下而上给予国家压力的必要与重要。不过，我们还得注意的是，哈洛维依旧不忘提醒，重视却又不乏强调自下而上不足以成事，多少让人认为，这个路线的重点仍

是「自上而下」，是要让社运从业者与统治者形成联盟。哈洛维因此认为，双重运动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却终究不免是一种「由上启动」的变革，「终会将运动推向对立的方向，逆流必然出现；即便立意良善，由上启动注定要摧毁迈向自决的动能。」(Holloway, 2010, p. 208) 惟哈洛维这个立场招来批评，论者指他物化了权力 (Ciccariello-Maher, 2013)。

维尔珀特延伸自己的国家观于传媒规范。他认为，西方学界与传媒对于委内瑞拉 2004 年底颁行、并于 2010 年修订的《广播电视社会责任感》(主要是延伸至数字媒体) 的抨击，并不公平，毕竟该法与欧洲常见，出于社会民主理念的传媒法制，并无违背 (Lendman, 2011, March 26)。当然，法律是一回事，执法者适用法律条文的表现是否合理，又是另一回事，维尔珀特认为是委国「政府有太大的裁量空间」，他主张，「裁定传媒是否违反法规的权限，应该要由真正独立的机构拥有比较合适。」

在政变之后，委国出现了更多「小区传媒」，有如雨后春笋，政府给予认可；维尔珀特认为这是正确之举。他更进而指出，不是仅给予执照，政府还应该对这些小区传媒提供合理水平的营运经费或器材。维尔珀特虽然认为「公共媒体」的创设是正确之举，但他不肯轻予名器。比如，新上任、颇有好名声且出身资深记者的人在 2012 年 10 月大选后出任传播部长，表示要推动新的公共传媒系统，¹⁷但他说要观其言察其行 (Carlson, 2013, March 3)。

最后，他又认为，公权力应该努力将所有传媒民主化，包括有效规范各种私有传媒。委国有些查派认为，反对派的极端传媒如 Globovision 应予关闭，维尔珀特并不同意。他说，民主社会主义的「和平与选举」路线，毕竟与武装暴力革命不同，不能强制这类传媒消失。他认为就事论事才是道理，比如，假使传媒力挺法西斯、充斥种族主义或其他歧视言论的程度，构成了依法予以关闭的条件，就可关台；但若尚在法律宽容的范围，即便是反对派的传媒，政府也不能借机生事，不能减少其运作空间。(Albert, 2013, March 5)

¹⁷ 指 Ernesto Villegas，他宣布要成立新系統的公共傳媒，也會讓社區傳媒扮演更大角色。但 2014 年 8 月他已卸任，後轉任首都特區政府首長至 2015 年 5 月，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rnesto_Villegas

陆、没有「人道危机」，有微弱之光：VA（与 TeleSur）的回应

查维兹在 2013 年 3 月辞世，次月总统改选登场而 MUD 败选后，5 月开始出现委国物资短缺的新闻（参见〈表一〉）。2016 年 5 月以后的外电更见严峻，先是《纽约时报》说〈婴儿濒临死亡，没有医疗用品：崩溃中的委内瑞拉医院〉（Casey, 2016, May15）。继之，《华盛顿邮报》先前已有社论呼吁「外力介入」，（Bolton 2016, April 14）现在再以黑白的图说，指称〈委内瑞拉在崩溃边缘的景象让人哀伤〉。（Miroff, 2016, May 25）接着，美国「传统基金会」也加入行列，要求外界设法〈舒缓委内瑞拉的人道危机〉（Quintana, 2016, May 26）。对于委国否认人道危机，因此拒绝海外援助的立场，伦敦「国际特赦组织」的抨击是〈委内瑞拉：顽固的政策加速了势将带来灾难的人道危机〉（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6, June 10）。

可能是观察到了这个舆论气氛，专研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社会与历史的黑特蓝教授，就在 2016 年 5 至 6 月以三周时间，走访委国各地（Hetland, 2016, June 22）。他到都会也前往偏乡，他与穷人长谈也与富人交往，他接触查派也恳谈反对派。通过这些实地考察与亲身体会，黑特蓝提出了后列看法。

首先，食品等物资短缺对于有钱人、中产与中低阶层的影响并不相同；对于生产条件有别的不同地区之住民，也有差异。黑特蓝教授说，「大多数与我交谈的人都对取得药品有些担心，但也都说他们的家人仍然可以获得…通常是通过遍布全国而有时是海外的家族网络」。既然是大多数，也就意味是有些人是有困难，因此就有掠夺新闻的出现。是有愈来愈多的家庭处于「长期饥饿」，但不能说出现了「大量饥馑」。基本物资是有短缺、通货膨胀增加了民生困难；不过，「在加拉加斯，街道人群钻动，地铁继续营运，免费公卫诊所正常在运作」，「特别是在富裕地区的饭店餐厅，根本就是人满为患」，这些也是事实。

黑特蓝说，不仅是美国的前述的纽时…等等报刊，还有美国的公共电台（NPR）、《富比士》（Forbes）、《华尔街日报》等「主流传媒（，都是）持续不断地错误报导，也明显地夸大了危机的严重程度」。夸大与偏颇除了造成

误解，更麻烦的是它们可能另有政治效应，提供了正当性，让海外而特别是在美国主张介入的人，「找到了理由。」何况，有些媒体还不只是提供扭曲的形象，它们都有自以为是的主张，如《华盛顿邮报》公然再三指称委国是「失败的国家」并呼吁「外力介入委内瑞拉」！

然而，黑特蓝提醒这些逾越分寸的传媒。他说，固然有不少委国人「不满领导阶层，也就对政府不再忠诚。」但是，不支持当权者的人「并没有转而力挺反对联盟」；人们甚至会说反对派若是掌权，「就会搞来法西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委内瑞拉的国民知道，「三百万老年人得到了最低薪资的老年年金。查维兹上台时，还不到三十万，且仅有最低薪资的五分之一。所有学童在学校至少都有一次餐点可用，这也不是谎言…医疗保健纵使有百般问题，但所有人都纳入了，街头各个角落你都能找到人讨论政治，对国际局势侃侃而谈…这是政治参与，不须隐藏。」

布鲁斯是《愉港另类方案：直接民主进行中》的编译者，他也是《真正的委内瑞拉：在二十一世纪创造社会主义》的作者（Bruce, 2004, 2008）。布鲁斯后来加入「南方电视台」，他以委内瑞拉特派员的身份针对医疗的实况，连续撰写了两篇长文报导，提供了另一种叙述与观点，该文数日之后另由 VA 转载（Bruce, 2016, June 28; 2016, July 4）。

布鲁斯前往两家医院访问，第一家是佩塔雷（Petare）医院（the Perez de Leon II Hospital），该院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东边，是暴力犯罪最严重的小区之一。布鲁斯意识到「南方电视台」的身份可能会让读者以为，这些报导经过特别的安排，是一种样板。为了减少这个理解方式，布鲁斯说他的访问换了多次时间，出面接待的人也就因为另有公务必须处理，以致临时由他人接受他的访谈。他说，这家医院与中国厂商签订契约，医疗器材与用品的供应与维修并无困难。医院相当清爽，完全没有传媒渲染的血迹四处可见，也没有病人无处栖身而只能四处横躺的场面。有些年轻医生说，这家医院比起其他公立医院，处境好很多（比如，十一张重症医疗病床，仅有三张有病患）。但他们也说，比起军方或社会安全机构的医院，这家首都的小区医院之条件，又没有那么好。若是遇到医疗物资短缺，他们往往通过与其他医院互通有无而舒缓。四间手术室，到访时有两间在开刀。该院护理长说，目前他们一天

平均有 16 次一般手术，10 至 12 次紧急手术，超过一天 24 次的预定目标。她说，真正的问题是免洗床单不够，但医院人员就从手术包附带的 3 张床单节约若干，还算能够维持。医生估计，院方拥有 70-75% 的医疗用品与药物，若能节省使用，大致还能满足需求。

接着，布鲁斯来到委国规模最大的妇科医院（the Concepcion Palacios Maternity Hospital）。相较于先前那家医院，这一家看来确实老旧，也有些败坏。因此，六月初曾有年轻医护人员走上街头，抗议医疗用品不够。有位管理人员，不太想要谈政治，她在举手投足与言谈之间，透露了这位管理员并不支持查派。根据她所提供的证词，过去五年来，建于 1950 年代的这家医院的维修工作并不理想，因此该院的运作没有那么顺畅。比如，她负责照管 60 张病床，但其中仅有 32 张能够使用，不过她也同时强调，医院对病人的照顾并没有中断；该院在 2016 年前四个月所接生的婴儿，比 2015 年同期还多了两成。假使仅比较 2016 年各个月份，则一月接生了一千人，但五月下降至七百人。然而，她也表示这可能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新生儿只是转移至其他医院，而该院也没有新生儿因为欠缺药品而夭折的例子。医疗品的供应不是大问题，接受访问的医护人员说，「我在本院工作已经有三年多，可以诚实地说，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任何一人因为欠缺医疗用品而死亡。」虽然近年来的婴儿死亡率略微增加，但原因不是在医院内发生，是在怀孕前期。这个情况的出现，又可能是一般药房的高血压…等等慢性病药品的供应并不足够，致使孕妇无法实时取得也就无法稳定服用，于是就有较大可能发生流产。避孕药短缺可能使得不想生子却未预期怀孕的人数增加，从而使得婴儿流产的人次上升。委内瑞拉的全国统计显示，从 2007 年开始，婴儿与孕妇死亡率都在增加，其中母亲生产致死的问题比较明显，受访人记得这家医院在 2011 与 2012 年仅有两或三位母亲生产致死，但 2013 年是六人，2014 与 2015 连续两年几乎都是六人的两倍，虽然最后这两年的比例仍然不及 1990 年代的一半。

粮食主权专家史亚佛尼及卡马卡罗 (Schiavoni & Camacaro, 2016, July 11; 另见 Felicien, Schiavoni, & Romero, 2018) 钻研委国食品与农业议题，她们通过「食品至上」(Foodfirst) 组织的网站发表了专文，提供了比较细致的分析。

该组织成立于 1975 年，专注草根小区及社运、累计已经出版 60 余本书籍、完成上百个研究案。史亚佛尼是荷兰海牙「社会研究国际机构」(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博士研究员，关注与研究委国粮议题十多年；卡马卡罗出身委内瑞拉，目前在纽约工作。两位作者说，那么多有关委内瑞拉的负面与夸张的报导，让他们不禁怀疑，难道 2015 年「联合国食物与农业组织」(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 UNFAO) 仍然盛赞、几乎已经根除饥饿的委内瑞拉，会是这付德行？并且，早就有不少当地的「另类传媒」累计了相当多的报导，铺陈该国从事于食物主权的实验，也在改革农业及食品分配系统；这是积极鼓励市民参与食品系统运作的国度。在不到一两年之间，委内瑞拉真会从芳草变成萧艾，陷入人道危机的地步吗？

她们说，2013 年至他们撰写该篇文字之时，委国物资如个人卫生用品(肥皂、卫生纸…等等)的欠缺，确实是从未断绝的新闻。但是，假使仔细考察，就可发现实况是牛奶欠缺，但奶制品如优格…等等却很丰富；咖啡这种基本品欠缺，但茶、热巧克力与其他饮料非常丰沛。何以如此？常见的解释有二。一是物价管制，政府将这些基本物资的价格定得太低，致使生产与分销系统欠缺诱因提供。二是石油价格下跌太多，因此政府欠缺资金进口这些物资。但是，委国经济学教授古席欧 (Pasqualina Curcio) 针对这个现象已有详尽与深入的研究。古席欧指出，这些解释并不全然可信。一是这些市面上大量减少的基本用品，其价格早从 2010 年就是严格管制，并且近来政府已经多次提高价格，按理分销者的诱因已经强化，然而相关物品的供应并没有相随增加。第二，这些短缺现象在 2013 年春夏开始增强，但石油价格下降是 2014 年底以后的事情！古席欧又发现，食品短缺的强度与重要政治时刻(如选举到来之前)，是有关系。那么短缺现象是人为刻意制造出来的吗？相当可能。委国人并非不知情，他们知道委国最大的食品公司、控制 62% 委国人基本食品、也就是玉米粉供应的「保拉集团」(Polar) 的老板，正是反对联盟的重要且知名成员！

另外，委国的蔬菜水果与根茎作物大多可以自给自足，原因是这类产品大多数由小型与中型农家或公司所生产，而它们的分配网络也比较不集中，

分散的销售系统也就难以从单一中心予以操弄。因此这类作物在市面上到处可见，并没有短缺的问题。既然部分食品没有短缺，人们自然就会用以换取短缺的物资；比如，以木薯、马铃薯和大蕉交换玉米粉，面食和其他加工的碳水化合物。两种食品的交流假使仍然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或偏好，数量较少的物资之价格，也就跟随高涨。

食品短缺所造成的冲击是否严重，亦有其他指标可以具体衡量。以最近可以取得的统计为例，2015 年底的委国人均热量消费是一天 3092 卡路里，比委国 2011 年的日均摄取量 3221 卡路里低些，但比起 UNFAO 所定一日 2720 卡路里的基本需求量，仍然较高。最后，两位作者采取了反讽的口吻回应食品短缺的新闻：有人声称委国人因为没有粮食，以致已经开始吃狗，他们说，委国人是在吃「热狗」。本文审查意见之一也提及，墨西哥报纸 *La Jornada* 对于卫生用品缺乏的报导，「提出独到的见解，以黑色幽默方式替委内瑞拉批评美国」。因为食品短缺而引发暴动是孤立的少数事件，并且仅发生在反对派控制的地方，若要藉此指控委国出现「人道危机」，委实太过牵强。

通过这些分析，史亚佛尼与卡马卡罗提醒，人们很有必要「质疑这些传媒的标题」。她们提醒，根据联合国厘定的很多指标，委内瑞拉在本世纪取了值得肯定的进步成绩，包括贫穷与饥饿大量减少，那么，何以这样的国度遭致炮火四射？两位作者说，「答案必有多种，也会相当复杂，并且，也将因为不同的观点与解释，致有差异」。她们希望读者「寻求更多信息，不要仅接受这些新闻报导的表象」。此外，不实言论可能具备潜在的政治作用，她们对此亦有相当的警惕：「为什么传媒刻意与极端扭曲至此？…绘声绘影，把委国情势说得很严重…（加上）反对派所控制的国会叫嚣要罢免总统…美国也在表示要延长经济制裁」。那么，是否委国在野联盟或暗或明地结合美国，试图以「人道危机」的存在，作为口实，以便时机成熟或酝酿机会，就能完成 2014 年 2 月那场 MUD 的激进派所未能完成的「下台」要求？毕竟，从 2014 年开始，美国就以委内瑞拉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将委国列入经济「制裁」的对象。到了 2016 年 4 与 7 月，参议院与众议院再次支持新议案，冻结与委国总统及其高阶官员的资产（Mallett-Outtrim, 2016, July 8）。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更在 2017 年 9 月升高对委国的「经济制裁」。

一方面声称委国出现人道危机，却又同时试图压缩其自行解决困局的空间，美国如果不是言行矛盾 (Harris, 2017, December 29)，就是想要弄假成真，让委国物资困难演成人道危机。

BBC 虽然也是主流传媒，却有一篇报导，足以纠正极端丑化委内瑞拉的新闻。该文由 BBC 驻委内瑞拉特派员拔多 (Daniel Pardo) 撰述。发出该则报导时，他已经在委内瑞拉居住三年。据拔多的见闻，他认为有关委国是个饥荒之国，是个身家不安全而表意自由备受压抑之说，根本就是一种「迷思」。拔多说，尽管是有不少人吃得不好，但「没有普遍存在的饥荒这回事」，联合国对饥荒的定义是营养不良超过 30%，致死率 10 万人每天有 2 人，但委国近一年的营养不良比率，最悲观的估计是 20-25%，100 万人为此殒命者不到 1 人。然而，BBC 等主流传媒刊登拔多这类说法的报导，数量可能不多，如果不是凤毛麟角的话；同时，我们也得注意，拔多的报导刊登在 BBC 的西班牙文网站，¹⁸若非该文得到英文翻译 (Hasse, 2016, July 22) 并且得到 VA 的转载，知悉这个面向的人还会更少一些。

相较于 BBC 的拔多的见证，积极反查维兹派的《经济学人》之报导，假使倒过来读，似乎也是另一种证词，能够用来反驳人道危机的污名。该刊在 2016 年 9、10 月报导，指该国民众平均一个月得花 35 小时排队才能买到日常饮食所需。原本，这是负面新闻，但若逆向解释，是否可以说明委国物资固然短缺，但平均每日排队一个小时仍可取得，因此，怎么会是人道危机？《经济学人》又说，尽管存在这些困难，委国的物资配送效率，是有尚称明显的改进 (Economist 2016, September 17: 56; 2016, October 1:44-45)。2017 年底，UNFAO 以及「拉美与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联袂派遣专员前往委国考察，事后他们联合发表声明，指认食品短缺与分送迟延的现象，但同时明确表示这不是人道危机；他们说弄清楚短缺的原因，并要对付盗卖 / 囤积 / 腐败与货币操弄……等问题，才是重点，主流媒体以戏剧化方式，加重丑化短缺的现象，实属「于事无补」。(Boothroyd Rojas, 2017, December 6)

反驳主流传媒，表明没有人道危机之外，刊登或转载于 VA 的报导也有

¹⁸ <http://www.bbc.com/mundo/noticias-america-latina-36837574>

相当积极的态度，他们希望当前的委国会是「祸兮福所倚」的前奏。

因此，委内瑞拉政府在全国各地广设「就地配置与生产委员会」(the Local Provisioning and Production Committees, CLAPs) 的措施，备受史亚佛尼以及卡马卡罗的肯定。她们指出，这是草根组织与政府协作的新方式，在相当范围内舒缓了基本物质的供输压力。CLAPs 成立之时（2016 年初）是以全民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为主，第一年达到 200 万户家庭，至 2018 年初全国有 3 万个 CLAPs 分配点，每袋食品 12 至 15 公斤，以补贴价格出售，2018 年底预计可以配送至四分之三人口，也就是六百万家庭。除了配送，半数 CLAPs 也直接涉入食品生产 (Felicien, Schiavoni, & Romero, 2018)。他们也看到有很多社会运动者都很努力，试图化危机为转机，追求「粮食主权」的落实。物资短缺意外地提供了新的刺激，委内瑞拉开始有了较多的有机农业、禁止基因改造食品、农园耕作产品的交流与展示愈来愈多，「人民面对面」也让城乡有了更多的直接接触与互动，愈来愈多的人「史无前例地投入于农业」，从中人们取得了更多的新鲜食材。

黑特蓝教授也希望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他说委内瑞拉已经透露「希望的微光」，农产短缺促使更多人利用前庭后院植栽自家使用的蔬果，大家动手动脚、「种东种西」。小区生产与分配组织也更有效地动了起来，人们努力矫正官僚的腐败。「具有批判力的查派」运动在委国更见活力，他们提出「非常多样、独特的想法」(Hetland, 2016. June 22)。委国必须走出依靠天然物资（石油等）的寻租经济模式，这是委内瑞拉必须严正面对的根本大计 (Prieto & Lander, 2016, September 29)。医疗人员对于委国革命的进程也提出尖锐的批判，他们说，查派掌权十七年，号称要迈向社会主义，却仍然存在以「大量政府预算支付公职人员的私人医疗保险，这等于是补助私人医院，」相当荒谬 (Bruce, 2016, July 4)。

皮尔森在 2008 年加入 VA，近日着有小说《蝴蝶监狱》，「引领读者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接触边陲民众的真实生活与梦想」(Pearson, 2015)。她说，「委内瑞拉的食物短缺、通货膨胀与排队购物已经三年，冲击几百万地区综合体运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但是，对于右派，他们敬谢不敏…甚至也对马杜洛政府敬谢不敏，他们在这些艰辛处境下日趋强大，取得了更好的组织效

能。」她也说都会农园在这个背景下，有了明显增长，五年前几乎没有人好好利用居家附近的绿地，如今单在她访谈者居住区的周遭，就有五百人！这些都是具体的活动，「没有那么抽象」。先前，这些组织大多「聚焦在文化事件或修桥补路…现在，很多地区都在努力，他们试着要生产自己需要的半数蔬果，另一半才向乡村生产者采购。」(Pearson, 2016, July 4; 2016, October 27)

柒、结语：「谎言行走天下，真相还在系鞋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军事政权在拉丁美洲执政数十载，包括在 1973 年发生血腥政变，举世第一个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智利遭致推翻。1989 年，委内瑞拉首都爆发拉美近代史最大的民变，十年后查维兹运势奋进，出任委国总统，并在 2005 年宣扬该国努力以赴的方向是「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开启也强化了拉美粉红色浪潮的声浪，反击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领导及霸权。(Chodor, 2015)

查维兹在 2013 年去世，原已频繁负面再现委内瑞拉情势的海内外主流传媒，进而不断散播委国已有「人道危机」的新闻，并将罪责归咎于社会主义路线。

不过，根据 VA 与 TeleSur 等另类传媒所提供的分析，2014 年底石油价格大跌以来，委国的经济是有困顿，但不是人道危机、成因不是委国推动社会主义路线，反而是其推进无力寡方，是四个互有关连的内外因素所造成。

一是，查维兹是民选产生，不是武装革命政权，他所继承的国家机器仅是上层的调整，无法大刀阔斧改变，窠臼如旧有的腐化贪污或失能，改善的幅度也就有限。二是支持查维兹的力量迟至 2008 年才整编为「社会主义综合党」，来源不同的成员未必对社会主义的信念阳奉阴违，惟其各个派别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及信守水平的高低，谅有差异，并且这个新的政党会是偏向科层主导或是重视分权以让基层有较大的培力经验，很可能因为组织新立而有更大的摩擦。三是查维兹无法也不肯以暴力手段没入生产工具，委国经济遂有仍有八、九成仍是私有产业构成，其中不乏拒斥查维兹路线的工商行号伺机与政治反对者共鸣而发为传媒战争、经济战争，查维兹即便推动拉美「最

称野心勃勃的土地与农业改革」，也在地主抗拒下成效有限，致使「农民倍感挫折」，(Wilpert, 2006) 地主甚至雇人杀戮农民，累计已达两百多人。(Hetland, 2016, September 11) 最后是委国的传统菁英外有美国撑腰。华府对于拉美左倾政权并不友善，1954 年危地马拉政府因土地改革遭到颠覆，其后的智利、海地 (2004) 与洪都拉斯 (2009)，都是美国改变他国政权的往届例，查维兹曾在 2002 年挺过美国默许的政变，继任已逾五载的马杜洛能否坐满任期，变量之一就在美国因素：美利坚改变政权的战略数十年如常，先祭经济制裁、大力支持反对派，想方设法让政权不稳定、人民怨怼、社会混乱以便正当化军事政变或美国的军事介入。(Leech, 2018)

就此来说，纽约出生而从 1977 年起任教委内瑞拉，传授经济史与政治学的耶拿教授，评价显得中肯：「委内瑞拉站在先锋位置，试图在尖锐两极化及冲突的脉络中，以民主手段建构社会主义，历经相当长的时间，几乎已有十八年，这段历史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再无匹配。」(Ellner & Koerner, 2016, October 17) 分析查维兹何以能在委国崛起的最佳著作《委内瑞拉政治改革的失灵》(Buxton, 2001)，其作者英国教授巴塞顿在十五年后，对于查维兹本世纪开启的委国经验，选择凸显委国底层人民的主体自觉与能力已在强化，这是「历史第一次。大众阶级如今更为意识到他们的权利及他们的潜在力量，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现象。人们不再认为这些权利是奇里斯马的领袖自上而下所赋予……。」(Buxton, 2016, p.25)

本文所介绍与阐述的 VA 及 TeleSur 之报导与观点，以及耶拿与巴塞顿教授的证词及其认知框架，无缘进入主流传媒；〈表一〉列举的「新闻」标题及其英语版本的内容，却是传遍了世界。两相对照，便是「谎言行走天下过半，真相系着鞋带未发」这句谚语的生动脚注。

参考书目

- 林蔼云、叶荫聪 (2011)。〈香港篇：情感动员的新一页〉，叶荫聪 (编)，《草根起义：从虚拟到真实》，页 57-93。香港：上书局。
- 林蔼云、叶荫聪 (编) (2009)。《草根不尽：华语地区独立媒体年报 2008/09》。

- 香港：独立媒体。
- 邱林川（2013）。《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张志华（2013）。〈拉美南方电视：别样的国际传播〉，《新闻大学》，119: 48-53
- 张建中（2013）。〈拉美的声音：从战略传播视角看南方电视台的崛起〉，《中国电视》，1: 78-82。
- 曹晋（2015）。《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梁家权（2015）〈香港:政治高压, 百变丛生〉, 管中祥(编), 《光影游击最前线》, 页 155-18。台北：红桌文化。
- 陈世宏（2016）。《冲撞与凝聚：绿色小组口述访谈集》。远景。
- 冯建三（2009）。〈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另类媒介：以南韩与委内瑞拉为例〉，《国际新闻界》，25: 11-15。
- 冯建三（2014a）。〈政府涉入型对外卫星电视与 NWICO〉，《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78: 160-167。
- 冯建三（2014b）。〈传播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委内瑞拉承先启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97: 1-62。
- 冯建三（2017a）。〈制宪会议是契机：还未绝望，委内瑞拉或许真会「变天」〉。
取自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2627873
- 冯建三（2017b）。〈「人权观察组织」对委内瑞拉的认知误导〉。取自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2643726
- 冯建三（即将出版）。〈谜、冤屈与进步：委内瑞拉，兼谈《经济学人》〉，《思想》。
- 叶荫聪（2009）〈香港篇:新政治力量〉, 林蔼云、叶荫聪(编), 《草根不尽：华语地区独立媒体年报 2008/09》，页 47-68。香港：独立媒体。
- 叶荫聪（2015）〈序二：媒体就是社会与政治〉, 管中祥(编), 《光影游击最前线》，页 20-23。台北：红桌文化。
- 叶荫聪（编）（2011）。《草根起义：从虚拟到真实》。香港：上书局。
- 管中祥（2009）〈台湾篇:从地下冒起的抗衡力〉, 林蔼云、叶荫聪(编), 《草根不尽：华语地区独立媒体年报 2008/09》，页 95-116。香港：独立媒体。
- 管中祥（2015）〈台湾：百花齐放, 暗藏危机〉, 管中祥(编), 《光影游击最前线》，, 页 99-131。台北：红桌文化。
- 管中祥（编）（2015）。《光影游击最前线》。台北：红桌文化。
- 赵鼎新（2017）。《合法性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 Abalo, E. (2014). Constructing (II) legitimate democracy: Populism and power concentration in newspaper discourse on Venezuela.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12(2), 802-821.
- Alam, M. J. (2005, April 15). Taking Power Seriously: John Holloway and the Venezuelan

- Strategy.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069>
- Albert, M. (2013, March 5). Tackling Institutions One By One: An Interview With Gregory Wilpert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zcomm.org/znetarticle/tackling-institutions-one-by-one-by-gregory-wilpert/>
-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6, June 10) Venezuela: Stubborn politics accelerate catastrophic humanitarian crisi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6/06/venezuela-stubborn-politics-accelerate-catastrophic-humanitarian-crisis/>
- Artz, L. (2006). TeleSur (television of the south): Discarding contraflow for horizont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al Politics*, 2(2), 225-231.
- Artz, L. (2012). 21st century socialism: Making a state for revolution.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10(2), 537-554.(冯建三译[2016]。〈21 世纪社会主义：打造国家 推进革命〉，传播译站工作坊（译校），《马克思归来》，页 754-786。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Artz, L.(Ed.).(2017).*The pink tide: Media acces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in America*.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 BBC (2014, May 29).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pproves Venezuela sanctions. From <https://www.bbc.com/news/world-latin-america-27615148>
- Block, Elena. (2015).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leadership: Mimetisation, Hugo Chávez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and identi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 Bolton, P. (2016, April 14). The Washington Post reaches new low in calls for political intervention in Venezuela.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www.coha.org/the-washington-post-reaches-new-low-in-calls-for-political-intervention-in-venezuela/>
- Boothroyd Rojas, R. (2017, December 6) UN expert: No humanitarian crisis in Venezuela.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news/13533>
- Bruce, I.(2004/translated and edited).*The Porto Alegre alternative: Direct democracy in action*. London, UK: Pluto
- Bruce, I.(2008). *The real Venezuela: Making soc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UK: Pluto.
- Bruce,I.(2016, June 28). Venezuela's hospitals: "Problems are opportunitie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www.TeleSurtv.net/english/news/Are-More-Babies-Dying-in-Venezuela-20160704-0022.html>
- Bruce,I. (2016, July 4) Are More Babies Dying in Venezuela?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www.TeleSurtv.net/english/news/Are-More-Babies-Dying-in-Venezuela-20160704-0022.html>
- Burbach, R. (2001). *Globalization and postmodern politics: From zapatistas to high-tech robber barons*. London, UK: Pluto Press.
- Burbach, R., Fox, M., & Fuente, F. (2013). *Latin America's turbulent transitions: The future of twenty-first century socialism*. London, UK: Zed Books.
- Buxton, J.(2001).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reform in Venezuela*. Ashgate Publishing.
- Buxton, J.(2016). Venezuela after Chávez. *New Left Review*, 99(May-June), 5-25.
- Carlson, C. (2013, March 3) Venezuela launches new integrated media system. Retrieved

-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news/8007>
- Casey, I. (2016, May15). Dying Infants and No Medicine: Inside Venezuela's Failing Hospital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www.nytimes.com/2016/05/16/world/americas/dying-infants-and-no-medicine-inside-venezuelas-failing-hospitals.html
- Chodor, T. (2015). Neoliberal hegemony and the pink tide in Latin America breaking up with T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Ciccariello-Maher, G., & Sapiezynska, E. (2017). Venezuela: freedom of expression, public access, and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Artz, L.(Ed.).(2017).*The pink tide: Media acces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in America*(pp.49-62).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 Ciccariello-Maher, G.(2013). *We create Chavez*.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ole, M. (2014).The alternative school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al development, Barrio Pueblo Nuevo, Mérida, Venezuela. *Constructing twenty-first century socialism in Latin America* (pp. 97-115).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Coronil, F.(2011).Venezuela's wounded Bodies: Nation and imagination during the 2002 coup. *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 44(1), 33-39.
- Economist (2012, October 13) 'Stuck with him; Venezuela's presidential election', pp.45-46.
- Economist (2016, September 17) 'Multinationals in Venezuela, stay or go', p.56.
- Economist (2016, October 1) 'Venezuela: the angry 80%', pp.44-45.
- Ellner, S. (2014, June 18). Protest and destabilization in Venezuela: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violent and non-violent right is smaller than you may think.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0752>
- Ellner, S., & Koerner, L. (2016, October 17) Part II: Is the Bolivarian Revolution a Populist Failure?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2723>
- Felicien, A., Schiavoni, C., & Romero, L. (2018).The politics of food in Venezuela. *Monthly Review*, June, 1-15.
- Fernandes,S. (2010). *Barrio-based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Who can stop the drums?: Urban social movements in Chávez's Venezuela* (pp.160-211).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Fernandes,S. (2011). Radio Bemba in an age of electronic media: The dynamics of popular communication in Chavez's Venezuela. In D. Smilde & D, Hellinger (Eds.), *Venezuela's Bolivarian democracy: Participation, politics, and culture under Chávez* (pp. 131-156).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Forero, J. (2005, May 16). And now, the news in Latin America's view. *The New York Times*.From http://www.nytimes.com/2005/05/16/world/americas/and-now-the-news-in-latin-americas-view.html?_r=1
- Gott, R. (2015, March 9).Hugo Chavez and leftist soldiers in 20th century Latin America.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www.TeleSurtv.net/english/opinion/Hugo-Chavez-and-Leftist-Soldiers-in-20th-Century-Latin-America-20150305-0001.html>

- Guerrero, M., & Márquez-Ramírez, M. (2014). *Media systems and communication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Guillén, D. (2017). Societies in movement vs. institutional continuities? Insights from the Zapatista experienc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44 (4), 114-138.
- Harris, D., & Azzi, D. (2006). *ALBA - Venezuela's answer to "free trade": The Bolivarian alternative for the Americas* (Occasional Paper No. 3). Bangkok, Thailand: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www.focusweb.org/pdf/alba-book.pdf>
- Harris, R. (2017, December 29). Lamenting Venezuela's "Humanitarian Crisis" While Blocking Its Resolution.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17/12/29/lamenting-venezuelas-humanitarian-crisis-while-blocking-its-resolution/>
- Hasse, J. (2016, July 22). Debunking myths about the crisis in Venezuela: An insider's perspective.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www.benzinga.com/news/16/07/8248756/debunking-myths-about-the-crisis-in-venezuela-an-insiders-perspective>
- Hayden, T. (2015). *Listen Yankee: Why Cuba matters*. New York, NY: Seven Stories Press. (冯建三译[2016]。《听好了，古巴很重要》。台北：联经)
- Hetland, G. (2016, June 22). How severe is Venezuela's crisi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how-severe-is-venezuelas-crisis/>
- Hetland, G. (2016, September 11). A history of violence.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6/09/venezuela-opposition-maduro-chavez-coup-protests/>
- Hintz, A. (2016). Policy hacking: Citizen-based policymaking and media reform. In D. Freedman, J. Obar, C. Martens & R. W. McChesney (Eds.), *Strategies for media refor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p. 223-238). New York, N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Holloway, J. (2002).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The meaning of revolution today*. London, UK: Pluto Press.
- Holloway, J. (2010). *Crack capitalism*. London, UK: Pluto.
- Hussain, S. (2014, August 6) Tariq Ali on the launch of TeleSur English, the largest Latin American news channel.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1680-tariq-ali-on-the-launch-of-TeleSur-english-the-largest-latin-american-news-channel>
- Jones, B. (2007). *Hugo!: The Hugo Chavez story from mud hut to perpetual revolution*. Hanover, NH: Steerforth Press.
- Koerner, L. (2017) Authoritarianism in Venezuela? A Reply to Gabriel Hetland, May 19.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3136>
- Laovato, R. (2015, July 27). The making of Leopoldo López. *Foreign Policy*. From <http://foreignpolicy.com/2015/07/27/the-making-of-leopoldo-lopez-democratic-venezuela-opposition/>
- Lee, C.C. (2015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ritical reflections and a new point of departure. In C.C. Lee (Ed.),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 Communication*” (pp.1-28).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 Lee, C.C.(2015b).Local experiences, cosmopolitan theories: On cultural relevance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C. Lee (Ed.),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p.210-224).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 Leech, Garry (2018, November 23) Business as usual: Washington’s regime change strategy in Venezuela. from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18/11/23/business-as-usual-washingtons-regime-change-strategy-in-venezuela/>
- Lendman, S.(2011, March 26) Venezuela's new social responsibility law. from <http://mwcnews.net/focus/politics/9534-venezuelas-new-social-responsibility-law.html>
- Main, A. (2014, February 24).True colors of Venezuelan student movement apparent in Feb. 22nd release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cepr.net/blogs/the-americas-blog/true-colors-of-venezuelan-student-movement-apparent-in-feb-22nd-releases>.
- Mallett-Outtrim, R. (2016, July8). US congress passes new sanctions against Venezuela.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venezuelanalysis.com/news/12074>
- Martens, C., Reina, O., & Vivares, E. (2016). Legislating for a more participatory media system: Reform strategies in South America. In D. Freedman, J. Obar, C. Martens & R. W. McChesney (Eds.), *Strategies for media refor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p. 268-280). New York, N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Martens, C., Vivares, E., & McChesney, R. W. (Eds.). (2014).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power in South America*.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Martinez, C., Michael F., & Farrell, J. (2010). *Venezuela speaks! Voices from the grassroots*. Oakland, CA: PM Press.
- Miroff, Nick (2016, May 25) Harrowing scenes of Venezuela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in-sight/wp/2016/05/25/venezuela-is-running-on-empty/>
- Mosco, V.(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2nd). LA: Sage.
- Painter, J. (2008). *Counter-hegemonic news: A case study of Al-Jazeera English and TeleSur*. Oxford, UK: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 Pearson, T.(2015). *The butterfly prison*. Open Books.
- Pearson, T.(2016, October 27)Venezuela’s communes form the front line of a Difficult revolutionary struggle.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greenleft.org.au/content/venezuela%E2%80%99s-communes-form-front-line-difficult-revolutionary-struggle>
- Pearson, T.(2016, July 4) In Venezuela’s difficult times the grassroots are stronger.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newint.org/features/web-exclusive/2016/07/04/in-venezuelas-difficult-times-the-grassroots-are-stronger/>
- Prieto, H., & Lander, E. (2016, September 29). Edgardo Lander: Venezuela must face its civilizational crisi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2702>

- Quintana, A.R. (2016, May 26). Alleviating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in Venezuela. *Issue Brief*, No. 4569.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6/05/alleviating-the-humanitarian-crisis-in-venezuela>
- Reardon, J. (2011, August 4). Latin America's TeleSur now available to U.S. viewer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news/6405>
- Reuters (2014, December 19) Obama signs U.S. sanctions law on Venezuela official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venezuela-sanctions/obama-signs-u-s-sanctions-law-on-venezuela-officials-idUSKBN0JW2JF20141218>
- Ripley, C. (2017) Venezuela, violence, and the New York Times: failing when it comes to selective indignation.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www.coha.org/venezuela-violence-and-the-new-york-times-failing-when-it-comes-to-selective-indignation/>
- Roa, L. B. (2014, May 22) *John Kerry, the internet,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Venezuela*. (Z.C. Dutka 在 2014 年 5 月 22 日译为英文, 取自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0697>, 《共志》四日后译为中文〈美国国务卿、网络, 与委内瑞拉的表意自由〉, 取自 <http://commagazine.twmedia.org/?p=2027>)
- Robertson, E. (2014, April 5). Where is Venezuela's political violence coming from? A complete list of fatalities from the disturbance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0580>
- Salas, M. T. (2015). *Venezuela: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las, M. T. (2017). Venezuela: La Mancha del Petróleo. *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 49(4): 416-420
- Schiavoni, C., & Camacar, W. (2016, July 11). *Special report: Hunger in Venezuela? A look beyond the spin*. From <https://foodfirst.org/special-report-hunger-in-venezuela-a-look-beyond-the-spin/>
- VA (Venezuelanalysis.com). (2005, July 27). Venezuela's information minister resigns in favor of TeleSur post.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news/1261>
- VA (Venezuelanalysis.com). (2014, May 28)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gnores Latin American consensus, passes sanctions against Venezuela.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4QM>
- Velasco, A. (2015). *Barrio rising: Urban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Venezue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yne, M., & O'neill, D. (2011). Form, politics, and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take,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 and listen to Venezuela. In J. Kapur, & K. B. Wanger (Eds.),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cinema: capital, culture, and Marxist critique* (pp. 113-134). New York, NY: Routledge.
- Wilpert, G. (2005). *The rise and fall of Hugo Chavez: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Venezuela*. London, UK: Zed Books.
- Wilpert, G. (2006) 'Land for People Not for Profit in Venezuela', pp.249-264, in *Promised*

- land : competing visions of agrarian reform*, edited by Peter Rosset, Raj Patel, and Michael Courville. Food First Books, Oakland, California.
- Wilpert, G.(2007). *Changing Venezuela by taking power: The history and policies of the Chavez government*. London, UK: Verso.
- Wilpert, G.(2013, December 4) Venezuelanalysis: 10 years reporting on the Bolivarian revolution.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0215>
- Yin, S.(2018). Alternative forms of media, ICTs, and underprivileged groups in Chin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From <https://doi.org/10.1177/0163443718754653>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in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 Venezuela’s English alternative media and their responses to the main stream journalism

Chiensan Feng*

ABSTRACT

By proclaiming “the Twenty-First-Century Socialism” as the framework guiding the nation, Venezuela has launched herself into a new age. During the past decade and more, Venezuela has yet developed into a socialist construct, far from it, nonetheless there are commendable achievements that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Rather than delivering a fair presentation of Venezuela’s ‘socialist’ government, her traditional and therefore still dominant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have at best neglected Venezuela’s positive improvement over the years, they normally portray her drawbacks at an expanded scale to reach a distorted and scandalized picture of this Bolivarian revolution. Responding to these unjust treatments of the country, the Venezuela’s government takes the lead and launches the Spanish trans-border TeleSur TV channel with othe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followed later by an English version, while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s and activists have on their own set up ‘Venezuelanalysis.com’ as another alternative English outlet reporting, compiling and circulating recent Venezuela’s news and academic writings analyzed and interpreted within a historical context. As such they have become indispensable sources that people must consult, should they wish to be informed about or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s of Venezuela.

Keywords: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news distortion, TeleSur, Venezuela,
Venezuelanalysis.com

* Chiensan Feng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jsfeng@nccu.edu.tw

社会运动与新认同： 社群媒介与创意社群之分析

许传阳*

本文引用格式

许传阳 (2018)。〈社会运动与新认同：社群媒介与创意社群之分析〉，《传播、文化与政治》，8:141-164。

投稿日期：2017 年 7 月 6 日；通过日期：2017 年 10 月 25 日。

*作者许传阳为淡江大学大众传播系副教授，e-mail: 093663@mail.tku.edu.tw。

《摘要》

社群媒介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动员的工具，它被使用于不同目的的社会运动，计算机网络的网站可能被用来刊登社运团体的宣示，而脸书的粉丝专业可以被使用来与支持者对话，但是这种网络社会行动与实体的社会行动之关系，是当今传播与社会学者关心的重点。进一步而言，以创意为主要形态的社会运动能否创造出新式的社会参与，也是关心社群网络发展之学者所欲探索的问题。

本文主要在于探讨社会运动与创意社群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将侧重于社群组构形式之探讨。文章第一部分着重于理论架构的探讨，笔者拟出一社会沟通的概念架构，此一架构着重于日常生活社会行动的讨论，最后研究者试图以此一架构，研究台湾的网络社会运动与创意社群的关系。

本文认为创意社群在于建构行动者的场域，在此一场域中行动者的组织较完整，因此创意社群的视觉符号对社会沟通的能力，主要是成立一个对话空间，以建立意识的边界。

关键词：社群媒介、创意社群、沟通、信息

壹、前言

本研究关注的是创意社群的构成，此是文化运动 + 的一个环节，在文化产业背景之下，本文以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运动为例，分析视觉符号与创意社群之间的关系，是本文欲探讨之重点。因着社群媒介 (social media) 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动员的工具，它被使用于不同目的的社会运动，计算机网络的网站可能被用来刊登社运团体的宣示，而电子邮件的信箱可以被使用来招募新的支持者。这种网络社会动员与社会行动的关系，是当今传播与社会学者关心的重点 (Soukup, 2006)。进一步而言，以信息传播为主要形态的网络社会运动能否创造出新式的沟通模式，也是关心社群 (community) 发展所极欲探索的课题。

不同于政治传播的议题建构研究取向，本文关注视觉符号的动员形式：在日常生活语言与传播背景之下对创意社群 (creative community) 的源起进行讨论。本研究将侧重于网络符号动员的组织形式探讨，文章第一部分主要在于理论架构，内容将着重在社会运动与组织的关系；第二部分则分析网络传播科技应用于社会运动的实证发现。从这些研究，笔者拟出一信息运动的概念架构，此一架构着重于创意社群的组织形式与行动目的的讨论，最后研究者试图以此架构，研究台湾的网络社会运动之一：反媒体垄断运动之脸书网站，以便理解创意社群的形态。本文认为新社会运动的视觉符号建构了场域空间，成为一个文化的创意社群 (Bourdieu, 1991)。

研究发现也指出，虚拟动员的目的主要在于建立认同 (identity) 的空间，此认同的建立是社群的基础，动员的目的不在于颠覆运动所欲改善之对象，相反地，以创意进行的网运其目的在于形成日常生活的空间，而此社群的成立需视社运过程中，社运符号如何被普及并被社运成员赋予意义。例如本研究中发现，保护民众传播权的议题在台湾的媒介运动中，便具有意义建构的功能。

贰、文献探讨

一、文化与社群

涂尔干的研究中文化是建立此一社群架构之根本介质而当代社会中的媒介现象则是很重要的观察基点。因此，在当代社会的背景下，社群是持续地被筑基于文化想象（imaginaries）之上，但是因着不同文化文类的交流，文化上的想象是不可能被限制于一个地域疆界之中的，准此，跨界文化想象与微型社会的兴起，其中的接合与混生，便成为探讨未来文化想象的新基点此为社群所指称之意义。

从积极面来看，想象是足以构成新的社会形态的，它是一种生产体系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一种传播媒介（如展示内容）以及人类语言的多样性，这三种因素之间属于半偶然，但却是可以相互作用而组成的新生产模式。

文化运动是指以社群感（sense of belonging）为生产基础的行动，David Hesmondhalgh（2002）以较为局限的方式，以归纳出文化产业，表示认为文化的定义为「社会秩序沟通、再制、体验及探索的表意系统（signifying system）」，而文化产业常被认为是社会意义产制（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meaning）直接相关的机制（包括以获利为导向的公司、国家组织、非营利组织），因此几乎所有文化产业的定义都是将电视、广播、新媒介…等纳入其范围，而这些事业主要的目标便是与阅听人沟通，以创造各种文本。他进一步说明，广义而言，所有文化制品都是文本，可任人加以解读。他也提及了文本主要是为了引起心智反应，充满丰富的表征意涵，藉此达成沟通的目标，而功能性的目标在此则不是重点（Hesmondhalgh, 2002；引自廖佩君译，2009）。以网络为平台所进行的创意运动便成为文化的运动（cultural move）。

二、社会运动与沟通

本文所指的社会运动是指跨越信息平台的文化生产活动，在讨论社会运动与社会建构关系之前，笔者拟先就新社会运动的范畴加以定义。

「新」、「旧」社会运动的差别主要在于组织运动目标及组成上不同，从相关实证研究发现，传统的社会运动组织较着重于组织目标的达成，诸如工会运动或 1960 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 (civil right movements)，传统的社会运动较着重于组织者 (organizer) 在实践社会运动时的积极角色。诚如研究者 Freeman (1998) 的研究指出，「美国六十年代的黑人人权运动是极为全面性的，表面上是马丁路德金恩主导了阿拉班马州蒙哥马利市的抵制公交车事件，因此得到媒体广泛的报导，但真正的组织者却是 E.D. Nixon」(p.451)。基本上，就资源动员论者的观点而言，传统社会运动的目标在于透过组织的动员以积极地实现社运组织所设定的目标。诚如 Mayer 与 Roth (1995) 所指出，透过组织的动员，传统的社会运动关切的是组织的内部发展、动员资源的能力以及对决策单位的压力以取得协商的空间，至于其所欲传达的意识形态或集体认同，较非传统社运组织者所关心的地方。

由于社会运动的变迁，组织此一资源动员论的基础概念，已经无法有效解释社会运动的多样性及动员形式。一方面是因社会运动的进展日趋全球化，Peteet (2000) 的研究指出，全球分布式 (diasporic) 的离散文化已然成为巴勒斯坦反抗运动的运动组织特质，他指出「因着其多层面的地理及文化的离散，全球分散的反抗运动已经提升了巴勒斯坦反抗运动的跨国认同，巴勒斯坦人也因而在此一基础下寻求更大的结盟」(p.185)。因而一种去中心化的社会运动组织形式已隱然成形，传统的社会运动论者强调社运组织在政治动员过程中的重要角色，但新社会运动 (new social movement) 理论的提出，已经对日益复杂的社会运动现象提出新的见解。

新社会运动理论的见解主要视社会运动的目标在于文化认同面向的定义或澄清而非政治面的实现与对抗。跨社会运动源于 60 年代的欧洲学生运动，新社运不同于传统社会运动的组织资源理论，跨社会运动者可以运用的资源事实上是媒体，亦即社会运动不再大量地依赖组织作为动员的基础。

相对于传统社会运动，新社运在定义上，英国社会学家 Giddens 总括视为一种「生活领域的政治」(life politics) (Bagguley,1999)。Giddens 主张跨社会运动可以被视作为一种对既有社会现象及行为的刺激，此一互动过程所

欲产生的政治意向是公众或社会行动者与既存社会体系进行对话的日常生活社群性之所在。

三、创意社群

大多的研究还是将信息视为一种物质的基础，而后再去探讨网络信息对于社会运动的影响，较少从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s）的观点去理解网络信息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因此接下来本文将探讨网络空间与创意社群之关系。

因特网应用于社会运动的领域被视为是一种新形态的创意抗争形式，从提供一些网站的连结到连系社会共同文化旨趣的团体，因特网在传散信息的功能上都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虚拟社会运动也促使一些社会运动学者重新思考社会运动的动员形式。首先，由于主流商业媒体的全面掌控，社会运动团体极欲建立本身的发声管道，在一个海外印度留学生社群的研究中，Mitra（2001）指出，因特网的使用并非意味着支配团体与被支配者之间的统治关系将被重新安排，而是网络使被控制团体不为支配阶级「系统性」地消音，网络也因而成为社运组织的发声管道（p.46）。

一项民族志分析（ethnographic analysis）的研究也指出，网络的使用有效地扩张了生活世界（life-world），网络所构成的世界可被规划为一公共领域，此一领域将可对立于是早被政治与商业力量侵入的领域，一如 Bakardjieva 及 Smith（2001）提出，欠缺民主启蒙上的对策，失去言论自由环境的网域空间，将迫使公民沦落于全面的消费洪流之中而无法自停，此一消费领域是充斥着政治或经济势力上的欺瞒（p.81）。

除了网络在社会运动组织的应用之外，网络也被使用于文化领域相关的运动之中，网络使得有共同旨趣的民众得以相互连系而摆脱地域或族群上的偏见，在菲律宾，一个知名的网络社群 Cyber Barangay 应用了次文化的概念统合了已经分散各处的群众。菲律宾学者 Sy（2001）指出，利用篮球比赛，信息科技已经重新建立了菲国的国族感，此一想象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ies）过去早被地方山头主义或族群忠诚感所侵蚀（p.301）；除此虚

拟社区的成立之外，公民运动组织也应用网络来为公众建立议题，此一方式有可能以一种文化传播（cultural communication）来取代代议政制度（Coleman, 1999）。

Washbourne (2001) 认为，透过水平式的传播形态，因特网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运动，就唤起公众对公共议题的知晓而言，虚拟动员所使用的传播方式是不同于传统社会运动的。Washbourne 主张用跨地方性（trans-localism）来理解新的社会运动形态，跨地方性是指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的传播形式，传播网络的链接是透过边陲的团体相互连结，而非一种由中心向地方加以传播的沟通模式，此一信息的传播形式因而造就了新的社会运动的方向。他进一步指出，信息科技唤醒了环境保护的相关议题，此一环境公民意识的兴起不单只是带来对公共政策的讨论，也进一步对应了地球之友（Friend of Earth, FoE）的全球价值（globalist value），笔者将如是的过程，即起源自地方但动员的资源不仅限于地方，称为跨地方性（p.141）。

综合以上研究可知，网络社群如何进行知识生产是一项值得探究的问题。此外，以往以社会运动的形式所构成的社会反思性，在网络动员的形式中，以视觉结合文字的方式来进行，也是社会运动极欲探索的一项课题。因此，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在于探究虚拟动员的传播形式，而此一传播形式如何连结生活风格而形成文化场域；本研究也将讨论在虚拟动员的形式中，社会运动成员如何在网域空间中，建立网络用户之间的集体行动感。

四、社群媒介

社群媒介主要是指沟通性质的网络媒介，如 Facebook、Twitter、Microblogger 等 (Diani, 2001; Tambini, 2001)，相对于传统社会运动的社会情境，社群媒介主要是以利用网络做为传达活动讯息的工具，其中所损耗的成本较少，并可达到信息告知上的功能；其次，因着网络的互动特性，社群媒介可以被用于社运主导者与一般民众的连络管道，相关的信息也可被用于影响媒介的议题。而在一个民主社会中，社群媒介更可以促进虚拟延伸（virtual

extension) 的进行, 以补充地方集结上的不便, 以下笔者拟以国内外相关的文献来说明社群媒介与其传播形态。

(一) 社群网站 Web 2.0

Boyd 与 Ellison (2007) 定义社群网站或所谓社会网络网站为：第一, 可以在系统中建立公共性或半公共性的个人资料；第二, 可以累积联系人；第三, 可以横跨使用者自身的联络网络, 并且看到自身网络系统中其他人的 interpersonal network。Ellison 等人 (2011) 也认为, 社群网站是一种无边界的沟通科技工具, 结合个人网页, 支持使用者形成和维系社会连结网络。

更重要的是, 使用者之所以可以自主上传信息, 其背后整个大环境的改变就是 Web 2.0 时代的到来。Web 2.0 时代的网络角色, 从「被动的信息提供」转变成将网络视为「一个让使用者投身其中, 在网络平台上发布经验和讯息」的窗口 (Rheingold, 2000)。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 网络不再只是人们搜寻信息的引擎, 更是发展自我理念的平台, 透过用户生产文本将信息向外发布；此外, 社交 / 社群网站的兴盛, 也代表了个人可以在不同的网站进行自我意见的展演, 而这样社会网络的工具更是一种极佳的动员工具, 可以连结、维持、接触和找到新的志同道合的人 (Rheingold, 2000)。

另外, Soukup (2006) 认为, 虚拟社区、社群网站或是电子信箱等等具有互动和共同写作特质的网站, 可以让参与者根据时间和需求决定自己参与某一运动的涉入程度, 可以只注册或接收信息而不参与实体的会议, 也可以透过参加实体集会来增加参与程度并负担更多责任。所以, 这样的网站它的工作分配是十分弹性的, 人们可以谨慎选择他们想要参加的、想要发表意见的, 而且不用明文规定, 成员便会自主行动。

对社会运动的主事者而言, 如何建立其行动基础往往是社会运动的目的之一。一般而言, 虚拟动员常以 e-mail 或 chat room 等工具来接近社会运动的成员。例如, 在一个英国环保团体的网站研究中, 一名研究者指出 e-mail 系统有助于成员分享彼此的经验 (Washbourne, 2001), 相对于大众传播的模式, 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传播形式, 计算机中介传播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 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功能, 一如 Coleman (1999) 的

研究指出，计算机中介传播的多对多（many-to-many）传播模式，不同于大众传播的一对多（one-to-many），允许具经验性的知识回复到在社会传播中应有的位置，一种指导性或征询性的地位，这样的传播形式有利于沟通的成员就既有的认知基础上提出讨论，一样地，也可对相关的知识，提出相关问题（p.208）。质言之，社群网站的贴文系统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去组织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而不需透过面对面的接触，而此一特质使社群媒介在本质上与实境的社会运动脱钩。Picherill（2001）主张，相关的研究已经证实，不需透过面对面的接触，社群媒介的贴文或照片是足以组织成员的日常生活经验（p.164）。

进一步地讨论，社群网站创造出一种混合的（hybrid）社会环境，在此一环境中实质与中介的传播形式是共存的。Sypher 与 Collins（2001）主张，相较于其他类型的行为，科技较能重新安排社会活动或传统性社群。因着科技的能力，科技可以创造出一种另类社群，而此一社群是无法存于非中介性的传播情境中（p.198）。综而言之，为了理解虚拟动员如何运作及社会运动团体如何应用信息科技来重新组织成员是研究的重点。因此，为了要探究此虚拟联结（virtual association）的特质，社会运动成员往还的网络内容应是探索此一传播形态聚焦之所在。

（二）观众与社群

不同于建立新社会运动，其信息的传递在于建立的认同。网络动员的信息架构在于建立成员一个稳定的支持协商体系（constituency），亦即一种意见交换的平台，此一传播形式不同于前者，以下将说明之。

类似于实体社会运动的组织，虚拟动员的信息平台应具备高能力传播信息与新闻的能力。根据 Diani（2001）的研究指出，信息在社会运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是一股社会支持的场域而非创造一种特有的政治对抗策略。他指出，相一致于社运人士的专业结构，新社会运动的支持团体是分散而未被组织的，但这些相关团体与社会运动团体就某些议题已具备类似的观点，因而，虚拟团体就不需要去营造强烈的认同去号召群众，同时也以较低的成本去接

近社会上的潜在支持者，因为这群民众并无需特定的诱因去动员，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也是倾向以某一事件观众的形态出现（Diani, 2001, p.123）。

除此信息平台在稳定支持者的功能，虚拟动员组织也借此一平台进行议题的讨论，以便建构社会事件的场域。例如，运用讨论组群或常见问题（Frequent Question and Answer, FQA）的形态，可以对相关的社会议题提出见解，并对有相同问题的民众提出解答。一项意大利网络团体的分析中，Tambini（2001）的研究指出，讨论组群的版主有权决定讨论的主题并准备 FQA 的题目，并可编辑或删除留言，以此等方式来影响议题（Tambini, 2001, p.252）。而图像组件的设计或讨论组群上的接口是否具可亲近性，会影响虚拟动员对议题设立的程度。Tambini 表示，事实显示在内容可近性与议题设定效果之间，明显地存在着交易性关系（trade-off），亦即，中介的接口愈容易亲近，议题对观众的影响就愈明显（Tambini, 2001, p.253）。

五、媒体改革运动与社会场域

台湾的媒体更改革运动长达 20 多年，过去一直是以公共电视的建立及维护作为主轴，而组成分子大多以学院的传播学者与研究生为主（冯建三，2012），但是 2012 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则是一更改过去的运动主体，其主要的意义在于重新调整电视在文化资本场域中的位置，而此一调整也使更多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加入了类电视的制作，如研究者对反媒垄断运动的微电影之研究发现，运动组织如果想透过微电影广告来与阅听人沟通时应避免使用代言人作为微电影广告的演出，因为可能会让微电影广告的重点转移到代言人身，盖过了原先组织想要传达给大众的讯息，应将重点放在组织想要传达的信息，信息的丰富性或是实时性最能吸引阅听众的目光（刘智玮，2013），另外，反媒体运动所引发的拒中时专栏运动，也使文化菁英以拒绝对中时写专栏来否定中国时报作为一个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场域（陈莹莹，2014）。

以台湾社会场域变迁的观点而言，从现代性理论来看，早期宜兰的反六轻运动是以环境保护为对象，透过小众媒介的传播使人们关切环境的议题，

直到 2010 年起，长达三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则是一个文化场域的反思及对话，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时间的视域，直接否定主流电视在文化生产上的地位，间接地也促成文史展示，使地方为一「新媒介」的内容，此一场域的变动其中的传播因素应为视觉性语言的兴起及视觉性语言在日常生活对话之日趋重要 (Frosh, 2011)。

语言 (verbal) 是人类沟通的接口，而此一接口可吸引感同身受的民众或相关社会改革团体的加入对话。整体而言，为了挑战商业化主流媒体的误导，虚拟动员旨在建立一个创意的传播管道。首先，虚拟动员皆在抗争主流媒体的误导，并提出另类思考的观点。例如，在 *The power of identity* 一书中，学者 Castells (1996) 指出，墨西哥社会运动组织 Zapatistas 成功地运用网络与传真机将墨国政府的腐败与社会隔离的政策公诸于世。延续社会运动的发展，可以说是网络科技最大的功能，如同 Fortier (2000) 强调，现今即便有主流媒体的压制，虚拟动员持续地提出对抗性观点，可说是对社会改革团体的后勤支持至为重要，经由科技的善加利用，更为重要的是虚拟动员产生了政治上的平衡，利用不同的传播科技或网络功能，虚拟动员提出了相关对策，以创意的方法，对抗了社会中无所不在的监督体系 (Fortier, 2000, p.464)。

其次，对于社会运动的外围民众，扩大结盟有助于对抗资本社会中的消费洪流。Diani (2001) 指出，计算机中介传播引入社会运动领域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将社会间对社运主题感同身受的民众，引导至一个高度互动的想象社群，以增加社会运动的共感基础 (Diani, 2001, p.123)。资本主义中讲求作秀的消费洪流，也将因虚拟动员所带来的沟通方式，而有所转化。一如 Tambini (2001) 的观点指称，消费洪流也日渐侵入政治的领域，有相当大的比例的公民信息是由商业广电媒体来传送，这使得原本应明思慎辨的民主机制成为一种作秀式的叫卖政治，另外学者 Touraine 将后工业社会称之为控程社会 (programmed society)，但因以社会运动形式生产文化时代的到来，这些问题可以重新被概念化，亦即社会运动、文化消费者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可以再协商 (Touraine, 1971)。

参、研究方法与策略

本文以反媒体运动为例，分析视觉符号与创意社群之间的关系。从以上的讨论中，问题的核心拟以以下三个题目来进行：（一）视觉符号是以何种形式来联结社会运动议题？（二）创意社群是以何种形态进行社会行动？

（三）最后是创意社群，反映出何种社群的特质？

本研究的焦点为反媒体垄断运动，研究的网络文宣是以数据的易得性为主要的收集对象，研究的图文数据是来自研究期间的网络观察及其脸书网站，本研究亦将反媒体垄断运动的相关人员的发言，进行次级资料分析。

反媒体垄断运动是近年来社会运动组织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虚拟动员的组织形式及其创意形式的运动，而其运动主体性的建立，及其如何连接至此一创意社群之形态，值得观察（联合晚报，2013/1/25），研究的样本是以反对媒体垄断运动社群媒介的网络视觉文本，作为研究的理论性样本。

此一媒体改革运动可定为全面反省媒体定位的运动，她源自于台湾媒体学者与旺中媒体集团的对抗，其结果一方面造成民众对电视媒体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也深化了自媒体（we media）在新闻传播产业之发展，首先笔者简要说明台湾媒介改革社会运动的背景（陈顺孝，2014）。

在台湾，由于长期广电媒体被执政党所控制，广电媒体的改革在过去十年来一直是一项显著的社会运动议题。在 80 年代末期，是地下电台的运动，此时的社会运动主要是以地下电台与有线电视第四台业者为主，其目标主要在于彰显执政党掌控广电媒体资源上的不公（Chen, 1998）。在 90 年代中期，比较明显的媒体改革运动是推动公共电视设台，此时的主要行动者是校园学者与文化团体，其运动的目的在于抵挡商业电视台代表的封杀，以确保公共电视的预算设定。在 2010 年之后，广电改革运动主要是由公民抢救公视联盟（公抢盟）来进行，其运动目标则在于监督政府的广电媒介政策，所属的传播学生反媒体垄断联盟是其组织之一，运动是以国内传播院校的学生为主，并辅以计算机网络传播来延续广电媒体改革的运动，这是近年来最大规

模的学生运动之一。本研究即是以学生团体反媒体垄断的 Facebook 网页内容¹及相关文献数据作为探讨对象，本研究共分析 63 则视觉符号。

媒介改革运动可视为近年来重要的图文媒介与社会运动组织结合的重要社会文化现象，视觉符号的应用更是新的沟通形式。本研究试图以社会运动团体的语言文本作为分析对象，以此研究策略来了解网络社运空间，中文本形态与网络创意社群的形成过程。语言可以被视为人类社会行动的形式之一，研究以论述分析来探讨符号与社群之动员形式，并从中探讨创意社群成立的途径为何？研究的文本是以理论抽样法来取得，研究的观察对象是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脸书网页的内容，以理解网络社群的行动旨趣（林芳玫，1996）。

本研究的进行是从 2012 年 9 月 1 日学生团体发起反旺中游行起到 2013 年 2 月的反媒体垄断全球守护台湾运动为止，在半年的研究期间，观察分析了相关网页及文献资料，研究分析策略是以网络视觉文本进行质化的研究，此分析策略将有助于吾人理解网络社运在形塑其社会行动之历程，并进一步理解创意社群建构的过程。

肆、研究发现

本研究发现，台湾的网络虚拟动员以一种特殊的形态来进行社会运动的行动，就虚拟动员的行动目的而言，社运成员间同伴感的建立是先于虚拟社区的建构，而地方知识的建构则须视社会议题在成员间涉入的程度。以下藉由主要的研究发现，以说明其社会行动的形式。

一、语言行动的架构

视觉符号在网络动员的行动中，扮演着形成创意社群与生活行动结合的功能。从相关网站数据的分析中，网络内容常是以提出声明的词汇，作为动

¹ 網址見 <https://goo.gl/WXYGuP>

员的开始，发挥文字作为行动揭示功能。因此，网络创意社群的组织形式之一，同时具备建立社群与媒介传播的形式。

例如在反媒体垄断运动中，行动的声明稿成为运动之组织形式之一，以澄清组织之目标：

在这个光辉但令人心寒的元旦前夕，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将在自由广场举办反巨兽跨年晚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讨论、凝聚力量、彻夜嘶喊！

请大家帮忙分享、邀请脸书朋友参加！

先别管烟火了，你听过媒体垄断吗？

图一：元旦行动



在这视觉动员中，社群媒介也扮演着类似事件重构者的角色，诸如，鼓励民众参与募款餐会、生活音乐会或大学的研讨会、创意社群集结等。由以上的文字中可知，虚拟动员所欲建构的事件，其内容并不限于运动的目标——即广电媒体的改革上——而是在其他的生活意识上进行连结。

二、认同与社群建构

在媒改团体的电子留言板内容调查中，部分内容还是以建立起团体感（group identity）为主，也就是留言板的内容主要是以情绪性的表达或问候，譬如新学年的祝贺或对政治事件的嘲讽。在虚拟动员的形式中这种一体感的建立并不同于实体社运中人民的集结，在于以文字来展示一种理性的思辨场所，此一认同空间在信息社会里，学者 Featherstone 将之视为图像符号的潜在资源（Featherstone, 2007）。

图二：以恐龙表达电视新闻媒体的恶质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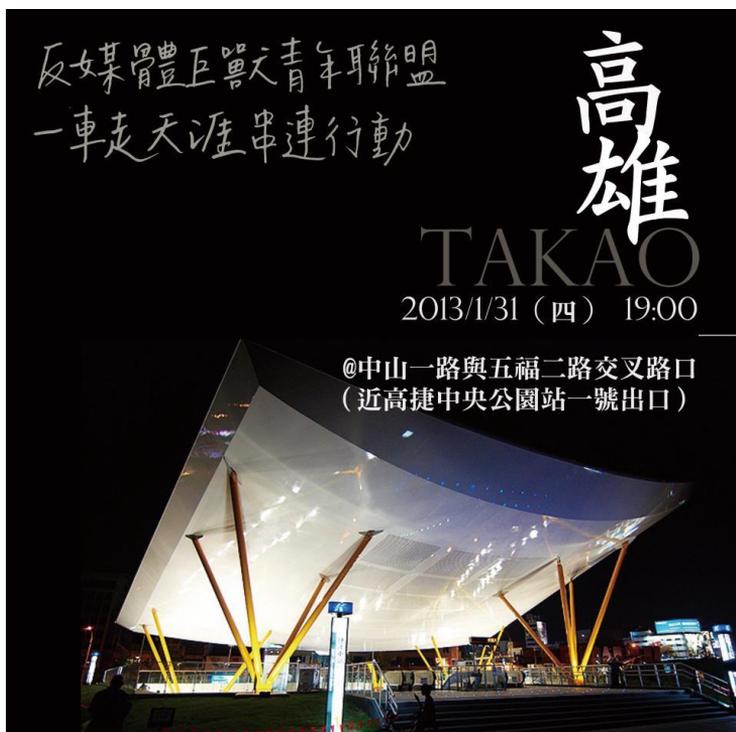
上图主要在于试图建立反媒体垄断的社会基础，在本研究期间一件有关于拒写中时的社会事件，使贴文成为文化生产的场域。事实上，一些相关网站符号之横向链接，往往可以促进社群性在情感动员中的成立，而这样的能动性又得助于横向连结来进行主体之建构，此一部分将在下一节中说明。简而言之，社群媒介动员的成立，仍有赖于主事者与潜在支持者的对话。

三、社会运动与创意社群

相较于传统社会运动语言在政治传播的意识形态效果（许传阳，1997），新的视觉语言建立了议题的再现方式，此即社群媒介的传播的面向，较着重于日常生活的沟通形态，其功能主要在于体现社群（Bourdieu, 1991）。亦即，信息的目的主要在于建立认同，此一认同的建立是社群的基础，信息动员的目的不在于颠覆运动所欲改善之对象，相反地，网运的目的在于组构日常生活于文化场域中的实践形式，新社会运动概念的倡议者 Melucci 认为当今的社会运动已经向文化面向转移（Melucci, 1996），因此创意社群的建构仍需依靠社运过程中，视觉符号如何普及并被社会成员赋予意义，形成场域空间，此即为生活运动研究的特质。例如本研究中发现，保护民众传播权的符号在台湾的电视文化产业改革的运动中，便具有将对话转化为成为日常生活的意义，成为参与者社会支持的基础（Laraña, Johnston, & Gusfield, 1994）。

在水平联结的传播形式中，虚拟动员如何运用相关的资源，是本研究所欲探究的研究问题之一。相关数据显示，在虚拟动员中，网络动员并非以其议题的显著度为主，而是以意义建构的形式来进行社群的能见度。本研究发现，就网络动员的面向而言较着重于空间美学与行动之结合，其功能主要是建构心象结构。

图三：高雄行动宣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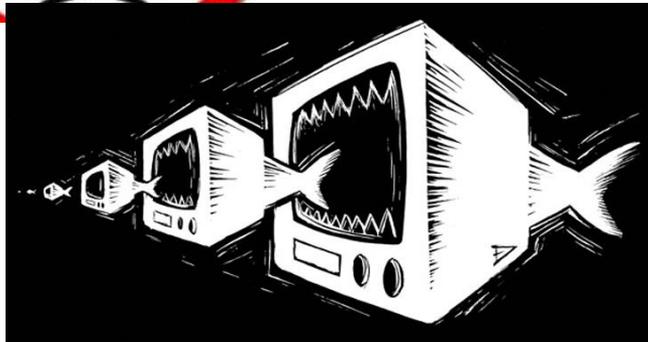
网络社群并非只是一个想象社群，它也需靠在地的组织来运作，观察者谢升佑（2015）指出反媒体运动组织是一高度集中化组织性很强的社会组织，在本研究观察期间，媒改团体主要联结的网站是媒体网站（如 FB 粉丝专页或自制微电影等），社群媒介是一个文化自主运动的网络，网络上的创意社群行动主要是以社群自主的角度，来反思电视普遍存在文化霸权的现象，而就如上的观察响应了美国网络研究者 Pickerill（2001）的看法。他指出，计算机中介的传播模式已经改变了动员的认同基础，也就是说跨运动或跨文化影响了社会运动的认同与结盟的感情，这样的现象也指出了生活运动

在于反大众消费的观点。在这样的连结下，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可以在网络的链接中，藉由图像的创作而建立运动的知识分类（如图四及图五说明）而影响沟通之进行。

图四：你好大 我不怕运动符号



图五：
介垄断运
号



反媒
动符

在以上的研究发现中可知，虚拟运员所运用的资源是网络上相同旨趣的创作团体，而此一认知链接的图像式路径，组织了社群媒介与参与者之「空间」关系。在信息化的情境中，此一行动路径隐喻了运动参与者在生活方式的串联（如拒买某种中元普渡食品或独占的电视新闻）。接下来笔者将在结

论的部分总结社群媒介、社会行动与创意社群的关系。如指出因为反媒体垄断的支持者，大多数为学生在此一文化社群中的生态 (habitus) 可能是比较反讽式的视觉图像，研究者也发现性此干扰性讯息皆在提供负面性广告以进行支持者之沟通特别是以视觉符号所创生出文化场域，其间的生存心态作为一种社群的外部符号边境，或可称为社会运动的文化面向，此一时间视域是不同于社会运动学说中的小众媒介论的立场(黄守达, 2013 年 10 月 22 日)。

伍、结论：视觉语言与创意社群

本文以媒体改革运动为例，分析符号与创意社群之间的关系。研究相关的数据指出，图像符号的使用使地方运动在文化运动的系谱上找到新的发声位置，让参与者在当前的社会连动中，建构社群的独特性与差异性以建构人与地方的意义。

因此社会运动与创意社群的研究，在于重新概念化信息与资源的关系，在社会参与的研究上 Ellison 等人 (2011) 认为，虚拟社区要能够有效地展开社会参与，首要任务就是要能吸引到潜在的支持者。传统上，资源动员理论对于社会性动员的看法是建立在个体参与和动员本身的利益上，认为个体之所以会参与动员是因为追求自身利益，也就是说，这样的说法是建立在理性的交换论之上。社会运动理论的奠基者 Benford 与 Snow(2000)认为，社会中的不满情绪一直都存在，且足以支持任何草根抗议的形成，但运动并不常发生，由此可知，社会行动的产生并非是情绪的不满或是环境的压迫，而在于修辞的策略 (Benford & Snow, 2000)。

地方运动之动员牵涉到了人与时间的连结问题，因为在传播的过程中，记忆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记忆可以影响他人的态度和意念，并加入社会参与中，所以，潜在的、的和多元的时间性，以及还有居民的自主性、认同感和使命感是关键，而集体行动本身就是一个建构性的、识别团体的过程，如 Soukup (2006) 所指出日常生活与同伴关系的连结。

网络的社群也和公民社会和社群媒体的时代来临有关。杨国斌（2009）的研究分析，社会行动之所以能引起注意，引发轩然大波，达成体制对行动要求的响应，有下列数点原因：在社会条件上，人群对传统媒体重复主流观点的不满，搭上传播科技转进，藉由网络发声；其次是议题的丰富度，使网友能依所长分工合作；此外，由下而上的发声管道，能使分散的声音不需经过权威组织的编辑，形成多视域场域。

综合前述，网络上的去中心特质，如 Melucci 认为的，网络如何藉由重塑社会时间脉络而对社会行动造成影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Melucci, 1996)。动员本身结合了人际网络、情感、价值观和文化层面的实践以及认同感的凝聚，让传播意义不再只有传统上认为的信息传播，而是更多抽象的文化符号，这也呼应了 Peckham (1998) 所提出文化资源的概念。

在此笔者拟以 Giddens 的第二现代性来进行说明创意社群在社会行动中的关系。Giddens (1991) 指出，社会行动者与传统文化认同不断地互动，而此一过程也形塑出对于新的生产关系。所以就本个案而言此一社会反思性（对环境的认同），对当代创意社群的意义，在于它使运动支持者对人们自身处遇产生的时间感，并对参与者形塑对中正纪念堂的「新」认同 (Bagguley, 1999, p.75)。

陆、研究限制与建议

在文化创意的时代中，民众使用脸书 (Facebook) 或社群网站建构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行为愈来愈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试图从社会运动理论出发，以网络的文本作为社会行动的分析对象，研究社群以视觉语言建立起网络社群的形式。在维根斯坦的理论中，社会的行动者常以受制团体的语言，如传播权此等类目作为语言行动的出发点，对此一概念产生认同的创意是创意社群的研究之所在，在当今的网络传播进展中渐渐普遍，但创意社群的沟通形式，但是否能有效持续能动性，而成为生活产业永续经营的基础，则有待进一步地研究。

基本而言，社群内部意义之构成是研究创意社群的重点，笔者认为，在社会行动者的参与而言，语言行动者进行的网络社群，因涉及了信息平台、成员的连接及可资运用资源等因素，其过程较为繁复，而此一过程影响语言的使用，也可能为创意社群的形式所影响。未来的研究方向，建议研究文化组织如何应用面对面沟通形式，来进行创意社群的组织功能。

在研究的建议上，本文认为，如何对文化动员的定义及文化产业的相关社群研究，如地方文史组织在网络上的应用，未来可以进行视觉符号与观览者之间的信息使用研究。本研究在媒介内容上偏向于媒介改革组织上的讨论，在理论文本的选择上及讨论对象之不足是本研究之限制，未来应研究多种类型的文化运动，以探测理论概念的有效性。

参考书目

- 林芳玫 (1996)。《女性与媒体再现》。台北：远流。
- 许传阳 (1997)。〈大众媒介与社会运动〉，翁秀琪 (编)，《新闻与社会真实建构》，页 37-67。台北：三民。
- 陈顺孝 (2014)。〈网民的集体演化〉，洪贞玲 (编)，《我是公民也是媒体》，页 58—81。台北：大块文化。
- 陈莹莹 (2014)。《拒绝中时运动的文化场域分析》。政治大学传播研究所硕士班论文。
- 杨国斌 (2009)。〈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传播与社会》，9: 39-66。
- 冯建三 (2012)。《传媒公共性与市场》。台北：远流。
- 黄守达 (2013年10月22日)。〈反媒体垄断运动 1〉。上网日期：2013年11月1日，取自 <https://goo.gl/pcwqVT>。
- 廖佩君译 (2009)。《文化产业分析》。台北：韦伯。(原书 Hesmondhalgh, D. (2002).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New York, NY: Sage)
- 刘智玮 (2013)。《探讨反媒体垄断运动微电影广告之效果》。淡江大学国际企业系硕士班论文。
- 谢升佑 (2015)。〈反媒体垄断运动〉。上网日期：2015年10月15日，取自 <http://ios20.asdc.tw/a10-media/>。
- Bagguley, P. (1999) Beyond emancipation? the reflexivity of social movements. In M.

- o'Brien, S. Penna & C. Hay, (Eds) *Theorizing modernity* (pp.65-82). New York, NY: Longman.
- Bakardjeiva, M., & Smith, R. (2001). The internet in everyday life. *New Media & Society* 3(1),67-83.
- Bourdieu, P. (1991).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stells, M (1996). *The power of identity*. London, UK: Blackwell.
- Coleman, S. (1999). Cutting out the middle man: From virtual representation to direct deliberation. In B.N. Nague & B. D. Loader, (Eds.), *Digital democracy: Discourse and decision mak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p. 195-210). New York, NY: Routledge.
- Chen, S.Y. (1998). State, media and democracy in Taiwa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0, 11-29.
- Diani, M. (2001). Social movement networks: Virtual and real. In Webster, F. (Ed),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p.117-128). New York, NY: Routledge.
- Ellison, N. B., Steinfield, C., & Lampe, C. (2011). Connection strategies: Social capital of Facebook-enabled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New Media & Society*, 13(6), 873-892.
- Featherstone, M. (2007). *Consumption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UK: Sage.
- Freeman, J. (1998). On the origin of social movements. In J. Macionis (Ed.), *Seeing ourselves: Classic, contemporary, and cross-cultural readings in sociology*(pp. 411-454). Pearson, NJ: Prentice Hall.
- Fortier, F. (2000). Virtual communities, real struggles: Seeking alternatives for democratic networking. In M. Gurstein (Ed.), *Community informatics: Enabling communities with information*. (pp.446-469). London, UK: Idea Group Publishers.
- Frosh, P. (2011). Framing pictures, picturing frames: Visual metaphor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5(2),91-114.
- Giddens, A. (1991). Structuration the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C. Bryant & D. Jary (Eds), *Gidden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A critical approach*. (pp.201-221). London, UK: Routledge.
- Laraña, E., Johnston, H., & Gusfield, J. R. (1994). *New social movement: From ideology to identity*.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Mayer, M., & Roth, R. (1995)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to post-fordist society. In M. Darnovsky, B. Epstein & R. Flack (Eds.), *Cultural politics and social movements*(pp. 299-319).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Melucci, A. (1996). *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tra, A. (2001). Marginal voices in Cyberspace. *New Media & Society*, 3(1),29-48.
- Pickerill, J (2001). Weaving a green web: Environmental protest and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Britain. In F. Webster (Ed.),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Information Age*(pp.142-167). New York, NY: Routledge.
- Peteet, J. (2000). Refugees, resistance, and identity. In J. Guidry, M. Kennedy & M. Zald (Eds.),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pp.183-209).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Peckham, M. (1998). New dimensions of social movement/countermovement interaction: The case of scientology and internet critics.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4),

317-347.

- Rheingold, H. (2000). *The virtual commun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Soukup, C. (2006).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s a virtual third place: Building Oldenburg's great good places on the World Wide Web. *New Media & Society*, 8, 421-440.
- Sy, P. (2001). Filipinizing 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digital power. *New Media & Society*, 3(3), 296-312.
- Sypher, H. E., & Collins, B. (2001). Virtual-online communities: How might new technologies be related to community? In G. J. Shepherd and E. W. Rothenbuhler (Eds.),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pp. 191-200). New Jersey: LEA Publishers.
- Tambini, D. (2001). The civic networking movement: the Internet as a new democratic public space? In C. Crouch, K. Eder & D. Tambini (Eds.), *Citizenship, Markets, and the State*. (pp.238-270).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ouraine, A. (1971).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omorrow's social history: class, conflict and culture in the programmed society*.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 Washbourne, N. (200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new forms of organizing ? In F. Webster (Eds.),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p.129-143). New York, NY: Routledge.

**On the New Identity of Social Movement:
An Analysis of Creative Community**

Chuan Yang Hsu*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bout studying the role of cultural object in constructing creative communities in Taiwan. In general,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is the pluralization of life-world that creates the distinctive opportunities and pathologies of modern life. Based on the evidence of case study, I discussed the effects of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in the arena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 In theory, a common issue concerning with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orists is: if virtual community could be viewed as a form of social collectivenes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n, what is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has played in attaining a network in terms of setting up a creative community. Toward this end, the paper will be composed of two parts. In the first half, with reference to cultural theory and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I demonstrate the promi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upholding virtual movements. Based upon theoretical concept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then, I survey anti-media monopoly movement in Taiwan. Furthermore,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concern, how the identity contributes to the discussion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is presented in conclusion section. The empir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electronic content stored in media reform activist's Facebook. These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qualitative method. I argue that the visual device is a part of framing schematic pictures into communities. The turn of visual presentation is to form a field of temporal horizon.

Keywords: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creative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八期
2018 年 12 月

community

*Chuan Yang Hsu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Taiwan. E-mail:093663@mail.tku.edu.tw

「亚洲」作为纪录的方法：
合制计划暨工作坊之参与观察
蔡庆同*

本文引用格式

蔡庆同 (2018)。〈「亚洲」作为纪录的方法：合制计划暨工作坊之参与观察〉。《传播、文化与政治》，8:165-190。

投稿日期：2017 年 10 月 4 日；通过日期：2018 年 3 月 6 日。

* 作者蔡庆同为台南艺术大学音像纪录与影像维护研究所副教授，
tonytsai@tnua.edu.tw

《摘要》

本文主要是针对自 2015 年 9 月正式启动、迄今仍持续进行中的「亚洲纪录片合制计划」暨工作坊，进行一个参与观察的现场报告，身为发起人与指导老师之一的笔者，试图将定期正式的观摩、论坛、专家会议、工作坊与映后座谈，以及不定期非正式的互动、交流与对话，视为一个教育的过程，并希冀从行动研究之观点，对于「亚洲」作为纪录的方法，作一个初步的归纳。

关键词：合制、行动研究、亚洲、纪录片、教育过程

壹、前言

本文主要是针对自 2015 年 9 月正式启动、迄今仍持续进行中的「亚洲纪录片合制计划」暨工作坊，进行参与观察的现场报告，其中包括了定期正式的观摩、论坛、专家会议、工作坊与映后座谈，也包括了不定期非正式的互动、交流与对话，希冀从一个教育过程的行动研究之观点，对于「亚洲」作为纪录的方法，作一个初步的归纳与整理。

接续台湾纪实音像与社会变迁之关系的课题，笔者在 2011 至 2014 年期间，申请并执行了名为「东亚视线：台湾、韩国与日本纪实音像之比较研究」的科技部专题研究计划，主旨在于拓展对于亚洲邻近国家在纪实音像的认识及其参照，尤其是它作为现代的观看技术，是如何从西方（或日本）引进并被看待的？以及又是如何在各自的历史与社会中被实践的？¹

在中国、日本与韩国等地的移地研究过程，意外收获的是，逐步串连起一个影像教育的群聚网络及其社会关系，例如国家电影资料馆或电影中心、纪录片影展、电影学校、小区影像、非营利组织等等机构，²而这个群聚网络及其社会关系，也成为下一步推动「亚洲纪录片合制计划」暨工作坊的契机。

最初是在 2014 年 9 月，于第六届 DMZ 国际纪录片影展（以下简称 DMZ Docs）期间，身兼影展执委的韩国艺术大学教授、资深纪录片导演 Kim，³有感于新世代的纪录片工作者，似乎都欠缺对于亚洲的认识与关注，遂提议举办一个会外会性质的论坛，集合参与影展的亚洲人士，而笔者亦有幸受邀作为台湾的与谈人。

¹ 研究成果可進一步參考蔡慶同（2017）。

² 中國的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影視人類學實驗室、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雲南藝術學院、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計畫，日本的國家電影中心、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電影保存協會、IMAGICA，韓國的國家電影資料館、EIDF 國際紀錄片影展、DMZ 國際紀錄片影展、MEDI ACT、獨立電影協會、首爾獨立紀錄片影展、Labor News Production 等等。

³ Dong-won Kim（金東元），1988 年所拍攝的 *Sanggye-dong Olympic*，以因舉辦奧運會而被圈地迫遷的居民為紀錄對象，其導演與居民站在一起的紀錄位置，被視為韓國獨立紀錄片的發軔，關於 Kim 的介紹，可進一步參考《放映週報》第 614 期的〈從「貧困」出發才能拍成電影：專訪韓國紀錄片導演金東元〉（見 http://www.funscreen.com.tw/feature.asp?FE_NO=1708）。

除了分享各自在纪录片的发展与现况之外,此一论坛特别聚焦于 Kim 所提出的合制之可行性,笔者即从一个影像教育的观点,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既然合制的初衷,乃是为了增进彼此交流并重启亚洲思考,应当可以善用各个电影学校作为常设性机构的优势作为基础,并在年度性影展作为资源平台的支持之下,从中小型的、实验性的纪录片合制计划开始做起。

这个构想,经过了一年的酝酿,终于在 2015 年 9 月的第七届 DMZ Docs 正式启动,之后,第一期的「亚洲纪录片合制计划」,历经 2016 年 2 月在首尔及 5 月在台南的两次工作坊,成果展示于 2016 年 9 月的第八届 DMZ Docs,并同步启动第二期的「亚洲纪录片合制计划」,接续举办了 2017 年 6 月在台南及 9 月在首尔的两次工作坊。

事实上,1990 年代开始,纪录片作为一种电影的类型,在亚洲各个地域,似乎都呈现了遍地开花的荣景,以游惠贞(2014)所编撰的专书为例,就收录了包括台湾在内、十几个亚洲国家的纪录片现况概述与导演访谈,以文字来描述亚洲各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呈现了纪录片作为一种属于西方的科技媒介,在各国相似的命运、面对的问题或共同的困境。

又以影展为例,从 1989 年的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到 1998 年的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2007 年的 CNEX、2009 年的 DMZ Docs 等等,它们皆提供了亚洲各个地域的纪录片,从征件、产制、作品、映演到发行、出版的各种管道、机会与资源。

例如釜山国际电影节于 2006 年成立的亚洲纪录片联机 (Asian Network of Documentary, AND),提供了亚洲电影基金 (Asian Cinema Fund),在每年年中开放亚洲纪录片拍片计划的补助申请;以及 CNEX 每年会策划出一个主题,征集提案、评选并提供制作补助,希望有系统、有组织地对华人当代社会的变迁历程进行测绘与纪录。

然而,藉此我们所认识到的亚洲,往往仍是各个地域的不同窗口及其排列组合,甚至只是提供一种虚拟现实的旅游体验,以及异国情调作为文化消费,而所谓的制作计划之补助,也仍然是维持某种以国家来加以切割,或者个别导演及其作品的作者电影,在闹热的交往之后,我们往往还是又回到各自的所在,至于亚洲何以名之的问题,仍然停留在原地。

正如邱貴芬 (2016) 所意識到的, 1980 年代中葉之後, 亞洲許多國家先後興起了一股新的紀錄片的風潮, 包括台灣、韓國、中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等, 都出現了有別於以往的一種紀錄片形式, 她稱之為「新紀錄片運動」。

而在東亞紀錄片脈絡下的台灣一節之中, 她又提及 1980 年代中葉以來的台灣新紀錄片現象其實並非台灣特有, 在日本有 1960 年代末期的小川紳介、1970 年代的土本典昭, 在南韓有 1980 年代末期的獨立紀錄片與民眾電影, 都是以「環境」相關的抗爭為觸媒,⁴以及 1990 年代誕生的中國新紀錄運動, 如何關懷底層弱勢並作為社會變革的另類文獻。

換句話說, 在紀錄片的領域, 亞洲作為某種區域性的意義及其重要性, 乃是值得關注的, 而在紀錄片的領域之外, 早已啟動了不一樣的反思, 例如基於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 以及如何擺脫國族主義的束縛, 台灣、南韓與日本的文化研究, 已開始進行亞洲的論述 (孫歌, 1999)。

這包括了「作為方法的亞洲」(竹內好, 2007)、「作為方法的中國」(溝口雄三)、「亞洲作為抵抗線」(子安宣邦, 2008)、「作為知性實驗的東亞」(白永瑞, 2009)、「亞洲作為方法」(陳光興, 2006)、「新亞洲想像」(汪暉, 2010) 等等。⁵

綜而言之, 「亞洲紀錄片合制計劃」暨工作坊, 緣起於一群在大學里教授紀錄片的老師們, 我們來自於日本、韓國、台灣與中國等地, 有的是作研究的學者、有的是影像的工作者, 在許多正式影展或非正式的聚會里, 逐漸地構成一個跨越疆域或邊界的群聚網絡及其社會關係, 同時, 基於「亞洲」能否作為紀錄的方法之關注, 進一步發起了這樣的一個實驗性之行動, 並從紀錄、文本到觀看的文化生產, 視為某種教育的过程。

貳、我是亞洲人

⁴ 儘管如此, 筆者並不完全同意邱貴芬 (2016) 所述: 將小川紳介的成田機場抗爭、土本典昭的水俣病調查、Kim 的被迫遷居民紀錄、綠色小組的海山煤礦報導, 歸納成都是以「環境」相關的抗爭作為觸媒。

⁵ 《亞際文化研究》期刊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從西天到中土計畫、在左邊的亞洲影展等等, 可以說是由此衍生或與其相關的社會文化活動。

正如上述，2015 年 9 月的第七届 DMZ Docs 期间，参与的电影学校，在事先各自组成了师生团队，先是进行学生作品的观摩放映，主要是藉此增进彼此之间的认识与熟悉，同时穿插着指导老师的与谈，尤其是对于未来如何具体落实此一「亚洲纪录片合制计划」进行讨论，包括了为何推动此一计划？什么是适当的主题方向？如何拟订制作的进度？

一、观摩

有了基本的共识之后，2016 年 2 月，在首尔举办了第一次的工作坊，来自韩国艺术大学（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以下简称 KARTS）、日本映画大学（Japan Institute of the Moving Image，以下简称 JIMI）、上海同济大学（Tongji University of Shanghai，以下简称 TONGI）与台南艺术大学（Tainan University of Arts，以下简称 TNNUA）的四个师生团队，以 Kim 所提出的 *I'm an Asian* 为合制主题，发想并分享各自的制作提案，实时性地接受所有师生的提问、挑战与建议，并于会后共同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2016 年 5 月，又在台南举办了第二次的工作坊，主要进行制作提案的期中进度报告，同时也进行指导老师及其电影学校的观摩放映。

Kim 带来了 *Sangye-dong Olympics* (1988, 27 min.) 以及 *Repatriation* (2004, 148 min.)，前者纪录的是由于 1988 年首尔举办奥运之故，政府以不美观的理由强力拆除了 Sangye-dong 地区并迫迁当地的居民；后者则是纪录了长期被关在韩国监狱里、不肯接受改宗的朝鲜受刑人，以及他们最终被返回朝鲜的历程，两者都透露出他对于纪录片的理念，包括了制作「好」的影片而非「有趣」的影片，应将镜头对准黑暗角落、社会矛盾与弱势群体，以及和被摄对象长期生活在一起的纪录位置等等。

Yasuoka 带来了 *311* (2011, 92 min.)，⁶日本 311 大地震发生二周后，森达也、绵井健阳、松林要树与 Yasuoka 四位影像工作者进入灾区，走访了沿

⁶ Takaharu Yasuoka（安岡卓治），日本映畫大學教授，曾擔任原一男（ゆきゆきて、神軍）、森達也（A、A2）及多部紀錄片（311、遺言—原発さえなければ）的製作、

海的福島、岩手與宮城，紀錄下令人不忍卒睹的災後景象，其中一段再現的正是，悲傷至極的死者家屬因為紀錄者拍攝受難者屍體的鏡頭而感到憤怒，這個赤裸裸的視角，也引起了諸多的爭議與討論。

南藝大紀錄所則提供了【南進台灣】的放映，【南進台灣】是1940年代日本總督府支持製作的國策記錄映畫，透過環島一周的現實素材與解說旁白，逐步建構起南進政策以及台灣作為南進基地的帝國論述（蔡慶同，2012），在這樣的場合放映，引起了非常不同的觀看經驗與分享，例如對於同樣具備被殖民歷史經驗的韓國團隊而言，理解到歷史影像的維護保存對於去殖民乃是重要的；而日本團隊則是由此指出負責解說旁白的牧野周一，在那個時代的重要性，及其所代表的象徵意義。

二、提案

Kim 所提出的合制主題：*I'm an Asian*，看來似是一個抽象、模糊與不清的方向，但其本意即是在鼓勵參與的各個師生團隊，能夠練習跳脫作為韓國人、日本人、中國人或台灣人的既定框架，試圖從作為亞洲人的新的視線，透過一個社會文化現象的觀察與紀錄，進行某種前導性研究（pilot study）的提問與思考。

因此，在此一問題意識的引路之下，四個師生團隊提出了下列的製作提案及其成果作品：

首先是 JIMI 的 *Return* (32 min.)，Yumoto Shigeru，獨自住在日本山村里一棟200年以上的老房子，過著幾乎離群索居的生活，但是，今天導演為他帶來了一位訪客，Ye-eun Lee，則是來自首爾、藝術大學的女學生，就待在這間老房子里，他們分享著各自的生命與家庭故事。

其次是 TNNUA 的 *Marching for You, Comrade* (17 min.)，2015年，一群來自韓國 Hydis 的中年勞工，跨海來到台灣抗議母公司的關廠，而在台灣一

攝影與編集，關於 Yasuoka 的介紹，可進一步參考游惠貞（編）（2014）的專書裡藤岡朝子所撰〈日本獨立紀錄片二三事〉（頁41-57）。

群年轻的社会运动工作者，协助并参与了共同的抗争，他们之间，虽说着彼此不懂的语言，却可以合唱共同的歌曲——〔劳动者战歌〕。

第三是 TONGI 的 *The Shadow Player* (20 min.)，李是一位皮影戏老师傅，他们也是县里最后一个皮影戏剧团，这是文化及其传统在当代社会的共同命运，而为了想让更多人了解并喜欢这个文化及其传统，他们不惜争取上电视的机会并到各大城市去巡演，最后，仍是无疾而终，他回到了家乡，但还不服输，准备再为乡亲们努力组织一场皮影戏的表演。

最后是 KARTS 的 *Undercover Paradise* (20 min.)，Ina 和她的泰国同学 Jinny 一起参加了一个专为韩国观光客所安排的泰国团体旅游，在这趟旅途中，她们将会看见或看不见什么样的泰国呢？对于韩国人而言，也许这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对于身为当地人的 Jinny 而言，这却是非常诡异的经验，而随着旅途的展开，她们也越来越感觉到疲乏与不安。

三、论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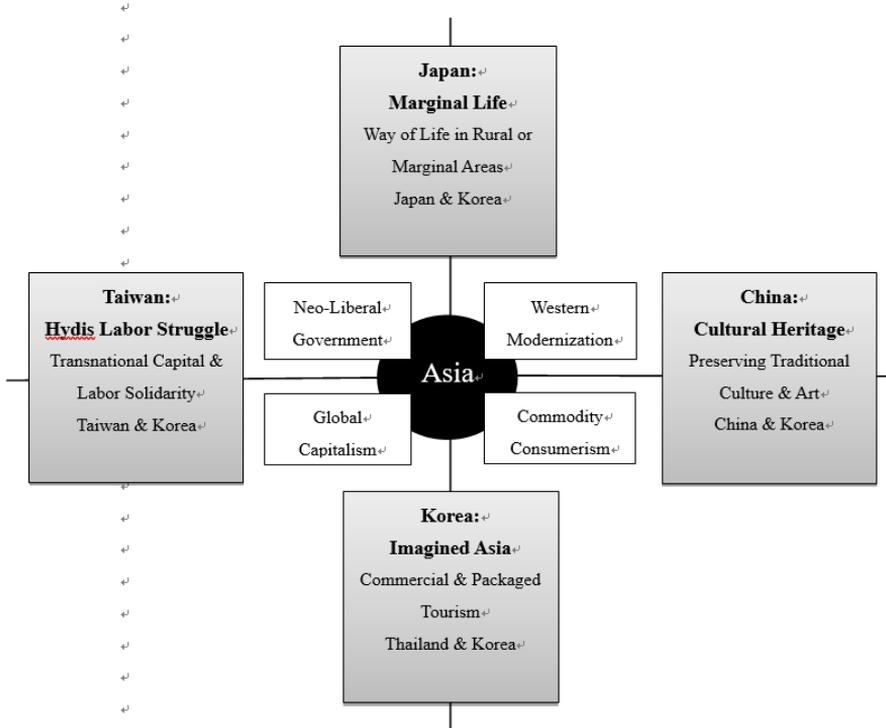
针对四个师生团队的制作提案及其成果作品，我们尚透过论坛的形式，试图去澄清并诠释它们与合制主题的链接关系，以及透过这样的提案与影像，我们是否更能理解彼此之间的共同与差异？乃至于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亚洲？有无可以进一步去发展或延伸的论述及其观点？

Jeon 即是将上述的制作提案及其成果作品，⁷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整合工作，他认为这四个短片都正好各自在响应，亚洲所正在面临到的共同影响与力量，包括了西方的现代化、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商品的消费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等等，同时，它们大多也都处理到区域性的议题，或者采取了跨国性的方法。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透过下面的图来进一步表示，JIMI 再现的是分别来自帝国与殖民地的老人与女孩，他们在乡间老房子讨论生活、生命与生存方式的抉择；TNNUA 藉由 Hydīs 事件特别去思考跨界劳动抗争的意义与可能

⁷ Gyu-chan Jeon (全圭燦)，韓國藝術大學教授，專長領域為媒體文化研究。

性；TONGI 凸显著快速工业化之下的传统文化及其生活之共同命运；⁸ KARTS 则是透过年轻女孩与本地朋友一起参加所谓的观光团之旅，反射出我们平常是如何依循商品与消费的逻辑，在理解亚洲的他者及其地域。



图一：I'm an Asian

数据源：整理自“Asian Common Chord Penetration of Asian Docs Co-Production Network”, by Gyu-chan Jeon, 2016, *8th DMZ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Guild Book*, p.155.

⁸ 在提案、指導與論壇的過程中，原本期待 TONGI 也能夠就「非遺」（非物質文化遺產，台灣稱為無形文化資產），進行跨國的比較或對話，或者是在中國，它如何作為國家的文化工程，紀錄片更在其中成為主要的方法，乃至收編並吸納了大量的資源，後來因素材及深度有限，最終版本呈現的仍只是一位皮影戲老師傅的故事。

2016 年 9 月，四个师生团队就分别从这不同的面向切入，各自完成了 20~30 分钟的纪录短片，最后再整合为一部纪录长片，于 DMZ Docs 首映，在会后的讨论中，大多数人皆同意最终产出的内容形式当然是重要的，但更大的成果却是发生并累积于这一整年学生、教师与策展人之间的共同成长，有鉴于此，并同步启动了第二期的「亚洲纪录片合制计划」，基于第一期的合制主题，似乎较为着重社会（空间）的现象，第二期的合制主题就暂订为历史（时间）的梳理。

参、越界／跨域的历史

决定第二期合制计划的主题之后，2017 年 3 月，我们又在首尔举行指导老师群的专家会议，除了确认执行上的细节之外，还有了新的方向，例如：增加新的团队，包括韩国龙仁大学（Yong In University，以下简称 YONGIN）以及云南艺术学院（Yunnan Arts University，以下简称 YUNNAN）；基于这是一个教育过程的理念，希望工作坊不只是构想提案的发表或者是制作进度的报告，而更接近于研讨、课程与教学的活动；同时把期程由一年拉长至两年，希望透过更扎实的田野与研究，提升影像本身的广度与深度；并鼓励跨师生团队之间的合作共构。

更有意义的是，这次的讨论过程，由 Yasuoka 与 Jeon 分别简报了他们关于本次主题的思考，Yasuoka 分享了他多年来制作历史相关纪录片的经验，包括了 *Okinawa no Harumoni* (1979, 86 min.)，⁹以及 *The Emperor's Naked Army Marches On* (1987, 122 min.)，¹⁰特别强调的是证据（evidence）的重要性，也就是纪实音像作为档案及其文献性质。

⁹ *Okinawa no Harumoni*，日文片名為沖繩のハルモニ，導演山谷哲夫，自 1977 年即開始尋找慰安婦，後來得知有一位現居住在沖繩的韓籍前慰安婦，並取得了重要的證言。

¹⁰ *The Emperor's Naked Army Marches On*，日文片名為ゆきゆきて、神軍，中文片名為【怒祭戰友魂】，導演原一男，跟著主角奧崎謙三，一一探訪戰友，並逐漸挖掘出吃人肉等等戰時的殘酷境況。

Jeon 则分享了一部短片，追溯日本最为知名的保险套品牌冈本 (OKAMOTO)，是如何利用二次大战发迹、后遍及亚洲各个地域的历程，以及利用两张越战时期的知名照片为例，进一步去联想当时韩国与越南之间的可能连结，藉此特别强调的是发挥历史的想象力 (imagination)。

两人的分享激发了不少的议论，尤其是我们即将要以纪实音像来再现所谓的历史，那么，它究竟是作为历史的证据重要，抑或是需要发挥历史的想象力？

一、观摩

因此，2017 年 6 月在台湾南艺大，我们以「跨域 / 越界的历史」(Trans-/Cross- History) 为题，举办了第二期「亚洲纪录片合制计划」的第一次工作坊。

除了透过第一期合制计划成果 *I'm an Asian* 的放映与讨论，让参与第二期的师生团队及其成员理解这个计划的动机、目的与过程之外，不同的师生团队，又再带来各自的作品，作为观摩的对象，而身兼工作坊策划人的笔者，亦特别邀请到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在映后与作者面对面进行与谈。¹¹

这些影像，包括了 KARTS 的 *Seven Years-Journalism without Journalist* (2017, 110 min.)、¹²*Thirty* (2016, 21min.)，¹³前者纪录了自 2008 年以来被解雇的 17 位新闻工作者之抗争历程，以及对于金权掌控媒体的反思；后者则是 30 岁的作者关于自己家庭与未来工作的抒发小品。

YUNNAN 的 *My Name, My Family* (2012, 91min.)，¹⁴与 *An Oral History: About The Educated Youth of Mengsheng State-operated Farm* (2017, 58 min.)，

¹¹ Hye-Mi Park (朴惠美)，DMZ Docs 策展人；Fan Wu (吳凡)，TIDF 策展人；Yow-Jiun Wang (王右君)，成功大學台文系副教授；Meng-Tze Chu (朱夢慈)，臺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助理教授；Young-Ie Wuo (吳永毅)，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助理教授；Horng-Yi Chen (陳泓易)，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博士班副教授；Jisu Klaire Yoo (柳志受)，龍仁大學教授。

¹² 作者 Jin-Hyuk Kim (金進赫)，韓國藝術大學教授。

¹³ 作者 Hye-Rin Lee (李蕙璘)，韓國藝術大學研究生。

¹⁴ 作者 Xin Li (李昕)、Xuan Cun (寸炫)，雲南藝術學院講師。

¹⁵前者纪录了作者从云南到缅甸、寻找自己寸姓家族的寻根之旅；后者则是关于中国 1960 年代知青下乡及其在国有农场的口述历史。

TNNUA 的 *The Prisoned Island* (【囚·岛】) (2012, 112 min.)，¹⁶纪录了白色恐怖的受难者陈孟和，如何凭借着记忆与老照片，重新还原当年绿岛「新生训导处」的地景与历史。

JIMI 的 *The Will: If Only There Were no Nuclear Power Plant* (2015, 225 min.)，¹⁷这部影像汇集了日本福岛核灾发生后 800 天的影像纪录，并重新编成为 3 小时 45 分钟的纪录片。

YONGIN 的 *Hard-boiled Wonderland* (2014, 32 min.)，¹⁸与 *The Close Family* (2014, 34 min.)，¹⁹以及 *Let's go SPENEW!* (2016, 21 min.)，²⁰前者是以实验性的手法，透过当代日本社会的生活纪实，穿插并交织历史的影像，进行某种跨时空的对话与呼应；第二部片是以家庭的照片与影像为主，讲述作者自己离散的家族故事；第三部片则是关于一个高中拉拉队的故事。

Kim 也带来新片 *Jung Il-woo, My Friend* (2017, 84 min.)，透过自己多年来的随身纪录，纪念一位刚刚过逝、却影响他拍摄纪录片深远的外国神父之生命故事。

除此之外，延续在专家会议中关于纪实音像究竟是作为历史的证据或历史的想象力之争议，笔者特别邀请了两部影像作为焦点放映，也就是 *3 Islands* (【三岛】) (2015, 64 min.) 与 *Letter #69* (【第 69 信】) (2016, 20 min.)。²¹

前者跟随艺术家探访了诸多在台湾、冲绳与济州等地重要的历史场景，透过文字、叙事与声音进行了重新的组织，试图寻找他们在战后的不同命运之中，所可能具备的同构型之历史肌理；后者则是以白色恐怖受难者施水环在狱中的家书为核心，尤其是她受死刑前、几乎空白的第 69 信，试图以影

¹⁵ 作者 Yi-Fei Zhou (周怡霏)，雲南藝術學院學生。

¹⁶ 作者 Ji-Xian Zeng (曾吉賢)，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助理教授。

¹⁷ 作者包括了 Naomi Toyota、Masaya Yoda、Takaharu Yasuoka 等人。

¹⁸ 作者 Wook Steven Heo (許旭)，龍仁大學教授。

¹⁹ 作者 Da-Hee Yun (尹多曦)，龍仁大學研究生。

²⁰ 作者 Ji-Hyun Kim (金智賢)，龍仁大學學生。

²¹ 作者 Hsin-I Lin (林欣怡)，臺南藝術大學材質創作與設計學系副教授。

像的方法去再現這封看不見的书信及其历史。

换句话说，它们都是在处理一个历史的主题，在 *3 Islands* 中，充满了各种证据性的影像，而借着想象力，作者连结起东亚三岛之间的关系；但反过来说，在 *Letter #69* 中，面对空白的家书，作者却是透过想象力的再现，去具体化受难者的心理与历史的真实。

正如 Croce 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也就是说，历史作为纪录片合制的主题，虽是作为档案的意义，然而，档案无法回归真实的过去，档案与记忆之间亦非一对一、不变的对应关系，但是，没有档案就无法记忆，这个档案化的行动，提供的是碰触真实的过去的记忆之可能性 (Derrida, 1996)，因此，它还需要一定的想象力，或者说是某种观点，去连结亚洲及其各个地域，以及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从而能够这些素材与经验进一步政治化 (politicising)、问题化 (problematising) (郭力昕, 2014)。

二、提案

第二期的合制主题虽是「历史」，但其实更鼓励的是具有「越界」或「跨域」意义的主题内容或制作方法，因此，重新组合而成的五个师生团队，遂发想了下列的制作提案：

首先是 TNNUA 所提出的 *Look Back to Our Island*，导演 Ella，是一位南艺大纪录所的研究生，她在某一场反战运动的论坛上，认识了嫁到济州岛、并以艺术参与和平运动的 Emily，开始认识发生在当地的四三事件，²²以及接触到反美军基地的运动，这些经验，也让她开始回顾起自己的故乡——金门岛，它也曾经是军事重地，如今则成为观光地点，未来甚至还可能会变成赌场，以及自己的父亲，是如何经历军事戒严，并从一位军人退伍后成为民宿

²² 濟州四三事件 (제주 4·3 사건)，發生於美國軍政時期至大韓民國第一共和時期，起因於戰後初期的各種複雜之社會問題，它以 1947 年 3 月 1 日警察的開火事件為起點，歷經 1948 年 4 月 3 日由南韓勞動黨濟州島黨部武裝隊的武裝起義，到 1954 年 9 月 21 日漢拏山禁足全面開放為止，在武力衝突以及鎮壓過程之中更造成許多居民犧牲。

老板兼导游的家庭史，还有自己和父亲之间关于战争与和平不同之观点。

其次是 YUNNAN 的 *Home Faraway*，1950、60 年代陆续撤退来台的滇缅游击队，最为人所知的聚落即在清境农场，尽管，已有诸多文字、影像甚至纪录片，²³再现了他们的故事，然而，对于云南的师生团队而言，这却是一个之前完全陌生的群体，因此，他们想重新透过云南的观点，追问这群人的流离之历史，包括了云南对他们而言是什么？他们为何频繁地来往台湾及云南之间？三个世代之间是否有着不同的记忆与认同？更重要的是，我们往往看到的是男性的口述历史，那跟着滇缅游击队过来的女性们，她们的记忆又是如何？²⁴

第三是 JIMI 的 *LEFT*，位于横滨的中华街，乃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城，但是，在同一个中国城里，却生活着各自支持中国与台湾的海外华人，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双方一直存在着竞争、甚至冲突的关系，例如曾经发生过的横滨中华学校事件，²⁵因此，在这个提案里，作为日本学生的他们（其中一位具有华人血统），想要去纪录老一辈人的记忆，也同时想要探索当代中国城的生活面貌。

第四是 KARTS 的 *Class V Supply*，我们所熟悉的慰安妇，大多是指二战期间被日本帝国主义强押的殖民地妇女，包括了台湾、中国与东南亚各地，然而，近年来，在韩国却有了新的研究指出，²⁶在韩战期间，韩国军队也曾

²³ 柏楊的小說【異域】，朱延平的電影【孤軍】，羅大佑的歌曲〔亞細亞的孤兒〕，李立邵的滇緬游擊隊三部曲紀錄片【邊城啟示錄】、【南國小兵】與【那山人這山事】，吳秀雀的民族誌《春辣椒的滋味：清境義民人群之認同內涵與變遷》，清境社區發展協會的專書《從異域到新故鄉：清境社區五十年歷史專輯》。

²⁴ TONGI 因製作提案與合製主題差異較大又無法臨時更換，故暫時退出第二期的合製計畫，相較於 TONGI 的傳媒教育體系，YUNNAN 則是來自於雲之南影展、雲大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1999 年設立，與德國哥廷根科教電影研究所、基爾大學合作培訓）、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計畫（社區影像培力）等等的背景脈絡。

²⁵ 1949 年，國共內戰結束，也連帶使得海外的中國城之內部發生磨擦，位在橫濱中華街上的中華學校教室內，張貼公佈學生的作文中有「解放」這兩個字，當時台灣與日本還有邦交，台灣考察團看到後，就以為學校實施共產教育；1952 年，遂封鎖學校並驅離支持中國大陸的學生，以此事為分水嶺，後來分成大陸派的橫濱山手學校以及台灣派的橫濱中華學校。

²⁶ 進一步的資訊可參考 *Who was taken to the South Korean comfort women* ([Interview] Kim Gwi-ok Professor of Religious Affairs) (見

经沿袭了类似慰安妇的作为，这个新的历史证据，无疑是高度敏感的，然而，透过这段历史的追寻，我们也更能够确实体会到，慰安妇不只是作为国仇家恨的象征，更是殖民主义、父权社会与性暴力下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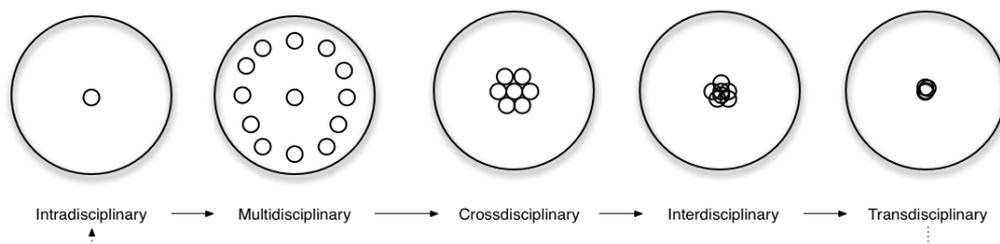
最后是 YONGIN 的 *Bossy Girls*，在某些方面依然保守或传统的韩国社会里，近几年来，针对若干社会和政治事件，许许多多女性主义运动者，藉由新的网络媒介进行串连，²⁷发起了一系列的组织与活动，被称之为网络女性主义运动 (Net Feminists)，导演 Da-hee 和 Ji-hyun，她们想要透过自己的亲身参与，对此作一个了解，同时，也想进一步去认识亚洲其他地域里类似的社会运动现象。

三、论坛

从「跨域 / 越界的历史」(*Trans-/Cross- History*) 成为合制的主题，到各个师生团队开始构思并提出上述的制作提案，我们在几次论坛之中，更加关注的是：为什么要以「历史」为名？这个「域」(Boundary) 或「界」(Border) 究竟是什么？而「跨」(Trans-) 或「越」(Cross-) 的方法又有哪些的可能性？

在寻找上述提问与答案的过程之中，笔者发现了下列这样一个可供参照的心智图，并仿效 Jeon 在工作坊中提出整合的可能性。

图二：Disciplinarity: intra, cross, multi, inter, trans



数据源：“Disciplinarity: intra, cross, multi, inter, trans”, by A. R. Jensenius, 2012(March

<http://www.pressian.com/news/article.html?no=122981>)。

²⁷ 例如像是 DSO 或 Womenlink。

12), Retrieved from <http://www.arj.no/tag/multidisciplinary/>

从这个心智图可以发现到，它原本是用来表示在人文、艺术与社会的领域，不同的专业或学门之间，如何跨域或越界进行合作研究的各种可能模式：

一是“*Intra-disciplinary*”，它意指我们往往习惯于固守在单一专业或学门的立场与观点；二是“*Multi-disciplinary*”，它意指来自不同专业或学门的人在一起工作，但仍旧只是各自运用他们熟悉的知识，来分析同一个现象；三是“*Cross-disciplinary*”，它意指我们开始学习从不同专业或学门的观点，来看待一个特定的专业或学门；四是“*Inter-disciplinary*”，它意指除了并列或并置之外，我们还能够初步整合来自不同专业或学门的知识与方法；五是“*Trans-disciplinary*”，它意指真正创造出一个足以超越各个专业或学门观点的总体性之知识框架。

我们不妨就将这个心智图的专业或学门 (*disciplinary*) 之字眼，置换成第二期合制的主题，也就是所谓的历史 (*history*)：

因此，“*Intra-history*”就如同我们习以为常地以民族国家等同于社会疆域的历史；“*Multi-history*”则意味着我们开始意识到亚洲其他的地域之存在，但仍然是一个一个、分开看待的历史，而这几个制作提案，都已开始尝试透过个体或社群的身体、记忆及其印记，挑战或质疑上述的档案法则及其权力关系 (Derrida, 1996)。

TNNUA 与 YUNNAN 的制作提案，已接近于“*Cross-history*”的方法，他们皆从不同地域的角度及其对话，来看待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或过程；JIMI 则是凸显了两种以上的历史观点如何并存甚至整合于共同的中国城之时空里，颇有“*Inter-history*”的味道；最后是 KARTS 与 YONGIN，他们所探讨的对象虽都较为个别性，但背后却有“*Trans-history*”的可能性，也就是企图发展出更为整合性之观点，来反思我们既有的历史认识，尤其是从女性观点重构历史 (*Her-story*) 的企图心。

2017 年 9 月，假第九届 DMZ Docs 期间，我们举办了第二期合制计划的第二次工作坊，延续五个师生团队的制作提案，本次工作坊主要是检视各自

的田野调查与研究成果，仍旧历经了包括提案、问题、讨论与指导的几个阶段，并特别针对制作提案的需求，安排了两场专家学者的论坛。

包括了 Jeong 以 *The Way towards an Asia's Peace Citizen* 为题，²⁸主讲亚洲的和平议题为何与个人生命有关？为何亚洲只存在国家而没有公民，我们往往只捍卫国家的利益，而非无国界的正义与和平之立场？建构所谓的亚洲和平公民之意义何在？以及 Bae 以 *Women Being in Asia after All These Years* 为题，²⁹梳理了亚洲女性的声音与再现之历史脉络，包括了从亚洲女性主义电影，例如卞英珠的漫漫哀伤三部曲，³⁰到当代的网络女性主义之发声。

肆、教育过程及其行动研究

除了上述可见的合制计划暨工作坊之成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教育过程之中，刺激并引发我们不断重复地去反思、质疑与争论下列的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们无法满足于纪录片制作的现况，而需要跨越疆域或边界去关注所谓的亚洲？亚洲的区域性又究竟意味着什么，所谓的亚洲性（Asianess）是否真的存在？「亚洲」，究竟能不能成为一种新的纪录片方法论？

在这里，我们不妨就以一个电影学校学生或纪录片工作者，如何产出一部纪录片的常规历程作为参照与比较，在教科书里（李道明，2013），从前期制作的发想（动机、主题、内容与目的）、制作期的拍摄（影像与声音的取得）到后期制作的剪辑（结构与观点的建构），它乃是一个从问题意识（Why）、文献回顾（What）到研究方法（How）的探索过程。

首先，就前期制作的发想来说，不外乎就是题材及其对象的发掘或寻找，通常，我们会从自己身边或熟悉的生命经验、小区生活或社会现象中出发，

²⁸ Jeong, Da-hun, Research professor of Sogang University China Institute。

²⁹ Bae, Ju-yeon, Lecturer of Kore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³⁰ 卞英珠（변영주、Byun, Young-Joo），1990年代韓國重要的女性紀錄片導演，自1995年開始，陸續完成了慰安婦三部曲，包括了【慰安婦悲歌】（*The Murmuring*）（1995, 93 min.）、【漫漫哀傷】（*Habitual Sadness*）（1997, 71 min.）及【我的氣息】（*My Own Breathing*）（1999, 77 min.）。

这往往是再自然也不过了，当然，也是最为恰当的。

然而，纪录片作为「关于现实的创造性处理」(“the creative treatment of the actuality”)或者「再现真实」(“representing reality”), 所谓「现实」或「真实」, 往往隐含着如此的前提, 也就是社会等同于民族国家, 我们更假设它是一个具有同构型的生活世界之基本单元, 由此, 我们竭力地去探究内在于这个疆域或边界之内的资本、民族、权力、劳动、贫穷、抗争、历史等等各式各样的问题。

借着「亚洲纪录片合制计划」暨工作坊的教育过程, 对于师生而言, 首先能够获致的改变, 即是意识到亚洲及其各个地域的存在或存有, 而透过这样的对话, 从而反思到自身为何? 以及自身与亚洲及其各个地域、内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 换句话说, 正是基于意识到这样一个区域性的存在或存有, 包括了历史的时间与地理的空间等等面向, 我们才得以进一步质问并挑战题材及其对象的疆域或边界之预设或前提。³¹

举例而言, 在上述观摩、提案与论坛的过程之中, 最常出现的话题往往是: 关于这类题材及其对象, 在我们那儿也曾经发生, 哪些面向是一样的? 哪些面向又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关于题材及其对象的问题意识, 可以不再惯常性地是以民族国家内部, 或者直接跳跃到广泛的欧美西方, 作为参照与对话的他者。

同时, 即便是针对一个相当在地性的题材及其对象, 如果我们深究其历史与脉络, 也可能会发现到它与亚洲及其各个地域可能的连结关系, 正如 Jeon 曾经作过的示范, 他以世界知名的半导体产业基地新竹为例, 重新建构了一个跨越疆域或边界的史观, 例如新竹的长程预警雷达如何与日本、韩国的萨德布署连结成为美国反导弹的网络? 而新竹的空军基地历经日殖、冷战的不同时期又如何与亚洲发生关系? 它曾经是日本神风特攻队的训练基地, 因此, 诸多日本人都留下了关于新竹的战争记忆, 以及也曾经有韩籍慰安妇在此地深受创伤。

³¹ 例如台灣主流紀錄片如何以「台灣符號」或「愛台灣」作為基礎, 從而不斷地再現「感性」與「濫情」的國族性格(郭力昕, 2014)。

当然，我们也可以由此进一步去追逐或发掘具备全球化脉络或跨国轴线的题材及其对象（邱贵芬，2016），换句话说，由于意识到疆域或边界的前提，转而能够发挥亚洲性或区域性的想象力，重新看待自己的题材及其对象，而这类的想象力，可能是差异的比较、共同的议题，也可能是连结的关系、历史的重构。

其次，在意识到题材及其对象可能存在关于疆域或边界的预设或前提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将是：那我们要如何去认识并理解所谓的亚洲性或区域性是什么？而它将会引导着我们制作期的拍摄，包括如何取得影像与声音，以及要取得什么样的影像与声音？

关于亚洲及其各个地域，第一种可能的认识，仍然是具备有国族主义及其情结的，也就是我们仍然习惯依循着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的后殖民状态，来认识所谓的亚洲性或区域性，那么，亚洲性或区域性就只是一个一个、被划分的国家所组合而成的简单集合体。

第二种可能的认识，则是复制了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王志弘等译，2000），从最早关于远东（Fareast）的想象、冷战时期的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y），到东亚四小龙、东南亚与南亚的经济体，彷彿亚洲的历史及其起源，都是由西方世界因殖民需求才开始「出现」或「发现」的，而它的认识及其框架，也都是由西方世界所定义的。

第三种可能的认识，则是从大东亚共荣圈的兴亚论开始，它不只存在于日本帝国主义时期，即便是在后殖民时期，这个精神结构的潜意识，已从政治、军事的统制，转化成为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逻辑，包括了1990年代台湾的南向政策，就被批判为南进政策的翻版（陈光兴，2006），以及它发展作为次、亚或边缘帝国的想象（魏玟，1997），乃至当代韩流文化产业背后的思维结构，以及中国崛起后一带一路、孔子学院所代表的天朝秩序及其文明观。

换句话说，认识并理解亚洲性或者区域性是什么，可以有更为不同的路径或策略，藉由这类观点的不断开发，包括性别的、族群的或阶层的，它就

是一个不断重新绘制地图的过程，而在重新绘制地图的过程之中，³²我们得以透过彼此的比较与对话，持续发现到同构与分歧、普遍与特殊，不断形构与解构去殖民和超越国族的认同界线，单数、大写的亚洲 (Asia)，因而成为复数、小写的亚洲 (asias)。

最后，才是方法及其美学的层次，或者可以说是如何透过后期制作的剪辑，去建构影像的结构与观点，纪录片，无论是作为严肃社会分析的表达，或者是作为历史现象批判的论证，都涉及到作者在传达其分析和叙事时，如何选择适当的方法及其美学之再现形式，反过来说，所谓「最好的」方法及其美学，正是最能够表达自己观点的再现形式。

也就是说，表达是一种态度、一种政治态度的再现，而方法并非美学风格的仆人，却是美学风格的基础，近年来，关于亚洲纪录片缺乏形式实验的批评不少 (邱贵芬, 2016)，也许这正提醒着我们，并非是倒果为因一味地去追求美学风格的形式实验，反而是意味着我们需要不同的政治态度及其方法。

在「亚洲纪录片合制计划」暨工作坊的教育过程之中，尤其是透过制作提案的观察，在第一期里，我们可以发现到，它们再现了亚洲及其各个地域，尤其是内部的不同社会群体所共同面对到的多重被压迫结构；在第二期里，我们则是可以想象到，在亚洲及其各个地域中，其实是某种多重的时间与多重的空间之共存，它们彼此往往是交错、重层、穿越的性质。

面对后殖民的知识状况 (在文化研究、全球化论述与亚洲研究)，陈光兴 (2006) 是以亚洲作为方法，进行去殖民、去冷战、去帝国的工作，而面对纪录片的文化生产 (从教育、制作到影展)，以亚洲作为纪录片的方法论，则是对于所欲处理的现实或再现的真实，具备反思其背后隐而未现的预设或前提之意识，它可能是以西方作为圭臬或对抗的，可能是本土主义、国族性格的，也可能是另一种帝国的想象及其复制。

因此，亚洲内部不同的社会，能够作为彼此之间的参照或对话，尤其是

³² 例如《季風亞洲研究》(*Journal of Monsoon Asian Studies*)，也是另外一種重新繪製地圖的方式 (見 <https://sites.google.com/site/monsoonasiastudies/fa-kan-ci-1>)。

面对并理解殖民、冷战与帝国的经验、矛盾及其遗绪，进一步开启 Jameson (1984) 所谓认知绘图 (cognitive mapping) 的可能性，此一新的认知绘图，结合纪录片的影像，成为某种美学再现的政略，它不仅是使得个人能够标出在社会与世界里的新的位置，也认识到自己是作为一群共同的主体（尤其是各个地域之内所存在的「第三世界」），并重新取得「看见」此一结构或体系的能力。

伍、结语

正如上述，在正式的观摩、论坛、提案与映演活动，以及非正式的互动、分享与交流的过程之中，这个来自不同地域的师生团队，所形成的群聚网络及其社会关系，不单单只是为了服务于一个特定合制计划的完成，它更俨然成为一个跨越疆域或边界的教育性平台，或者说是纪录片学校。

最基本的当然就是，来自不同地域的师生团队之学生们，藉此建立起有如同班同学一般、互相勉励的情感与支持，除此之外，它也与其他纪录片制作基金不同，他们并非处于某种个别之间的竞争关系，而是同属于一个合制计划，从而具备有合作共构的必要性及其精神。

而来自不同地域的指导老师与策展人，彼此之间，同样也建立起像是学术研究或实务制作的同僚关系，我们在作品的观摩中，分享或同或异的影像教育方法，在论坛的讨论中，厘清各种类型的纪录片观念，而在提案的审查中，则无不尽力从不同的面向给予学生们改善的建议。

换言之，无论是对于学生、教师或策展人，「亚洲纪录片合制计划」暨工作坊，就有如是一个教育性平台或纪录片学校，任何一位教师或策展人，都可以说是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之指导老师，而任何一位学生，也都可以说是来自不同地域的指导老师之学生。³³

过去的所谓合制，实际上多比较像是合资，而纪录片的基金，也多比较像是对于个别制作计划的支持，经过两期已完成或进行中的「亚洲纪录片合

³³ 我們往往自我定位在亦師亦友的“mentor”，而非上下指導的“advisor”。

制计划」暨工作坊，则是企图发展出一种实验性的影像教育方法，虽然在时间、空间与资源的限制之下，还停留在分别制作的阶段，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已经为亚洲作为纪录的方法打下了基础，未来将可进一步朝真正的协同制作再向前迈进。

然而，要具体实践出真正的协同制作，仍有赖于一系列的纪录片课程或训练作为基础，这包括了对于纪录片作为一个学门的本体、知识与方法，是否具备有相同的共识？关于不同地域的纪录片脉络及其发展，是否能够有基本的认知，并由此认识他者的社会？来自不同背景的纪录片工作者，如何透过长期的工作营队而不只是短暂的工作坊，提供其团队合作、集体共构的机会？

除此之外，如果粗略归纳参与观察的经验，在第一期的合制计划，着重的是社会的空间，较为强调亚洲所面临到的共同境遇；在第二期的合制计划，则倾向于强调历史的时间，更加关注地域之间分断甚至是对抗的经验，那么，所谓的「声响」，包括了各种的声音（sound）、话语（voice）或噪音（noise），或者可以成为未来合制计划的主题方向。

对于来自不同地域的师生团队而言，在工作坊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到，除了视觉的影像之外，听觉的「声响」往往是最能够引起共鸣或联想的，例如上述所提及的【南进台湾】之解说词、〔劳动者战歌〕与 *Marching for You, Comrade* 之间的连结，以及在 *The Prisoned Island* 【囚·岛】的观摩中，我们又发现到同一首歌曲，却有着不同语言的版本及其使用意义。³⁴

也就是说，这样的主题方向，更具备有进一步跨越疆域或边界、彼此合作共构的潜力，举例而言，从特定的「声响」出发，来自不同地域的师生团队，得以同时考察它在不同地域的起源、变体及其意义。

参考书目

³⁴ 千の風になつて(千風之歌)，原詩名為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聚會時，尤其是有難友過世之際，時常一起吟唱。

- 子安宣邦（赖俐欣等人译）（2008）。〈「亚洲」这条抵抗线的可能性：省思东亚的近代〉，《文化研究》，6: 58-77。
- 王志弘、王淑燕、郭莞玲、庄雅仲、游美惠、游常山译（2000）。《东方主义》。台北：立绪。（原书：Said, W. E.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NY: Vintage）
- 白永瑞（2009）。《思想东亚：韩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台北：台社研杂志社。
- 竹内好（2007）。〈作为方法的亚洲〉，《台湾社会研究季刊》，66: 231-251。
- 汪晖（编着）（2010）。《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李道明（2013）。《纪录片：历史、美学、制作、伦理》。台北：三民。
- 邱贵芬（2016）。《「看见台湾」：台湾新纪录片研究》。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
- 孙 歌（1999）。〈亚洲意味着什么？〉，《台湾社会研究季刊》，33: 1-64。
- 郭力昕（2014）。《真实的叩问：纪录片的政治与去政治》。台北：麦田。
- 陈光兴（2006）。《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台北：行人。
- 游惠贞（编）（2014）。《纪录亚洲》。台北：远流。
- 蔡庆同（2012）。〈《南进台湾》：纪录片作为帝国之眼〉，《台湾社会研究季刊》，86: 99-132。
- 蔡庆同（2017）。〈纪录作为创伤的疗愈：从《赤阳》、《漫漫哀伤》到《怒祭战友魂》〉，《传播研究与实践》，7(1): 181-205。
- 魏玓（1997）。〈断裂的边缘，不变的帝国：对「边缘帝国」的回应〉，《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4: 171-184。
- Derrida, J.(1996). *Archive fever: A Freudian impression* (Eric Prenowitz,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5)
- Jameson, F.(1984).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 53-93.

**“Asia” as the Methodology of Documentar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Asia Documentary Co-Production
Project” and its Workshops**

Chin-Tong Tsai^{*}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present a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report on “Asia Documentary Co-Production Project” and its workshops from September, 2015 until now. As one of founders and mentors, the author regards not only formal screening, pitching/mentoring and forum, but also informal interaction, convers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s some kind of educational process. Through action research viewpoint, this paper tries to conclude these valuable experiences.

Keywords: Asia, action research, co-production, educational process, documentary

附录：「亚洲纪录片合制计划」暨工作坊活动一览表

时间	地点	主办	活动内容	参与成员	观摩人数
2014 年					
9 月	首尔	DMZ Docs	会外会论坛	5	10
2015 年					
9 月	首尔	DMZ Docs	1.电影学校学生作品 观摩 2.亚洲合制论坛	15 (KARTS/JIMI/TO NGI/TNNUA/DMZ /TIDF/SIFF)	15
2016 年					
2 月	首尔	KAR TS	合制工作坊(制作提案 发表、亚洲合制论坛、 签署合作备忘录并由 DMZ Docs 提供制作 资金、工作会议)	15 (KARTS/JIMI/TO NGI/TNNUA/DMZ)	--
5 月	台南	TNN UA	合制工作坊(期中进度 报告、电影学校教师作 品观摩、亚洲合制论 坛、工作会议)	15 (KARTS/JIMI/TO NGI/TNNUA/DMZ)	10

* Tsai, Chin-To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tudies in Documentary & Film Archiving,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 e-mail: tonytsai@tnnua.edu.tw

9 月	首尔	DMZ Docs	1. 第一期合制成果公映 2. 第二期合制主题讨论	20 (KARTS/JIMI/TONGI/TNNUA/YUNNAN/DMZ/TIDF)	30
2017 年					
3 月	首尔	DMZ Docs	指导老师群会议(第二期合制主题、执行方法与进度讨论)	10 (KARTS/YONGI/N/JIMI/TNNUA/YUNNAN/DMZ)	--
6 月	台南	TNN UA	合制工作坊(制作提案发表、电影学校师生作品观摩、亚洲合制论坛、工作会议)	20 (KARTS/YONGI/N/JIMI/TNNUA/YUNNAN/DMZ/TIDF)	30
9 月	首尔	DMZ Docs	合制工作坊(期中进度报告、专家学者演讲、签署合作备忘录并由 DMZ Docs 提供制作资金、工作会议)	20 (KARTS/YONGI/N/JIMI/TNNUA/YUNNAN/DMZ/TIDF)	30

「亞洲」作為紀錄的方法

拆解有实而无形的审查刀锋：
评介区家麟着
《二十道阴影下的自由：香港新闻审查日常》
杜耀明*

書 名：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

作 者：區家麟

出版日期：2017 年 8 月

出 版 社：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引用格式

杜耀明 (2018)。〈拆解有实而无形的审查刀锋：评介区家麟着《二十道阴影下的自由：香港新闻审查日常》〉，《传播、文化与政治》，8:191-198。

投稿日期：2017 年 12 月 16 日；通过日期：2018 年 2 月 10 日。

* 作者杜耀明为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退休教授，现为《自由亚洲电台》和《明报》的专栏作者，并兼任教职及研究新闻自由的法律问题。包括今年在内，曾五度由香港外国记者协会、香港记者协会、国际特赦组织三方每年主办并颁发的「人权新闻评论大奖」， e-mail:s60675@associate.hkbu.edu.hk 。



由 1997 年香港回归中国的前后开始，香港新闻界的自我审查行为一直被视作一大威胁，直接损害新闻自由。除了监察新闻自由的海内外组织对此深表关注，定期报告有关情况，不少学术文章亦从不同角度，探讨新闻自我审查的一些问题。不过，这些追踪报告和学术探讨，或流于实事记录，欠缺前因后果和制度因由的分析，又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没有全面剖视审查的招式套路及其来龙去脉。由是观之，区家麟博士新作《二十道阴影下的自由：香港新闻审查日常》（下称《二十道阴影》）的出版正合其时，填补了事例纪实和专项研究的不足。全书以新闻自我审查为研究焦点，观念分析和实证搜集互相配合，以筑构一个多元综合的诠释架构，并据此从多角度和多层次探讨自我审查的根源、助力、手段、后果等等。下面先评述一下此书的研究目的、内容和特色，再简略提出一些问题，以抛砖引玉。

这本专著的副题——「香港新闻审查日常」——语道破研究的目的，就是以自我审查为线索，解破香港新闻界「有自由无自主」的谜团。作者认为，香港并无由政府禁制言论的「操控式审查」（regulative censorship），但不少新闻从业员却慨叹无法发挥法律赋予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因为他们到处都是「无形的枷锁」，令大家壮志未酬，而这些枷锁，正是指那些源自新闻机构内部的自我审查行为，从不同方面处处设限，无日无之。

《二十道阴影》根据作者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全书以香港广播新闻为研究对象，分为六个篇章，核心部份是第二及第三篇。前者以理论和事实，破除对新闻标榜客观中立的误解，也介绍一些决定新闻报导取向必不可少的因素。后者结合分析观念和新闻从业员的实践经验，从新闻工作的规范系统、文化认知系统和管控系统三方面，重新审视新闻判断的理念标准、日常工作的常规惯性、机构高层对新闻部的管治措施，从而认定造成新闻审查的二十种行径，亦即书名提及的「二十道阴影」。接着下来，第四篇以两个案例，说明这些审查行径的运作和影响，而第五篇通过理论和实例，探讨抗衡审查的可能性，最后是总结篇。

此书研究的起点是自我审查问题。不过，自我审查的行为向来不容易确

认，因为根据作者的分析，这类妨碍新闻自由的行径，共同特质是刻意违背新闻的专业判断，目的是求趋吉避凶。困难是，自我审查的意图往往无法证实，一些疑案由于取证不足，最后不了了之，而一些审查行为不少是例行公事，并无明确目标可言。因此，单是确认审查事例已有不能克服的困难，更不要说进一步的分析了。

由于采证困难，自我审查疑案往往无从水落石出，研究必须另辟蹊径，否则便会走入死巷。作者认同法国思想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想法，以更广阔的视野，从机构的整体运作去捕捉审查的不同来源和手段。布迪厄认为，现代社会不必用法律手段去约束以至禁制传播的内容，而是通过有关机构控制「表达的渠道与表达的形式」（access to expression and form of expression），从而限定表达的内容。这种以机构组织的措施和共识，去管控新闻报导的运作，无须直接控制内容，却可发挥审查效用，作者名之为「结构性审查」（constitutive censorship）。用作者的说话总结，这是「一套支配编采方针的制度规律，建构各种规范、守则，及其诠释与执行，从而促成一套编采方针，以不作为、忽略、无视、淡化、扭曲、转移焦点，以至透过话语之选择，把新闻内容导向有利于建制。」

二

有别于「操控式审查」，「结构式审查」不用粗暴手段谋杀传媒内容，而是通过新闻机构不同部门的分工合作，由最高层主理的资源调配、奖惩制度和人事任命，再到新闻部决定的采访常规和节目形式，以至日常新闻判断所倚赖的专业规范和价值观念，都可用作审查手段。这些举措无审查之名，却有审查之实，也使恶行昭著的自我审查变得无影无形，安然隐身于机构日常运作之中。既然「结构性审查」才是问题的关键，《二十道阴影》用上四成篇幅，详尽论述，综合新闻理论和广播新闻从业员的访谈资料，得出二十种常见的「结构性审查行径」，并分析其效用（表一）。这二十种行径，按照社会学家 W. Richard Scott 的理念划分，再归为三类，即规范系统、文化认知系统和管控系统，从三方面共同撑起一个侵犯新闻自由的审查制度。

规范系统的重要性在于确立行事的标准、规则，在新闻工作而言，就是新闻判断、采访方法的专业依据和基本态度。作者研究发现，新闻机构通过曲解和误用新闻原则，以六种方法，减弱、中和、扭曲以至埋没反对政府的声音，或者那些令当权者感到不方便真相。例如 2014 年持续 79 天的雨伞运动，三个地区的主要街道被市民占领，但有电视台主管表明不会报导占领区内的好人好事，因为该运动离经叛道，是违法行为，只能报导占领区内的冲突和混乱。在日常的采访中，新闻机构奉客观中立为神灵，重大新闻事件在前亦按兵不动，也不鼓励调查报导追究真相，为的是保持客观，避免制造议题。又例如采访个别事件，报导反对政府声音时，必须加入建制派或官员的观点，以示平衡。不过，新闻主管往往双重标准，平衡原则并不适用于以访问官员居多的新闻访谈节目，亦不适用于报导官方消息，因为官员位高权重，也假定了他们信实可靠，不论公开发言或私下传话，都会清心直说。凡此种行事实则，表面上是客观持平，实质上使「新闻的面貌倾向了权贵的利益」。

如果说规范系统为新闻从业员设置行事准则，文化认知系统限定了从业者的生活规律、身份角色和工作期望。根据作者的分析，由于信息科技的发展和 24 小时新闻的出现，新闻编采较前更追求速度和数量，也导致报导工作的分工愈趋细致，以至流于机械化、碎片化。记者每日只能按上方的指示工作，疲于奔命，再无余力发掘新闻。另一方面，新闻部管理层标榜多元化，以民生故事服务大众，同时又注重增加收入，把不少心思和资源投入拍摄信息节目，或者制作与投资相连的各类财经节目，以方便找冠名赞助。在疲不能再的工作环境和营商主导的制作方针下，记者自主空间狭小，自觉身不由己，工作行礼如仪，新闻机构监察时政的力量自然大打折扣。

与上述两大系统有别，管控系统并不直接涉及新闻报导，但机构高层可用资源调配、人事任免、奖惩制度，控制新闻室的操作，更在必要时直接干预。作者指出，新闻部资源不足，人手收缩，不但令调查报导或专题采访寸步难行，也可以财政理由避免采访敏感题材，并较多运用政府讯息，放大建制的声音。再者，人事政策亦可多管齐下，管理层一面提拔观点相近者出任重要职位，一面把不服从的员工投闲置散，并且小心调配记者的采访任务，

把政治新闻交给可以信赖的同事，又多聘请新人，既省开支也较为听命。简单说，管控措施是以资源、人事、权力决定新闻工作的大局，杜绝新闻报导走向管理层不认可的方向。

在三大系统夹攻下，记者自主性降低，接触政治敏感议题的机会也减少，即使记者接触了，也无权或缺资源深入采访，并不会出现可供审查的报导。若据传统「自我审查」的定义看，审查并不存在，也就无可以追究之处了。不过，若以此综合的诠释框架观照一下，即使自我审查的现象已经消声匿迹，源自规范系统、文化认知系统、管制系统的审查力量，却无所遁形，昭然若揭，不但潜藏于机构之中，更恒常发挥作用，每天主宰着新闻组织的运作和新闻报导的取向。通过具体分析机构主管者如何管控表达的渠道和形式，作者既有助大家理解自我审查的出现，也可解释审查的无形而实存，足可扼杀新闻于萌芽阶段甚至之前。

接着下来的第四章，作者以两个个案分析，分别说明规范系统和管控系统对新闻内容的影响。第一个案例是占领运动期间电视新闻报导的取舍、重点和方法。作者根据访谈所得，并查证报导内容，再分析新闻部主管的新闻理念、行事准则、工作前设等，并以具体事例，指出主管如何运用不同的结构性审查行径，因而得出向政府倾斜的报导表现。另一方面，作者比对两间电视台在中国采访的资源运用和节目规划，以窥见管控系统对新闻内容的重大影响。按以上的论述，传媒东主和主管当然可通过三大系统、二十种审查行径左右新闻取向，但该书在第五章指出，审查能否奏效，仍取决于三方面所产生的抗衡力量有多大，包括新闻机构管理文化的开放程度、记者的文化资本、每间传媒机构的背景特性。作者亦列举一些资深记者成功抗衡审查的手法，证明可通过个人或集体力量增加编采自主的空间。

三

尽管「结构性审查」的理论架构所依据的每点观念元素并非新颖独创，但其高明之处更在于融会贯通，把理论结合经验，一面把影响新闻内容的不同要素聚焦于新闻审查的议题，再根据三大功能把各要素归类，一面从 69

位受访新闻从业员的亲身经历抽丝剥茧，按照三大分类涉及的各项要素，认定「结构性审查行径」二十种，是新闻机构制造自我审查的思想资源和实际力量。

在此理论架构观照下，个别自我审查事例能否确证其意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新闻机构的体制导致审查行径的客观存在、新闻内容向建制倾斜，以至新闻媒体断送其追求真相、为民发声、监察权贵的社会公器角色。因此，需要认真追究的，不该限于个别人造成的个别审查恶例，而更须正视不断制造审查的制度土壤和机构行为。再从理论到应用，「结构性审查」的理论观点比起现有的研究，可以避免纠结于无法确证的审查意图问题，又可指出导致审查后果的观念依据和组织力量，有助提高掌握问题根源的洞悉力之余，亦可应用于人权监察的工作。以往监察要点是要捕捉自我审查的实例，现在大可扩阔视野，罗列各项构成审查的机构行径，而人权组织谴责的对象再不限于自我审查的个别元凶，媒体任何行为若窒碍其发挥社会公器的角色，削弱人民知的权利，也值得一一揭露。

同时，这项研究亦带出不少问题，值得更深入研究。首先，书中指出的二十道阴影也许并未穷尽侵害新闻自由的一切因素和招式。当研究课题的焦点由机构自我审查行为转移到媒体新闻实践和表现的不足，探讨的范围也得广延至外部因素对新闻机构内部行为的影响，再影响报导的取向和内容。例如广告商的压力以至抵制行动、政府发布消息的策略、特区和中央政府的统战等等，相信同样是传媒头上一道又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

其次，书中第五章介绍抗衡审查行动出现的三大因素，并指个别记者以至个别机构人员按照各自的独特条件，与管理层展开策略博弈，克服机构的审查力量。有关博弈空间的探讨，的确值得更费心思，除列举各项因素外，亦可参考制度经济学的分析（Miller, 1992），从机构主管与前线人员的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即主管与前线人员对于新闻实况的了解详略不一，以至生产上互相依存（production interdependence）的关系，如电视新闻报导有赖不同人手的分工合作，可以更系统地探讨记者的博弈空间和应

对策略。同时，作者在书中亦留意到以集体力量（如工会）抗衡审查的效用。在香港，新闻从业员的行业工会和个别机构工会的行动能否奏效，又在什么情况下奏效，若能作更有系统的研究，除了是值得发掘的事实真相，更具有深远策略意义，加深了解集体行动反审查的可能性（涂建丰，1996）。

最后，作者的研究或起范式转移的作用，把大家的目标转向「结构性审查行径」，但并不等于自我审查行为不可能确证，也因此意义不大。其实认知上，自我审查行径与「结构性审查行径」可并行不悖，互相补足，从不同角度认识新闻自由遭受的不同挑战。实际上，调查自我审查在香港亦有成功先例，所费功夫确实不少，但一旦证据确凿，可引起强烈反响。例如2003年，香港记者协会经过九个月调查，裁定新城电台自我审查成立，该机构无法反驳¹。从这本书的不同篇章之中亦清楚可见，新闻从业员为回避敏感议题或害怕冲突而放弃专业的新闻判断，压制传媒的监察效力，可谓屡见不鲜。因此，揭露自我审查虽然有其困难，但该想方设法加强搜证工作，而不是知难而退。

縱观全书，观念清晰，论证紧密，数据充足，瞄准课题，以整全架构，提供新观点，破解老问题。作者从审查现象顺藤摸瓜，探寻审查的组织来源，洞悉审查刀锋有实而无形，使新闻从业员身陷「有自由无自主」的难堪窘境。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不仅以六年时间完成博士论文，也不只是把英文论文译写成书，他更以其一贯如行云流水的文字风格，斟字酌句重写全书，可见作者不避重责，力求深入浅出，推陈出新，以学术介入社会，鞭策传媒，发挥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

¹ 「虛假的安全：香港國安法嚴重威脅言論自由」二零零三年年報，香港記者協會第十九條聯合報告第四節：

<https://www.hkja.org.hk/site/portal/Site.aspx?id=A1-860&lang=zh-TW>

参考书目

涂建丰 (1996)。〈编辑室公约运动〉,《新闻学研究》, 58: 35-48。

Miller, G.J. (1992). *Managerial dilemm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erarch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订 阅

零售：每期新台币 500 元

个人订阅：国内一年两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机构订阅：国内一年两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挂号邮资

邮政划拨户名 社团法人媒体改造学社

邮政划拨账号 50313103

Sponso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Editorial Advisory Committee

Jin Cao	Fudan University
Chin-hwa Ch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u-liang Chang	Nanhua University
Wei-Xing Chen	China Media University
Yong Hu	Peking University
Guang-shiash Hu	Shih Hsin University
Yu Hua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Yng-ruey Jiing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iangwen Kuo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in-Chuan L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Jing-Ling Li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ung-Tai L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Yuan-huei L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ailong Li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Xinyu Lu	Fudan University
Yen-Yuan Ni	Ming Chuan University
Linchuan Qiu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Bo Shan	Wuhan University, China
Ping Shaw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bin Shi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Chunquan Wang	Northwest University, China
Song-In Wang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Yu-Li Wa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Bu We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Shieu-Chi Weng	Shih Hsin University
Yu-min Wu	Shenzhen University
Yuezhi Zhao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Jiang Zh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Guo-Liang Zh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Zhian Zh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Editorial Committee

Editor-in-Chief

Chien-san Fe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ditorial Board

Kuan-hsing Che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Lihyun L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Fu-Mei Lin	Shih Hsin University
Shih-Hung Lo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ditorial Assistants

Chung-Po Li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ublisher

Publishe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Address 3F-3., No. 102, Sec. 2,

Zhongshan N.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Taiwan (R.O.C.)

Phone +8862-2522-1499

Fax +886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Website: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Calligraphy: Yun-Chi Huang

Cover Design: Yiche Feng

Subscription

Personal:

NT1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1500/per year(or US\$ 50/per year)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Institutional:

NT2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3000/per year(or US\$100/per

year)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Postal Giro Account

50313103,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Some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lauses.



Research Articles in general

· *Blockchain and Journalism:*

New Type of Purchase and Recommendation Platform for News

· *Self-Regul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in Commercial Social Media:*

A Critique from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 *The Problems of Knowledge Workers in China' 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 Case Study of Editors in the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in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

Venezuela' s English alternative media and their responses to the main stream journalism

Research Notes

· *On the New Identity of Social Movement:*

An Analysis of Creative Community

Past and Present

· *"Asia" as the Methodology of Documentar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Asia Documentary Co-Production Project" and its Workshops

Book Review

· *The Review of Twenty shades of freedom :*

Media censorship routines in Hong Kong